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的素材/陈丹青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03-674-1

Ⅰ.多… Ⅱ.陈…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9744号

责任编辑 刘瑞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7×226毫米
13.5印张　73图　100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引

这一册"书"，原是由南京编辑顾华明先生约稿，从开写到完成，大约半年，交出不久，便即印妥样书，时间是在2000年初夏。

大概因为技术问题，书芯是印成了，封面却未能如期装订，延宕至今。这在出版业是常有的事情吧，两年半转瞬过去。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接手出版，分明一本新书，在我，已是旧作了。

今天查看存稿，短短两年半人事也真多变：《民国的下午》专写费穆的《小城之春》，而今新版同名电影早已上市了。《红色娘子军》提一句刘晓庆说她不曾挨过斗，不料今年锁进局子里，也真难为她。《亚明》那篇写到的老前辈钱松嵒、宋文治、魏紫熙诸位，连同亚老，则在去今两年先后谢世了。记得当时写着，我曾偷笑：亚老师，我在写您呢！回国后去他隐居的东湖山庄看望将届八十的老先生，临别禁不住抱他一抱，老人的脑袋一动不动贴我胸前，同时他腿肚上使劲攀着一只豢养多年的金丝猴，两眼乌亮，不知这小猴儿此后下落，归了谁了。

这书中多有作古的人，连那壮烈牺牲的小战士，得年十八岁，

如今出书，讲究时机：各种"订货会"是属行业的盛事，赶上了，便是商机，错过了，或许就此凉掉。其实写作也有"时间性"的。当初接这份稿约，人还在纽约过日子，一则与国中大好形势不免隔膜，一则满脑子陈年旧事，书写之际全不知读者为谁，行情如何，真是好糊涂，此刻想来，也亏得是这样糊涂地写了，搁现在，恐怕竟

不会去做这件事，还乡转眼快要三年，偶或念及纽约的时光，恍若前世，书中撮拢的种种素材，更如前世的前世——有道是文学乃"前世的回忆"，我的书写，又岂敢说是"文学"呢。

我真要代我笔下这些"多余的素材"谢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意。

那当初撺掇我写成此书的顾华明先生，书成后必当先寄他一册，封面与版式，自然改动了，素材还是那点素材，拿在手里是其新亦旧，其旧亦新，竟会有"再版"的错觉吧，这错觉，惟顾华明才会有。我愿借这纸端提前与他会心一笑，是再次致谢，也是有请鉴谅的意思。这书初印时原已有篇题记交代着我俩合作的详细，现在仍然附在本文的后面，聊作记存。

2002年11月23日

题　记

南京城顾华明，日常趴在高云岭江苏人美出版社五楼的一张办公桌前，是《老城市》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初起我与他只得两回见面，先是朋友领去吃中饭，席上说些什么，忘了。另一回是去年夏天，傍晚闷热，抽掉两根烟，忽然他开口道：出一本书怎么样？你来写！

写什么呢？我问。他眼睛看住我，就把你平时随口讲的事情写出来。

我不是职业的写家，仅止间或写过几篇关于绘画的文字，密集而大量地写，是1997年吉林美术出版社约稿的《纽约琐记》，当时指定的字数简直狮子开口：十五万。我也老实，居然遵命写去，两年来白天画画晚上写，弄出几十篇长短不一的东西，总算交了差。奇怪，待我写罢歇手，手却是痒得有点停不下来的意思。那天经华明那么一撩，我支支吾吾，嘴里竟是答应了，同时就心里诧怪自己的轻率。小时候，我在弄堂口汗淋淋学会翻筋斗，且接连不停翻它六七个，稍一站稳，晕着、喘着、耳听哪位路人经过叫声好呀、再来！我就毫不犹豫纳头仆倒，将巴掌抵住水泥地面斜着身子继续奋勇向前翻——是的，那天我就这样子不假思索答应了顾华明。

于是两人又点起烟来，我说你得具体：怎样写？写作，究竟要比连翻筋斗难。

他老兄倒也干脆，当场拿出他正编辑的《日常中国》丛书清样，

指点道：就像这样子写！翌日，又送来一份文字打印稿，说是草拟了几十条话题给我作参考：什么"境遇、辨识、交谈"、什么"细节与质感"、"身体与方言"、又有"消失的阶级"、"交际的贫困"等等等等，读下去，我竟仿佛瞧见了书的模样：三分图片，七分文字，黑白老照片虽嫌模糊，但文字竟是我写的，不是很好玩么，且这回再不必再动脑筋凑那些美术话题，可以写写平时"随口讲的事情"了——啊呀，原来那也可以写！

颜华明的口头关照倒是很简单："写细节，你就放开了写细节！"

作案在即，案犯总要不停递烟的吧，他的牌子没看清，我的是红牡丹，于是商量书名。他郑重而得意地说，叫"陈丹青记事"怎样？好的，可我怕看自己的姓名霸在封面标题上，弄得什么似的。我就想了一回，说出自以为谦抑的说法去调换，即"多余的素材"。华明兄当下首肯。其时酷暑八月，当天我就将电脑支在床头插上电源写起来。

这样子，到我八月底回到纽约寓中，在画余，断断续续写到今年二月间，赶上时髦说法，"跨越"了一个"世纪"。其实千禧年之交，我是心里什么感触也没有，本来早已决定回国定居去，画室租约到期之日，正是世纪末最后一天，下午撤空房间，交出钥匙，只在照例钻进地铁回家前就近在时代广场转了转，只见警马一字排开，大批警察在每个街口设置路障，维持交通，满大街人山人海蜂拥齐集准备晚上大狂欢。晚上，我不过如往常一样伏在桌案前，画摊子收起了，我的事情，就只剩下写。

但我实在不确定如此这般到底行不行：虚构的本事，我没有，说是随笔散文，又不像，算什么名堂呢……年首年后，我两回给华明寄软盘，听取指教，等候裁断，他竟给我回过三次信，单是鼓励，只说好。"好"，自然令我受宠若惊，筋斗翻下去，犹如还在弄堂里——如我似的初涉写作的"雏"，虽说人到中年，也竟还是要人哄

华明是我晚辈，与他合作一场，倒是叫我想起从前的编辑来。从前“文革”时，虽没得几件物事可出版，但我结交的每位编辑会嬉笑，会来玩，会写信，也必定会复信。信上是革命词令工作交代家常闲话都写写，而做起事情无不守信用，讲规矩，年节还会寄本挂历给你挂挂看。现在呢，现在的编辑是稿子一到手，音信渺然，等个回音要比等封情书还要难……我格外记得北京人美一位编辑吴兆修先生，我总共只给她画过几页连环画，她却是随时帮衬，到处推荐，好几年工夫同好几位在野作者做朋友，一路诚心诚意扶助无职无名的小知青，记得二十二年前考上美院走去看望她，想要手里提个礼物去，探寻半天，夜黑路冷，只在街边买得一叠年糕送送她，那年糕坚如磐石，掷地有声，我也居然好意思冰凉地捧着递给她，她乐呵呵道谢收下来，还说春节过去吃。那年月，哪有现在似的满街礼品卖。

扯得远了。我是说，谁没有记忆，没有素材呢？我得以被人撩拨怂恿写出来，只因我又撞见一位好编辑。我对华明说，咱俩合作的小细节，我也要一五一十写出来。

2000年3月1日

目　录

引

题　记

3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5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9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16　归国的确认

20　闲散美人

28　炎黄子孙

36　饭米穗

41　大上海

45　参考与消息

51　《上海快车》

54　表皮脂肪

56　基本如此鬼见愁

57　青春的名实

59　动物凶猛

61　乡村骑士

63　捉奸与鸡汤

67 恐怖与效果
69 阶级与钢琴
75 牺牲与死亡
82 《红色娘子军》
89 看 煞
95 瓦西里、沙夏、艾莲娜
101 他人的胡须
102 弗 哭
103 胡 说
105 形式与形式感
107 形式、样式、模式
110 邱岳峰
115 于是之
121 亚 明
123 赵 丹
129 颜文樑
136 老家伙与小家伙
139 人犹如此
140 树何以堪
142 听觉与味觉
143 单身囚禁
147 胡兰成
150 革命与相貌
152 北伐与战争

158 民国的下午
162 民国的教授
168 民国的教师
183 凄凉的喜悦
189 鲁迅的墓园
194 众所周知
195 《丝　瓜》
197 彼　哉

陈丹青，1969年上海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初中毕业，1970年落户江西省赣都县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竹山生产队，1975年流落江苏省江阴县石桥公社双山大队寺圩生产队落户。

襄阳公园还在，教堂也还在，要取相似的构图是不可能了。教堂周围，早已造起难看的新楼。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1968年，“文革”乱世，我满十五岁，趁乱学起油画来。在大墙面大铁皮上才画了几幅毛主席“红宝像”，我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冬季头一场雪，我约了两位大我几岁的工人画友，郑学明、李云晖，直奔淮海路西端襄阳公园，瞄准园外那座有五个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画写生。那年，教堂早已成了卢湾区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但圆顶不容易“抄”走，我们早就选定一下雪就画它：它多像苏联画册中的景象——什么是苏联、旧俄、东正教，我们全不懂，但那又怎样！

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第一次使用刮刀。三小时后，“苏联油画”大功告成，我站起来正要呼叫走开游荡的两位画友过来欣赏，身后站立良久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开口了：

初学油画吧？同志，我也是搞艺术的，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你看，那是什么建筑？你为什么偏偏要画它？再看看你的调子，同志，又灰又暗，哪里看得出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简直像16世纪的穷乡僻壤！

“16世纪”？“穷乡僻壤”？而且他说“调子”，显然懂行。

我心跳，紧张，写生的狂喜顿时蒸发净尽。两位画友早已过来，几次张嘴想要辩说，但这位年纪至少大我们二十岁的男子不容插嘴。他沉着脸，表情诚恳，重复说道：“同志，你要好好想想！”

这句话，是当年“政治”上极为严厉而流行的“启始句”或“结

束语”。

现在想来，这男子的心态真是好不难说：他站我身后看这许久，最低限度也还喜欢看见有人在画风景画——那年，我曾亲见一位有名的右派老画家，居然一边在礼堂画着“红宝像”，一边扯开喉咙唱：“敬爱的毛主席，我心中的红太阳！”五十多岁的人了，分明唱给别人听，也分明侥幸自己被起用，画着革命画——时势严峻，天气严寒：这位男子仍会走来公园逛一逛，看看雪景，看人画画，而终于要对陌生少年来说那番革命的话……。

他说的全是假话套话么？那是彼时彼刻的真心话。及长大成人画下去，此后曾有多少老同志好同志语重心长找我谈谈话：小陈啊，你要好好想一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我们就这样在雪地上僵持着。我不怕他。以我那时的个头和年龄，最后一招是打架（三个对一个）；但我怕他说的话：我知道那是大道理，是“文革”初始天天听到的革命腔，可我心里知道自己的确不想画“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心模仿的正是“修正主义”灰调子。那天天气阴沉，新雪惨白，公园、教堂一派萧条：这景色，这幅画，的确“又灰又暗”——事情不妙。他是什么人？他会将我带走吗？在那时，随时可以有人因为“严肃的”原因将人带走，被人带走的，何况我才是半大的孩子，前两年就为了爬墙越界之类，给人捏紧了腕子拽到什么“战斗组”办公室去，拍桌子，问出身，临了还叫学校来领人。

手冻僵了。我瑟缩着收拾画箱准备逃走。小郑强作镇定，声音抖着开腔问道：“我是静安区汽车修配厂工人。请问这位同志：你是什么阶级出身？”

这是当年另一句非常严厉而流行的政治“启始句”或“结束语”，效果惊人：我记得静了几秒钟，每个人嘴里呼出严冬的白气，忽然，中年男子不发一言，倏然回身，径直向公园出口跑去。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阿华无所不能。他自己裁布做衣，打造家具，修理沙发自行车摩托车无线电电唱机照相机或那时想得到的所有玩意儿。他从旧货铺买来表芯、表壳，将大钟表表面剪裁成手表尺寸，粘上指针时刻，整个儿精心模仿名表欧米迦样式，发条一转，那表走得精确如仪，再请会“书法”的朋友描出“Ω”字型，超真迹一等，然后戴在腕子上。

打架，劝架，耍赖，斗智，说笑话，讲道理，阿华样样精通，他早岁失怙上孝敬老母下扶助弟妹，家里一套社会上一套单位里一套他都做得来畅晓条达，上海人是叫做桥归桥路归路动兜得转吃得开头脑光清动作清爽。论年纪，他还算不上旧社会过来的上海滩上“老侠客”，老侠客的做人与美学他却是天生有样学样：卖相要潇洒，作事要漂亮，新社会里照样玲珑八面我行我素，去新疆去内地去农村他一次次躲掉，与里弄单位层层周旋他花招百出，有一夜初雪纷纷景贤路小帮会澡堂子堂里堂外一群少年恶客寻仇而来一触即发，我眼瞧阿华不动声色兜了几圈摆平一场几乎动刀子见血的斗殴，事后数落哪拨人是哪条来路其实谁和谁根本不认识谁跟谁早就串通好幸亏半当中来了谁谁又正好没有来等等等等，他讲得是行云流水鞭辟入里，若用在黄金荣杜月笙吴四宝门下阿华绝对好汉一条，真真可惜了。十五岁时我在澡堂子里赤身裸体认得阿华，他的正职就是持一支滑亮的竹竿给各路客人叉衣挂裤：“摆面孔啊？”他斜眼冷笑对一位刁钻的顾客极温柔地说：“要摆面孔嘛三毛钱挖出来楼上雅座去

泡汤，此地一角五分洗完就走，你来发嗲，啥意思！”然后提高声调环顾四座：“大家讲，是不是这道理？”

满座裸体，哄堂大笑。有那真上来“配模子”即上海话打相打的，阿华似笑非笑伸腿扫倒：“来呀瘪三，今朝实在对不起！”顺手扔条热毛巾劝那家伙擦一擦。

我至今学不会阿华似的气闲神定，真枉为朋友一场。他抢先付钱买方砖冰激凌给我俩兄弟那姿势极之松爽，递过来时包装纸已经剥开留给手握的位置刚刚好，年初二去他家吃饭看他照应一大桌老小亲友无微不至，酒席宴都是那年月难而又难才得弄到桌面上的本地吃食外地时鲜。那年月，多有二十出头小年青这样子老成得体，我真想知道现在的上海小伙什么作派。阿华大我七八岁，男中音，两道粗鬓脚一刀刮齐瞧着好不羡慕，他看我画画眼神格外柔和从不说三道四。忽一日他面色一正说：那么丹青，你给我画张油画像。

时在1969年，革命喧嚣就在窗外，有那么一位上海澡堂的阿华恳请一位弄堂里将去插队的少年画张油画像。多年后，美国的阔佬富婆出钱订制，哪比得那回庄严贞洁：那是我第一次正经摊开油画家伙在画布上连胸带手画肖像。阿华不会让我破费，画布、内框都是他掏钱。那天上午气象澄清，他来了，自然是请的所谓“病假”。他头发分路梳好油光可鉴，进门后表情神秘而得意：一伸手，他从包里摸出一件西装，一条领带，西装半新，米灰色，干干净净，他穿上戴妥，得逞似的一笑：怎么样？画进油画怎么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西装（双肩笔挺我哪里知道里面垫着硬衬帮），第一次看见中国人穿西装（阿华忽然活像民国老照片里的洋场阔少）。三十多年前这套打扮简直匪夷所思，然而非常“上海”，非常阿华。上海的阿华天生崇洋，天生只能偷偷穿西装，但那时他就知道在油画里画上自己穿西装——加上那只“欧米迦”。共和国新人一代，阿华的西装意识西装行为比大家早了十多年！十多年后，他

的单位仍旧在澡堂，没有海外关系，没有别的门路，但“文革”一过他就申请护照准备出国，谁能难倒他？有一天我午觉睡醒，阿华来了，手上摊开一本酱色护照，坚硬挺刮，正像那西装的垫肩，那可不是仿制的“欧米迦”——阿华从不犯法。

敢干不难，阿华敢想。其时我正在美院上学，未有出国之念，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模样。阿华总是前卫的，他开了我的眼。虽然在我去到纽约十年后他才翩然来美，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位伟大的想象家，实行家，一位社会主义上海滩私藏西装时刻准备“走向世界”的先驱——该怎么向今日的青年解释？三十年前，头发稍长，裤腿稍紧，就会给众人扯开听候训斥，当场脱裤，当众剪发。那时，在抄家物资展览会的种种“罪证”中，就陈列着“旧社会”的马褂长衫手杖怀表礼帽之类，当然，还有笔挺的西装。

那幅油画肖像画得怎样呢？开手画时我就认定我本人就是伦勃朗，不过才起了一道单色油稿，我就沪驴技穷，不知怎么画下去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可怜而滑稽的瞬间：当“伦勃朗”正在描绘“洋场阔少”时，楼下张家姆妈上来晒台晒衣裳，只听得脚步蹬蹬响——谁？！居委会？户籍警？红卫兵？好汉不吃眼前亏，阿华从来不犯法：一个新社会的青年居然穿着旧社会的西装，万万不能给人看见呀，看见了，逮个正着，那就迹近，不，几乎等于犯了法！

“说时迟，那时快”，阿华纵身跳起，脱下西装，一把掖在我家被窝下——是的，阿华谁都不怕，就怕给人当场撞见穿西装。

1912 年的刘湘翠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士男男女女精赤条条过家家，说来有啥大不了。《三字经》首句该是“人之初，全裸体”。人之初，其实不辨善恶，倒是对娘胎里带来的一团肉身很好奇。有件事，现在坦白也没啥大不了：在我五六岁年纪，记得是哪天下午外婆正在晒台洗衣裳，太阳照进来，楼上楼下五户人家七八个小孩子至少一半是女孩不知怎地聚在我家拴了房门拉起窗帘只听得其中一位大约也就十来岁吧涨红了脸叫声“一、二、三！”，全体哄笑，裤子脱下来。

哄笑变狂笑，抽了筋似的。外婆敲门了，亚当夏娃于是齐声尖叫提上裤带。那时，我裤裆里的锦囊妙物顶多也就花生米大小吧，再长几岁，就成天和“带把儿”的男孩挖开裤裆比赛撒尿的射程与高度，不屑与小姑娘一起玩了。那是心理学所谓“阳具崇拜”还是哲学家的所谓“自我确认”？总之，五六岁时那场戏是群小无猜，猜也白猜，看见啥了？看见了又怎样！

长大学西画，学西画就要画裸体。为什么画裸体呢？既不为成人们销魂噬骨的“性”，也不是群小无猜的“看”，据说，画人体是为了艺术。我们党是重视艺术的。早在1965年，毛主席就在“内部”谆谆教导：“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不画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对的。”翌年，“文革”开始，男女老少模特儿不但一律禁脱，而且失业，因为艺术院校统统关了门。首开写生裸体之风的刘海粟刘大师“文革”初年据说先是站着挨斗，忽一日传来最高指示，其中

毛主席夸了一句徐悲鸿，夸了半句刘海粟，刘老闻旨，叫一声“毛主席懂啊！”此后挨斗，就给恩准坐下来。

那“裸体模特儿不画不行”的御批不知可曾向刘老宣示过，否则他怕是可以躺下来挨批斗了。

早不学，晚不学，偏偏就在那年月，我抹开油画颜料学起不画裸体“不行”的西洋画。结果呢，我画的是胖乎乎笑嘻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成了“文革”初年红遍全国的超级模特儿，在千万幅革命油画中，惟一的“半裸体”也是毛主席：只见他游泳过后身穿浴衣肩胸半露，正慈祥地招手呢。

那年月，不画毛主席？不行！

转眼“文革”十年。我糊里糊涂学会了连环画、宣传画，甚至画“油画”，还竟出版送展，小有声名了，看来“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不画也行？到底行不行呢——如今，艺术学生的说话做事可比咱们少了太多顾忌，去年到美院代课，就听得进修班诸生有句极坦然的说法：上美院图个啥？一是和名家教授混个“脸熟”，二是画“女裸体”。前一说固然乖张，莫说不敬，那会儿根本还没这句说法，这后一说，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毛主席当年的意思，“男、老、少”是虚，“女”裸体是实：澡堂子里挤满赤条条老少爷们儿搓上抹下的，谈什么“封建思想”、“革命思想”，封建思想横加禁止而男画家“不画不行”的，当然是指隔壁“女部”池子里的女裸体！

如今都说“人体美”，男人？还是女人？长长十年，惟一可供窥看的“女裸体”躲在“赤脚医生手册”里，胸腔盆骨，曲线窈窕，虽是语焉不详粗粗用线勾一勾，已经看得我面红心跳。时代真是变了，在京城胡同饭馆我就不止一次见到墙上公然挂着真人尺寸的美国裸女大照片，躺着，媚着，桌面上火锅沸腾猜拳行令，看都没人看一眼。

闲话少说。1978 年全国形势大好正本清源恢复高考我进了美院，不久老师宣布某周某日某课画裸体素描写生，事属“文革”十

年后中国第一次恢复写生裸体不画不行！第一课，模特指定女裸体。

从风闻，宣布，到当真开手画，期间自然少不了各种铺垫与前戏：先是在院校内部开放图书室，世界名画画册里翻开来，什么“维纳斯的诞生”，“土耳其后宫”，果然不着寸缕，那时，高校艺术学生单在准许观看西方画册这一层，先已是特权阶层。接着是准许“社会”开眼：“文革”后复刊的《美术研究》第一期封面就让希腊雕塑维纳斯站岗，虽是腰肚遮拦着，可在当时俨然兼收政治宣言与色情广告之功，甫上市即告销罄。到了紧锣密鼓大造舆论的阶段，是美院大礼堂某夜召开“裸体艺术”专题讲座，座无虚席，人声喧哗，黑暗中还混进来不少校外人士。主讲人雕塑系钱绍武钱先生先做开场白，说些什么呢，忘了，只记得钱先生开腔不久即引了响鲁迅先生一句话——鲁迅先生也真神了，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有他一句现成话：“文革”初周扬等“四条汉子”走背运，报端有引鲁迅文章，原来他当初就料定这四位不是好人，“文革”末张春桥报应到了，忽儿广播里就念出鲁迅一篇《三月的租界》，早就看穿张某不是东西——现在要画裸体人，则中国人“从白胳膊想到全裸体”一节即“想象力格外旺盛”那段话，给钱先生速个正着，用得正好。记得钱先生“白胳膊”大声念出后，到“全裸体”三字，忽然停顿片刻，略带为难地那么一笑，面颊一红，很轻很快念过去了。唉呀，现在想来，连“全裸体”三个字，那会儿也没谁敢来当众念出声。

于是放映世界著名裸体绘画幻灯片。全场大静。

好。全班九名所谓“研究生”，从老大到老九以年龄顺序依次相称，我敬陪末座。其中仅老大老三是原美院大学生，论“文革”前画过女裸体的资历，其余七位，甘拜下风，这是一。那年我适才新婚加上其余六位同学均已成家与老七老八处男之身处男之眼相比，论“看”过女裸体的资历，略占上风，这是二。终于开课了。那天一早，炉子已经生好，只见老大老三单腿抖动理纸削笔神情自若，老

二老四老五老六老九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见二十七八岁的老七老八是一会儿给炉子添煤一会儿挪动画架忽然不见人影忽然又泡了开水抱进来：模特儿到了！由当班老师靳尚谊先生领着，她是一位我们先已在校园里见过的姑娘，二十多岁，相貌淳朴。我们一一同她招呼过，靳先生于是略一示意，她就转到屏风后面，换上睡衣，走出来。

画室里鸦雀无声。那年，到底是哪家美院的哪堂课率先恢复女体写生？反正这位姑娘是中央美院第一位“文革”后的女模特儿第一次当众裸体。我们在画架前各就各位拘谨呆立，成扇形，远远围拢她，却是看她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不像话，人家没穿衣服；不看，也不像话，人家不穿衣服就是让我们看，让我们画呀！姑娘倒是坦然，她认真听从靳先生摆布姿势，腰扭过来，头别过去，这样子坐坐，那样子站站，简直大义凛然。画室大窗的光芒罩在她身上，忽儿我觉得她像是一位引领我们从善如流该当如是的大姐、阿姨、母亲。是的，女性总比男性更坦然：幼年那场戏不也是女孩动议，女孩下令么？什么亚当的肋骨变夏娃，一听就是男爷们儿思路，西方的女权分子怎么不吱声呢。日后，全班同学打心眼儿里敬重她，认她是英雄，是圣徒，那年她被评为全美院的优秀职工，可不是么，当年她一横心解开扣子就写下一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美术史。但她的名姓、模样，还有我的素描写生，我都忘记了：整整十年我们想象并向往这一天，这一刻，我真想好好写出来，却不知怎样写：描述她的身体？与画画无关；描述怎样画身体？与她无关。我只记得老七。老七一次再次看手表，在“她”快要出现时又跑到教室外面，旋即探头唤我出去。

“没什么，”他在走廊里额角冒汗低头沉吟：“我在想会不会出事？你说呢，可别出什么事啊！”

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也不记得他对我说完后又跑到哪里去，在她赤身坐定后，老七这才悄没声地回转来：他的身姿、步态仿佛

进入殡仪馆，对了，只有在毛主席的葬礼中我才见过这样庄重的身姿与步态，庄重得近乎崩溃，他的面容那么严肃，严肃得好像这里发生了最最沉痛的事情。

我们的时代"进步"了，进步到终于允许发表这幅老照片，并由此证明我们大幅度的退步——这幅照片的珍贵并不是衣装笔挺的画家围着一位裸女（模仿欧洲人的"画室合影"），而是民国时代新青年与新事物的快乐气息，他（她）们直视前方，开心而坦然，以为时代必然会一直进步下去——多么天真，多么幼稚，这就是30年代民国的文艺青年，年轻的民国文艺。

70年代，中国驻欧洲某在法国人陪伴下，在内陆河里，乘坐公[illegible]，区内文物局。

归国的确认

国人出国，如今总算不太稀罕了。出不了国，坐看外国电影，也不稀罕了，另有《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之类连续剧一一五一十给我们交代着人在国外的种种酸辣，给在国中的哥们儿看，是看中国人怎样在外国折腾，给在国外的弟兄们看呢，大约是看外国怎样折腾中国人，说得绕口一点，倒是看看咱中国人“怎样看”中国人在外国同外国人折腾，总之，两种看法，看出两种滋味。

少年时，莫说出国的念头从未动过，当真出过国的人也极罕见。那年我问亚明老师可曾出国，他说去过苏联。我忙问怎么样，他却曼声说道：没劲。高楼大厦么就像鸽子笼，芭蕾舞么翻来覆去不过是踮脚、转圈、男的把女的托起来，国宴呢，香肠加黄瓜，熬到回国，火车停在满洲里，一下车就吃碗阳春面。

哦，原来“阳春面”就是出国的滋味？

阔别神州十一载，1992年我回国探亲来。翌日早起，头一件事就在上海街头找碗阳春面——不是特意模仿亚老师，我早忘了那段话，此刻写下题目起个头，这才想起的——美国不比前苏联，中国菜中国面有的是，可我单是想念没滋没味的阳春面。这道理，亏得阿城早给开导过，说是所谓海外华侨的叶落归根哪里是爱国，实在是人胃里的分泌物叫做什么氨酶的，到了老了，只认少小吃惯的吃食，终于熬不住，回国解馋来了。我说咱小时候吃过啥好东西，将来老了可不惨了？阿城说是啊，说的就是这意思！

沿街一溜早餐铺，只见那伙计在排满生煎馒头的平底锅锅沿铛铛敲着兜生意，可除了肉丝面排骨面牛汤面葱油拌面咸菜肉丝面虾肉馄饨面，没一家供应阳春面，登时我心里胃里没着没落地，多年梦想的回国剧情才刚开幕，这第一出重头戏岂不就泡了汤乱了套了？有位老板娘看我走进退出，喔哟一笑：刚从外国回来吧？现在没人吃阳春面啦。来来来，今天专门为你做一碗！

到底上海人：张爱玲说得真不错。片刻，阳春面端上桌来，诚哉上海人所谓“清汤光水”，我举筷端详，惚兮恍兮，给蒸腾热气团团缭绕着，眼眶竟有点湿润。就着热汤呼噜下去，口舌间滋味似是而非，嗓子眼先已感动了。顷刻碗底朝天，我又叫一客生煎包子，斟字酌句似的嚼着咽着，同时眼睛也不闲：打量昏暗店铺里的同胞吃早餐也是回国的眼福呀，瞧眼前这两位进城打工的乡下少年，脸上脏兮兮红扑扑，“十里洋场”相依为命一声不响挨紧了坐坐好，吃完了，双双出店，分明不是同性恋，却是施施然手挽着手慢慢走，行得几步，就紧握俩手扬起膀子在空中抡圆了缓缓划圈子，我瞧着，莫名其妙又感动了。

抹嘴起身，胃里一团暖和。洋人的咖啡浓汤灌下去，不是这种暖和劲，此刻，想必那什么氨酶正在踊跃分泌，消化国粹了。回到家，第二件事是翻出从前的蓝布中山装穿上——即海外叫做“毛装”，海内叫做“人民装”的——瞧着镜子里那老百流又变回老知青，自个儿臭美。父亲说，你想穿这奇装异服上大街么？原来这是如今西装领带的上海老同志对人民装的别称，果然，后来我在神州大地瞧见穿这身行头的，竟多是百流叫花了。

青少年时代的“国粹”如阳春面人民装，如今看来都“下岗”了，“国已不国”。怏怏然意犹未尽，下一个节目呢？好在自行车尚未见弃于广大人民，既是国粹，也还是国风，我就向父亲讨得车钥匙——蹭，弹簧锁跳起，当啷一声，撑脚弹开，多熟悉的声响！一推

动，满轮子钢条滴溜溜转着，碾过石板，车身还那么娇滴滴一颤，我又感动了。掀腿跨上，双铃一摁，转眼我就混进大街上千百辆自行车浩浩荡荡的伟大洪流。迎面是上海的风，中国的风，口角留着阳春面无味的鲜味，脚下是周而复始的踏动：什么爱国情操，什么民族大义，口舌味觉肢体语言可比那些个教条牢靠得多，雄辩得远了……几分钟后，我已宛若少年时倾侧车身做几轮S型盘旋超过一连串别人的坐骑轻车熟路志满意得好像从来就在咱中国根本没有出去过。

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奋发图强？骑自行车！坐喷气飞机，开摩登轿车，似乎都不如跨在自行车上单凭自己的身体带动车速又被车速带动来得质朴而潇洒，既入世，又超然。据说，世纪初欧陆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化风尚就是骑上自行车，我在照片纪录片里看到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诗人还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共产主义战士法西斯党徒一个个都来骑跨自行车，连北平的末代皇帝照样叉开腿脚江南的贵族小姐也竟撩起裙摆，曲曲弯弯骑那么一段自行车。那是人类在早期工业文明的春情发作？是初入民主时代的撒泼打滚？直到七八十年代，前美国总统布什大歌唱家帕瓦罗蒂也都郑重其事喜笑颜开在北京街头大骑自行车。现在，成百上千的人簇拥着我，我也是簇拥者之一簇拥着所有人，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最高境界岂不就是与人民群众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红灯亮了，左右依次停车蓄势待发，绿灯亮了，前后男女老少如箭出弦，市声喧嚣。中国的市声，我倾听自行车车阵的集体颤动与成片铃声，眼看前方车座上密集的中国人的臀部腰背裹在冬衣里扭动，欣赏菜蔬鸡鸭箩筐杂碎在车尾铁架上的幸福的颠簸，日不暇接兮一派欣欣向荣，陶然忘我兮居然顾盼自雄——打住！

不就骑辆破自行车吗？废话连篇。猛听得身边一声钝响，两部小轿车前后相撞，歪在路中央。

我的奇思狂想陡然中断立马刹闸张嘴呆看：两位中年人破门而出一个西装领带头发向后梳一个穿羽绒衣理小平头都戴着眼镜看一眼相撞的部位二话不说劈头盖脸打成一团。我登时感动得简直近乎委屈：整整十一年总共一百三十二个月五百九十多个星期四千多个白天黑夜再没亲眼瞧见真人打架了呀，海外游子朝思暮想盼星星盼月亮盼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盼什么但是现在回国第一天最最动人的时刻总算来到了！听啊，那一拳接一拳揍在冬衣上的闷响，两张脸忽儿紫涨忽儿煞白领子忽儿被揪牢忽儿又犟开四条手臂挥舞穿插要么落空了要么打歪了手表一闪掉到地上又闪电般捡起来继续打有那么一瞬两人猛然抱拢痉挛战栗试图扳倒对方远看活像生死之交久别重逢激昂慷慨几乎要接吻痛哭的样子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松手分开气喘吁吁其中一位嘴角渗出鲜血紧接着咳呸一声血唾沫飞出老远然后龇牙咧嘴再度奋勇一扑劈头盖脸打成一团周围自行车阵铃声大作源源流过人人视若无睹我这才发现只有自己站在那里张嘴呆看。

回来了！我的同胞，我的祖国。我真的回来了！

闲散美人

路遇美人，本不易看清、不宜细看的，但若有年轻貌美的女子闪过人丛，即如符号般立即通知目光，文艺腔的说法是“跳入眼帘”。没办法，自己的眼睛，自己管不住。

而芸芸众生往来街市，无非人看人。特意地探看美女，是美德？还是罪过？其实有聊无聊都说不上。时人有句口头禅叫做“回头率”，先前没听说过，那引人“回头”而看的想必就是美丽的人，所以这雅俗不辨的词语倒也点明“问题”：为这“回头”问题，当年波德莱尔特意写了一首十四行诗，专说巴黎街头的艳遇，怎样惊鸿一瞥，过后又怎样低回难排。试读下面几句：

轻捷而高贵，小腿半露宛如雕像。
从她那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似的
眼中，我像狂人般浑身颤动，
畅饮那消魂的欢乐和迷人的美。

半个世纪后，本雅明借题发挥，竟是牵引出关于现代都市文明中人际关系扭曲沦丧的一大篇哲学论题。

诗哲逛街，到底不一样。俗子如我，别无所长，只是年年回来走走看看，所见若有所失：在街头，商店，公共场所，格外好看的姑娘如今似乎不容易见到了。

这“不容易见”，倒是偶尔一见方才有所觉察：王府井北端道路拓宽而新建高级宾馆，因在老美院左近，寻访师友时或经过，不期

然三两艳丽的女子“跳入眼帘”，还不及“回头”，前面又有丽人施施然走来。如此者，虽只看得两三眼，机“率”不算太高，但在其他街区的路人稠密处，就少见这样身姿出挑的女孩——国中有妓，早知道的，然而一见裙短腿露坦然出街的新女性即妄断有异，不免轻佻的。我的疑惑，是她们漂亮得虽有几分招摇，蹊跷，但瞧着实在并不很像“妓”。妓该是怎样的呢？

去国久长，回来总是上，“改革”而且“深化”，是弄得许多路人的身份我都辨不清。

问起，才知道那一带确是“职业女子”较为集中的出没点，这就是了。借鲁迅杂文里借用过的上海话，我所见到的情形叫做“姑娘勒浪做生意”，“勒浪”，吴语是“正在”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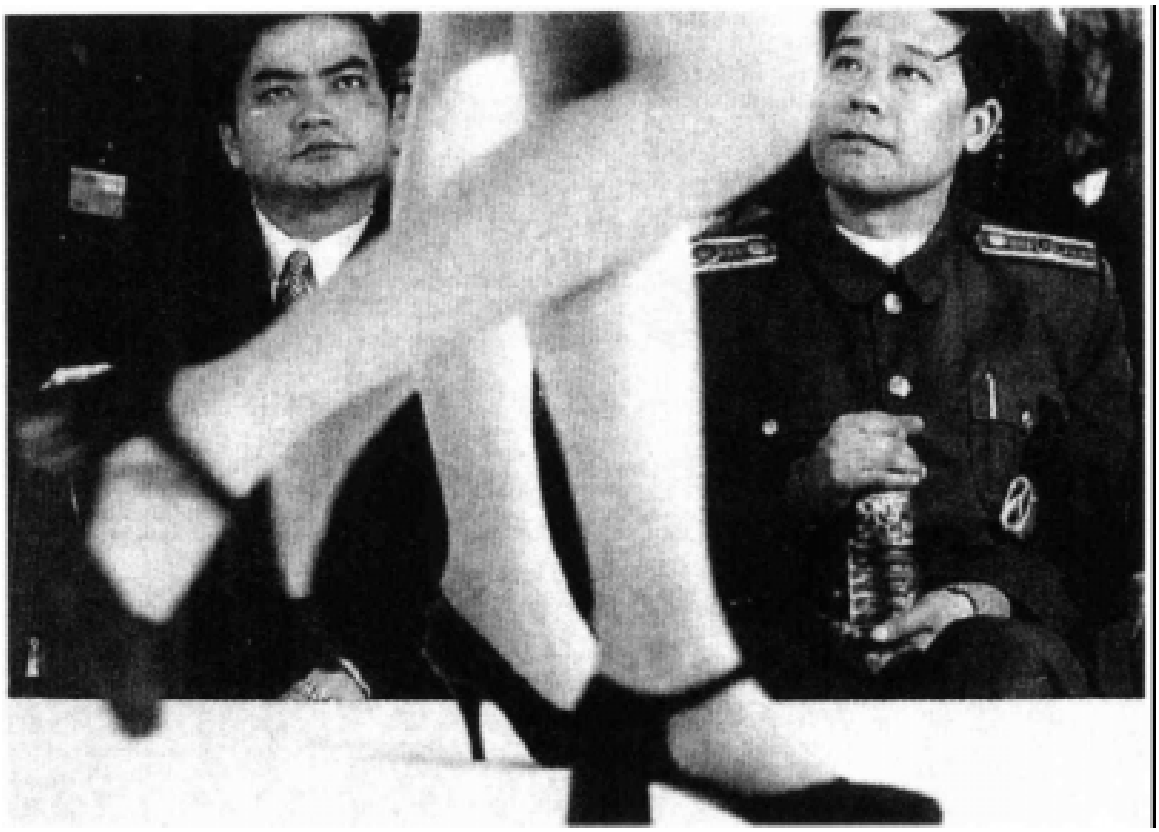
这就叫开眼界。此后经过，略微留心了。果然，某次是在严冬，竟有七八位腰穿皮质超短裙的“姑娘”沿街蹲开。美女蹲坐，照样身姿好看的，兼且十分“本土化”，她们无所事事而分明有事，其中一位对着手提电话大叫：“咋整呀？你说啥呀！”

明眸皓齿。以我辈对于美女的最高比较级看，她们平均的“好看程度”正像当年军区文工团女演员。

年前借住美院旧楼，没处打越洋电话，说是对街宾馆有专台专线提供服务。走进大堂，上得二楼，迎面一大伙姑娘散在亮晃晃的大理石地面上，总有二十多位吧，场面壮观，却是更不易看清、不宜细看，只见得各种发型、口红、腿、高跟鞋，说是艳遇，宁是吃一惊吓，而周围走动的宾馆职工则视若无睹神色平常，华丽的侧门内隐约传出卡拉OK的叫唱，那么，她们是在就地等待传唤，“勒浪做生意”。

可看着还是不像“妓”：年轻得近乎年幼，不害羞，也不显得无耻，有点“上班”的兴奋，有点“值班”的无聊，既不散漫，也不主动而殷勤，哪有电影里同类角色的风骚劲，也不见美国同行的专

40年代的中国妓女。依循巴特观看照片的「细节论」，我注意到她们精致的发型。



90年代的时装表演。依循巴特观看照片的「细节论」，我注意到军人手中的水瓶。

业相，更看不出风尘女子的风尘感。风尘感是怎样的呢？反正除了彼此很相像——鲜艳，性感，自知自愿暴露在众人的目光面前——她们什么都不像，若非聚集在“生意”场所，那只是一群爱打扮敢打扮的小姑娘，因化妆而模糊了各自的性格本色，但神态举止无非是少不更事的邻家女孩或外地乡镇的俏村姑。她们各有各的天生丽质，相互比，或有差别，散在街市，必引人频频回头的：原来她们在这里。

我自知识见寡陋。友人笑说：这算什么？各地宾馆多的是，按宾馆的级别而分年龄、姿色、身材的“档次”，我所去的宾馆在那一带要算是“高级”的，姑娘自然也就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夜夜上班，白天不出门的。

我于是明白闲散的美人何以几乎绝迹街市。将崔健的歌词改篡了，是“我本来就不很明白，何况时代变得快”，现在，终于是有点明白，而且“开窍”了：人家有女初长成，往哪里去？才貌出众的，学做演员、歌星、舞者、模特儿，好极了；伶俐标致的，去当宾馆助理、公司秘书、酒店侍应之类，也好极了；再其次（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其次”二字似有不宜），青春大好有貌有姿，学艺太难，上班太累，或学艺上班两无缘，而又看得破、想得开，那就打扮起来，按摩，接客，做生意：有什么不好么？天生我才！身材、生财，也能解作“才”，物尽其用，唯物、尤物，不也是“物”的意思么？

好的。那么满人街“良家女子”难道不入眼么？这也不难解：路遇“良家”，姿容端丽，可羡者倒不在其“色”，而在其“良”，她们散而不闲，或工作或持家，无事并不成天价逛街，迎面瞧见了，再取文艺腔调令，是看在另一种“审美观”，总之，上帝、基因成全了各色各样的人，各有各的意思在。

还有一类，偶或出没闹市，身姿在闪进轿车的一瞬，更看不清，但也就看清了：非妻非妾，非良非娼，若在高级商店单独或结伴走

动，出手豪阔，神态索莫而矜持，引相貌平凡的女子投注异样的目光——在平凡与出色之间的女同志，总是大多数，各有所长各有所事，姑不论，用官话说，“大多数同志是好的”。

昔时，鲁迅于上海少女的早熟颇有感慨，写她们小小年纪即精于在店伙生人前调情卖乖：“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读来如在眼前，因我年少时的上海姑娘也还同调，但她们不是妓：在鲁迅的时代，“妓”与“良家”判然有别；我的青年时代，则女孩子卖不得乖，更卖不得笑，清一色革命后代，倒也“英姿飒爽”。难描难说的是现如今：那爱打扮的，“美学”上弄得近乎于“妓”的样了，而旧时的调情法护身法显然失传了；那真在“做生意”的，不知是初出道呢还是行业的规矩尚未十分明了，却又不很见得专业、敬业，举止间反倒无端残留着几分“淳朴”相，其实是无知，以至粗粗看去难作别样的形容，只见青春与性感——以色事人的古老行业算是回转来了，而姑娘的“态度”尚且半生不熟，“身份”，则不免似是而非：至少是在视觉上。在视觉上，今日路人的“家庭出身”悬殊有限，“阶级属性”早给抹平，就说女了吧，若辨贫富，一目了然，要想区别品相气质间的所谓“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谈不上，也不容易分清了，惟余性别性征是万古不易，文化，制度，时代再怎样变花样，种性的青苗不会断，说来说去，还是“人家有女初长成”那句话，到得“亭亭玉立”的年纪，乐意“罗致”，或有心“固守”的姑娘们，总算在社会上有了各自的去处。

此外就剩下“祖国的花朵”。放学了，半大不小的孩子拥出校门，走路还没个样子，人样子却是大致成形，其中有清秀的小姑娘蹦跳而过，我不禁多管闲事闪过一念：长大做什么？

“长大要把农民当”，在我辈的童年，这儿歌是唱着唱着就成真。田野沟渠干矿兵营，我真见过眉目姣好的少女着一身陋衣，汗出如浆出死力劳作。我心里晓得怜惜，却实在不晓得也想不出她们还有

哪里可以去得。那时，能去文工团唱歌跳舞的，凤毛麟角——身材再好，还得看出身呀——其余的，便是胡乱走在人生的路上，转眼老了。以年龄推算，她们，可就是今日宾馆大堂走廊里漂亮女孩们的娘？

记忆老是停在从前的时光。从前时光，马路上“广大工农兵群众”果然闲散着不少美丽的人，蓝布棉袄黑布鞋，不施粉黛，真是好看的，也才记存在心没忘记。然而记忆可靠吗？记忆会不会就是僵化的概念？说来说去，美，就是个大有问题的概念，这一节，真该听听女同志的说法。

男同志的相貌怎样呢？且不谈所谓精神、气质，仅就长相论，如今有模有样的男子汉在街市上也不容易见到了，那是另一个话题，只是难下笔。听说今年京城里开办了全国男子选美大会，好啊！原来美男子也有了去处了。台下的评委可有女同志么？是的，我们都该听听女同志的说法。

金恩罗森（爱丽丝·Ruth Orkin）摄于1951年纽约街头的 American Girl in Italy（意大利女郎）。今日，意大利街头的风情依然迷人，时光流逝的痕迹，反而成为美丽的装饰。摄影艺术家罗森的爱恋对象不是出于性感的刺激冲动，而是对美好的追求。

炎黄子孙

现如今，台商在大陆包个“二奶”，蓄个“小蜜”，神州大地的老姑娘小姑娘转道香港嫁去台湾，都不算新鲜事了。另有那远赴美国依随台湾郎的大陆千金，或明媒正娶，或金屋藏娇，转眼笑盈盈抱着“爱情的结晶”，忙着给大陆的娘家寄照片、汇美元。然而宝岛那边的原配也就衔恨追来。几年前，为台商生下男婴的青岛美女纪然冰母子血溅加州，双双成了男方正室的刀下鬼。案子，至今尚未了断，大导演李翰祥早已特意为此赶到加州拍了一部故事片——不论祸福，中国人的情仇是海峡大洋隔不断，再怎么说，到底“血浓于水”啊。

我不是女儿身，这样的委身之福，这样的杀身之祸，都无缘。我一介“男生”，无情无仇越洋过峡，却无端惹来别种不算故事的故事，或憋屈，或叫骂，或百思不得其解。其中三件还记得情节，且听我说。

80年代初，纽约的“大陆客”极稀少，给台湾华侨遇见了，都属于“大陆沦陷区”来到“自由世界”的“新鲜人”。一对原籍山东，身为“国军”后代的台湾艺术家夫妇待我甚好，熟悉了，就娓娓诉说当年怎样在青岛海岸眼瞧着父辈乘坐的军舰撤除栏板仓皇离岸，又怎样用金条换了黄牛票南下广东沿途要饭一路漂流去台湾，真给我开了民国人叙述民国史的启蒙课。因都是画画的，自然被引去海外华人同行间走动。某一日，是哪位当地侨界的大佬设宴请客，饭

后铺开笔墨轮流涂写，当场吆五喝六，只管自说自话。记得夜半众人在他家门厅做状告别时，他犹在兀自发表高论，不肯歇：

“我早就说了嘛！你们中共那套行不通的！”他像毛主席那样一挥手：“毛泽东，利用你们这些红卫兵破四旧，你们懂什么？你们受的什么教育？中国文明五千年啊，你们破！你们破得了吗？！”

引我去的台湾夫妇忙说道：哎呀人家也吃好多苦啦，不是红卫兵！但他岭南口音的国语越说越响，翻来覆去那几句话：“我告诉你，这里是美国！你毛泽东来试试看，你们红卫兵来试试看，行不通的！我告诉你！”

夏夜沁凉，周围枝叶拂动，树下是这么一群中国人听他静夜里教训滔滔。我那年未及而立，肝火还盛，只因胃里才刚填满人家的好饭菜，发作不得，单是瞪着他镶金嵌银的牙听着。他说说也罢，还就盯牢了我一个，胖手指朝着我脸跟前“你们”、“你们”地戳过来，好像我就是红卫兵，就是毛泽东。

但凡出过国门的哥们儿都有类似的经历，便是大陆同胞餐聚酒后，也常为了共产党毛泽东之类争得当场摔碗筷掀桌子，闹到绝交离婚的都有过，何况资深的“海外赤子”。日后见得多了，其中还有位与这医师同类的角色，骂归骂，一朝给请去大陆做贵宾，受宠若惊受惊若宠，回来发表文章是连自己上了庐山住进当年蒋介石毛泽东落脚的“一号楼”，怎样地在红太阳蹲过的茅坑上蹲蹲，委员长坐过的马桶上坐坐，也都一五一十写出来，登出来。

两年后遇到另一位手指戳上来“你们”、“你们”的角色，素不相识，又没碍着受人一饭的面子，我可就知青脾气管不住，自己也破了相了。

是在唐人街哪家台湾杂货铺约了一位朋友见面取物，顺便陪朋友就地选个背包之类。那老板娘那天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是上下打量左右为难。过程不甚记得了，结果是她一把将背包从朋友手中拽下

来，说要买就买，挑挑拣拣的这里可不是“你们大陆”，说着，还就撩动手臂将我们往外撵。

在“我们大陆”，这一套领教得还少么，那天，老板娘的“服务态度”其实不算什么。可无端地给她这么撩着撵着挪到店门口，我就从耳朵里猛听得自己一声暴吼：

我——操——你——妈！

老板娘，双眼瞪直，随即身子一挫，变了声地嘶叫道：你、你要怎样？好哇！你们红卫兵！共产党！我看你就像个共产党！这里是美国呀我告诉你！你们还想来共产吗？

什么做人的教养，什么艺术的熏陶，那会儿，我这才发现少年时混迹江湖的流氓相存得好好的半点没改。既是破了口了，我就直着嗓门大叫大骂：老实告诉你我他妈就是红卫兵就是共产党今天我他妈就要共你的产砸你的店你信不信我操你祖宗操你个妈——失态的叫骂其实不是叫骂，那是一连串声带震动头腔共鸣耳膜酥麻血液循环的生理快感，什么高血压低血压心血管毛细血管满身子里所有毛病的最佳疗法应该是破口大骂。朋友将我使劲拽开，路人围拢，没一个帮她，没一个劝我，是啊，这里既不是大陆也不是台湾。论个头论嗓门论粗暴她都不是对手，若非她是个女子那天恐怕免不了要开打……。可有那么一瞬，我瞪着她面无人色的脸忽然心里一闪发现被她的恐惧感动了，真的，是感动，不是怜悯。怪了，失去控制居然还会被“感动”么？她给夹头夹脑骂得缩回店里像是求助她的夫君，这时我才瞧见有个男子在里间账台顽固低头认真算账的样子，死不抬起脸来：他听到每句叫骂，但他显然被“红卫兵”吓懵了，那恐惧的模样犹甚于他的妻。

事后，我想起那年真的红卫兵一拥而进动手抄家，我的外婆也是这么坐在床上认真低头装出置身事外的那么一副可怜相。

呜呼。这第三回我面对的是哪位同胞呢？我去到台湾——为了

血缘关系，为了再亲近不过的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1930年黄埔毕业，1950年出走台湾，直到我1989年春获准进入台湾省，不消说，祖孙俩从未见过面。

怎样获准赴台，祖孙怎样见面，以后慢慢写。我这里先说一段，不是他教训我，不是我俩吵架，是他初见我时说的那番话，我好久不明白。

详细过程不去说了，当我在台中街头与八十二岁的亲爷爷手握臂抱搀他老人家进屋坐定——他妈的当时那感觉根本没法子写——我给他点一枝烟，给自己点一枝烟，俩老小对坐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该说什么，电影里亲人相见泪眼凝视那是导演胡编。我只觉眼前分明是至亲的尊长，又是对着个陌生人，记得间歇叫得几声爷爷，无非说些初来乍到总得说的话。老人应着，沉吟着，并不看我，半晌，爷爷喉咙里总算说出成句的话：他不提他儿子即我的爹，也不问问守半辈子活寡才刚去世几个月的我奶奶，头几个字，我分明听得竟是“解放军”。

爷爷

我的祖父，摄于台湾。

“解放军，”他一个字一个字平静徐缓地说道：“解放军待我，还是客气的，一般俘虏，兵，睡稻草，他们给我棉被，放我回去，还给银元。”

我搜索记忆，想起父亲说过的往事：祖父时属黄伯韬兵团，淮海战役初期——爷爷是“国军版”说法：“徐蚌会战”——尚未交火，即给解放军团团包围，不战而败，俘虏了，他瞒了军官的身份，又给放了。其间，时在上海念书的父亲曾收到过祖父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信，照爷爷现在的说法，解放军给他睡的棉被不睡稻草，知道他不是兵，怎么又放了呢，我就问，他好像说是那会儿愿留的留，愿走的走，整批地放人，他是瞒了几级被当成下级军官脱了身的。

那回我在宝岛待了一个月，临走对爷爷说您跟我回去吧，他喝道：我一过海关，就枪毙啊！

四十年天涯离散。至今我想不明白骨肉团聚那一刻，老人为什么偏偏说起解放军？我们通了十几年的信，所谈不过是家人情状，从不语涉国事，倒不是为了谨慎，更不是如那医师和老板娘的对于“中共”的惧惮，因大半通信是在中关之间。在海外，凡我遇见直接与“共军”交手打仗的过来人，说起国共恩怨，大抵沉静若平常然。那些日子我与祖父昼夜交谈，惊讶他对今昔国事毫不在怀，倒是我常引他说说往事，可是征战，被俘，败走，流亡，他都意态隔漠，仿佛事不关己，那天他开口说起解放军，即不带丝毫痛心疾首的感触，不过如所有老人不经意不连贯的思绪回忆，自言自语，人称代词亦且用的是“**他们**”，不是“**你们**”。

我从未问过祖父何以在我俩初见之际是那么一段开场白，也未想到问。直到此刻写出这三回事，这才恍然若有所悟，但也只是猜度：

那侨界的大佬，80年代初想必头一回遇到个“红卫兵”活靶了，大吐唾沫；那老板娘，想必平生头一次撞见个大陆的活人冲着她凶神恶煞：我的出现，唤醒了“海外赤子”对“赤色中国”的情结和

抗日解放战争期间战地
[illegible]影像，之一，之二
之三　国民党冯治安将军
[illegible]　之四　黄维陆军

想象，因此我在他们面前遂自动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佬的客人，又代表“你们红卫兵”，既是店家的顾客，又代表“你们共产党”。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他们没错，他们还能怎样？——那天，当我抬脚走进爷爷的家门，我既是他的亲孙子，也是祖父在“徐蚌会战”四十年后第一次与“共党”营盘的活人面对现前，伸手一握；那一刻，我刚从多年的书信照片上变成我爷爷活生生的“孙子”，祖父，则其实从未当过半天爷爷：他尚待唤醒身为祖父的现场意识，然而，他当过“共军”的俘虏，在这位来自大陆的年轻人面前，战败的经历抢先唤醒了他。

那天下午，历史见面了，彼此点起烟来。

至于祖孙俩迟来的天伦——天伦之乐？还是天伦的辛酸？——那是后来的家常故事。傍晚，我搀扶着爷爷走到街上餐馆，落座，点菜，一老一小平生头一次同桌相对，吃晚饭。

我的祖母。我的守了四十年活寡的祖母。她暮年的遗愿 她心中的"鹊桥相会"，是"把你爷爷叫到香港，我要隔着罗湖桥好好骂他一顿！"真的，她曾平静地，笑眯眯地将这念头告诉我。这幅照片不知摄于何时，也不知怎样辗转到我祖父手里。1989年与祖父台湾相见，我在他所藏基督徒手册的塑料夹层里发现这张照片。

饭米穗

就是现在，我还像小时候放学回家，喜欢舀一勺隔顿的米饭空口吃。酒会派对结束，身上还穿戴着，到家进门直奔厨房挖冷饭，一边嚼着，一边如厕宽衣。吃相当然难看的，吃相难看，味道才是好。洋人的点心、大餐，侨社的宴席、日肥，都吃不畅，非要满勺子净米饭甜津津咽下去，这才通体舒泰，心里那份踏实，简直可比组织上刚给落实政策，重新做人。

煮熟的米粒，上海话俗称“饭米穗”。幼时吃饭，饭米穗落到碗沿桌面，大人都叫留心捡起，若是掉在地下，我家外婆会扫拢撮合，聚在调羹或手心里，嘴里念叨“罪过罪过”，实在太脏了，并不扔掉，留着粘贴邮票之类，若饭粒尚呈白色，就拿到水龙头冲洗干净。洗过的饭米穗，入口已凉，微微有自来水腥，转瞬嚼暖和了，泌出米饭的微甘。

孩童的味觉。孩童的味觉若是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饭米穗就等于山珍海味。

米饭，从来是亚细亚人的口腹圣经，在兹念兹，一日不可或缺。四邻友邦的吃饭花样，我略略领教过的：印度人总要给米饭加入咖喱肉糜之类，似乎于米饭的原味毫无感应；日本人以瓷盅盛那么一小撮晶莹米饭就着生鱼片慢慢品，有斋供的敬意，太仪式化了；韩国馆子用石造粗碗烘焙白饭，趁滚烫浇上酱料攒眉歪嘴扒着捋着吃，闷祸似的，好像要去赴死，又忒夸张热烈。至于云南人以竹筒宽叶

包藏，新疆人用油搅拌用手抓，多少都有点以辞害意，属花拳绣腿一路——我这议论虽说大有“米饭沙文主义”之嫌，但“米饭文化”的“正本清源”，窃以为到底还是在华东江南农家市民的饭桌上，中国人，不过将米饭煮熟盛满，拿起筷子往嘴里划，日常就几口萝卜青菜，朴素大气。

八月里，抢收抢种大忙过后，我插队所在的赣南山民围桌聚餐，那饭是大锅里煮沸了，舀去米汤留着喂人又喂猪，半熟的米，沸腾着，随即倒进木桶支在灶上猛火蒸，熟了，米粒全体竖立，峥嵘蓬勃，众人的喧哗顷刻静下来，人手一碗埋头划饭，竞相吞咽着，瓦屋厅堂的气氛一时忙迫而肃穆。双抢会餐的规矩是还没上菜米饭先来空口吃它两大碗——依我看，这才真是对米饭的敬意和亲昵——待厨下吆喝着鱼肉菜蔬端上桌，正餐这才开始，此后，眼瞧两尺深的大饭桶顷刻见底，旋即添满，各人就着菜肴每碗论斤的新米饭一口气再吃个五六大碗，不在话下，上海市井是叫作“割了头颈倒下去”似的。其时，粮食定量早已实行多年，“饥荒年代”记忆犹新，所以山村里双抢会餐的美味如杀口肥猪磨几圈豆腐之类倒还在其次，这一年一回白花花的米饭敞开痛吃，才是天恩浩荡，能不拼命！自然，干部的嚼饭之道是在例外，记得大队书记每上社里县里开大会回来点着马灯作报告，说起领导关怀头一条：三顿干饭每餐“尽拽”，即赣语尽量盛饭绝对管饱的意思，给底下终年半饥的众村民听了，唏嘘浩叹，有位姓温的壮汉每听到这里就往地上吐口痰，讪笑着，从牙缝里开始骂娘。

新米饭。稻田里新熟的稻米煮成饭，诸位吃过么？不能提。我是后来哪怕读到旧小说里描写征途中“埋锅造饭”四个字，便即口水渗出，简直患了食欲“意淫症”——以文字描写美食，尤其为今人所写，我总不爱读，也为其中有意淫的嫌疑么？然而这类文字似乎既不“意”在真的美食，也未见得怎样“淫”在文辞之间，即便

写得闲雅别致，总觉得哪里不舒服，不对头，或如罗兰·巴特《神话学》所说，多少有点“过度谈论”的意思么？我说不清。要说“口舌之欲”，我是宁可张嘴痛吃闭口不谈，一如汉民族的对于米饭的吃法，去尽夸张，毫无修饰。

然而这回我也来凑趣了，理由或可说是粮食不比美食，饥饿不是嘴馋。在我辈的口腹记忆中，粮食比所谓“美食”更其刻骨铭心，而我辈幼年，哪里尝过什么佳肴。只是这“饭米穗”题目起好了写到半路，我就废然搁笔：我到底想说什么呢？

今春，我预备举家移回国中，整理粗细旧物，在抽屉里意外翻出一份小小的“私人文物”：我晓得怎样写下去了——

那是一纸三十八年前本人写给母亲的短信：纸色黄褐憔悴，形同马王堆出土残简，字句不加标点，直追“古文观止”，所幸其中的数字虽重复再三，事情倒是交代得还算清楚，“断句”不难：

妈妈

上次爸爸来拿购粮证去买米他去买8月份的米过了34（三四）天外婆去买米粮店说8月份的米都买完了为什么还要买8月份的米现在爸爸去买米已经全步（部）都算9月份的粮食了下次你们来要带粮票购粮证的粮食只有27斤半了都是算9月份的了

祝你们身体建（健）康

1961年8月17日 丹青

那年我满八岁，母亲在长兴岛农场劳改，父亲在另一处农场劳改，都是右派分子。外婆，光绪年间生人，小脚、礼佛、吃素，不识字，不知粮证印戳表明当月米粮已经勾销，所以在粮店无功而返。推想起来，应是外婆要我给母亲写这米粮告急信，其时父亲染病，我

[illegible]

与爸爸来拿赊粮证去买米他去买8月份的米还336斤外婆去买米粮店说8月份的米都买完了为什么还要买8月份的米现在爸爸去买米已经全部都算9月份的米下次你们来要带粮票！

粮食

赊粮证的粮食只有27斤米了都是算9月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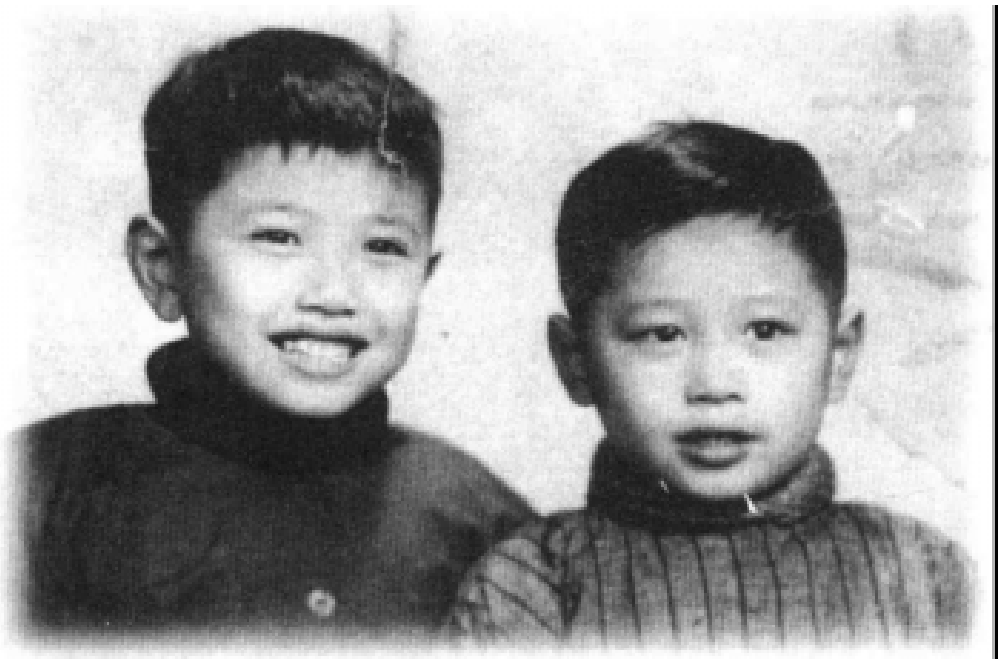
祝你们身体健康

1961年8月17日母亲

记得他曾回沪就医的。

我念给女儿听，她躬身狂笑，笑她爹通篇在那里说“米”。我不解释：那时米粮的定量，她不会懂得，懂得了，也难有体会。逃荒要饭，我从未亲历，有米可买，绝对算不得什么悲酸的经历的。若不是这封旧信，我完全不记得有过这么一回事。我也大笑了，笑这件卡夫卡式的“文本”，不是么，卡夫卡先生？

这大概就是我的“文学功底”，“写作开端”吧，我很佩服自己了。信中惟一不可考处，是“购粮证”三字竟写的繁体，一笔不少。我寻思半天，只有一个可能：粮证封面上“购粮证”字样，想必当年还用繁体字，我是照抄的。粮证，今已不存。原信复印如图，另附我八岁时与弟弟的合影：看绒线围脖，时在冬季。兄弟俩咧嘴欢笑，想必那年九月过后，我家不缺米。



我八岁时与弟弟合影。

大上海

“反革命分子”，恐怕在模样上先就与常人有异。赣南穷乡我们村里的那位，面色灰暗，目光阴沉，谁都在田里与他保持距离。总有两次吧，我听得身后锐声叫骂：“你这反动的！你这反动的！”回头看，又是那位面色黑红的大队书记视察经过，脱下左脚的鞋，响鞭似的朝他后脑、脖梗、背脊狠力抽打。

他不避、不挡、一声不吭，只是缩着上身。书记走了。他仍缩着，慢慢从草帽下抬眼察看形势——乡亲从不看他，他也不看村人——这一看，就同我视线接触，眼里竟微有笑意，镇定而哀苦。他的年纪，现在想来是五十多岁吧，枯败得像是七旬老人。

收工了。洗脚洗锄，他也自动躲在溪水转弯处独自收拾。一天我在溪边撞见他，两人默默。

“北火车站？！”他忽然悄声开口：“你们从上海来江西，是从北火车站上车吧？”我惊愕，答说是。他四顾无人，又是微有笑意，那样子又“反动”又凄凉：“你相不相信，我到过上海！‘八一三’打仗你知道吗？我在谢晋元部队当排长，我们在北火车站驻防了两个月，后来撤走了，还没得进过你们大上海哩！”

“谢晋元”，那时我哪里晓得，既是在谢部当兵，一定是国民党，听来犹显得“反动”。“你们大上海”，则乡下人讲起知青的来处，都这么说法。

溪水潺潺。他又复低头，好像不曾同我说过话。

不久他死了。没有葬礼，所以我们不知道。后村口小坡添一处新坟，周边是翻掘过的赣南的新鲜红土。他的破屋也在后村口，我经过，看见他的妻，同样坚毅而枯败，长得不像农民，比农民更像蒿莱草芥。她的额发跌在脸面前，低头伏在自家土田的菜蔬间拔草，一句一句向着泥土喃喃说话。

曼哈顿。是初到纽约的某一日，星期天黄昏，路人稀少，我在下东城十七街百老汇大道交叉口向一位瘦老头问路，对话自然是英语。他指点过后表情狡诡地问道：中国人？对。中国的哪里？上海。老头子忽然一笑，清清楚楚说出一句准确的上海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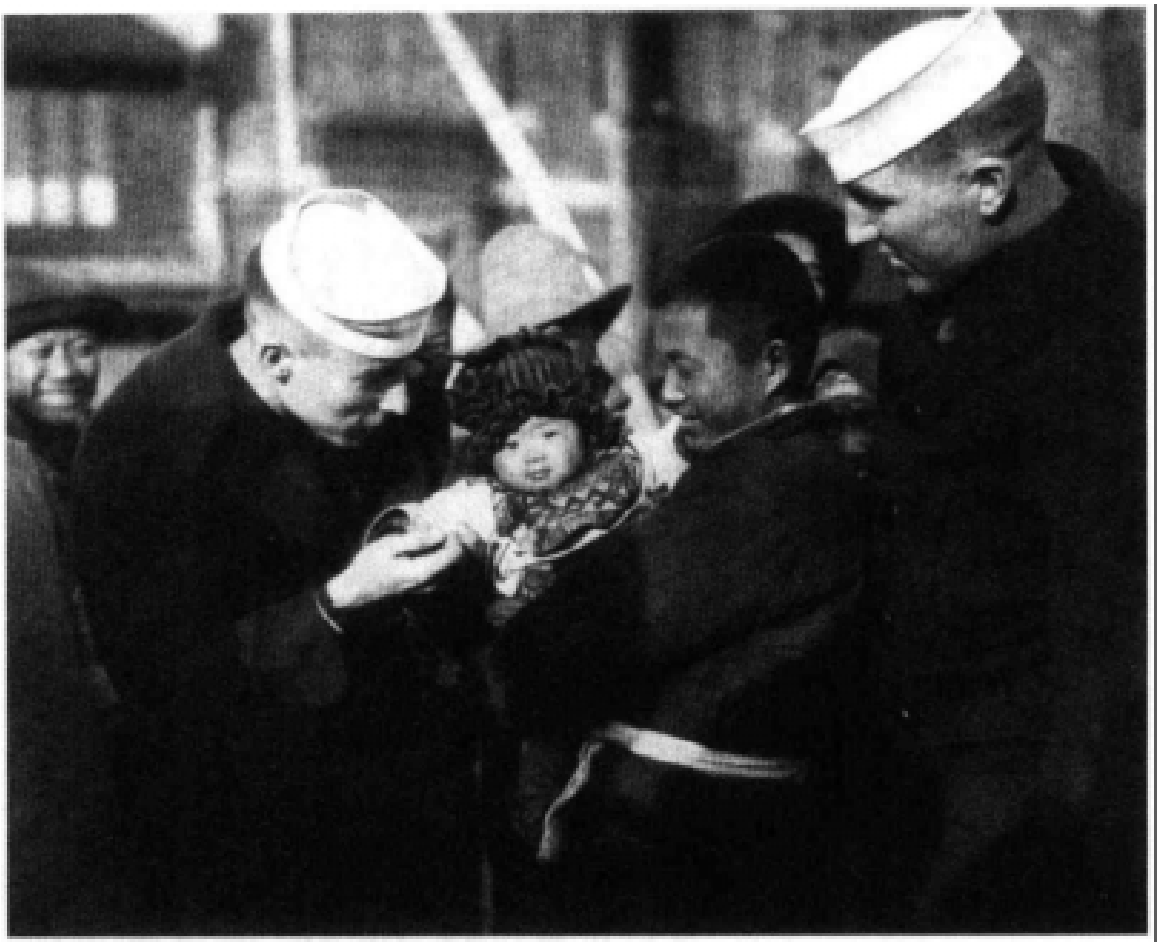
“王家沙！侬晓得伐？王家沙！”

活见了鬼了！偏巧我家就住在石门路南京路一带老字号点心楼“王家沙”左近，幼时常去的。近年回国重访旧地，店名依旧，楼面翻新，弄得像是麦当劳。

“哈！”老头子兴奋了，神经质地说出一连串上海话：“葛么弗要客气，来白相，生煎馒头，小馄饨！”

大衣破旧神情委琐，他像是纽约随处可见的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人。我旋即猜测他是当年驻防上海的美国兵，于是追问：你在上海时是四七年还是四八年？

他像鞠躬似的点头默认，同时脚步移开表示告别——美国人从不如上海话所谓“轻骨头兮兮”同陌生人在大街上瞎谈——“侬弗要客气，来白相！”他且走且说，叨念再三，对着暮色四合的大街，显然是说给自己听。想必他为自己的记忆力和准确的发音很得意，想必他几十年来鲜有机会同真的上海人说这几句红色中国的方言——“侬”，即“你”，“伐”，即问号，“葛么”，即“那么”，“白相”，“玩”的意思，“轻骨头”则是“轻佻、不识相”之意——我隐约记得这位老兵凄凉镇定的老脸，此刻写到，忽然就想起山村里那位谢晋元部下的“反革命分子”，先来写他，是同那美国兵相比，他资格老，死得早。



两位美国兵在上海街头与中国儿童嬉戏。取自40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参政消息

普京访华"向东看"

民进党当局面临深重危机

（仍有消息，仍可参考）

参考与消息

《参考消息》，现在不知还出不出，若还在出，不知可有人读。70年代，神州大地亿万尧舜就凭那几页纸“参考”世界上一星半点的“消息”——神州大地亿万舜尧的点滴消息，自也不免被世界参考了去。

参考什么？什么消息？

年头远了，我仅记得其中一条消息的几句话：是在1972年中美之间闹“乒乓外交”那一阵，不记得是尼克松基辛格来过了还是还没来，反正美国乒乓家们已经来访过京沪一带，又飞回去了：赶紧看“消息”，看看美帝国主义分了——亦或“国际友人”？——怎么说。我仅记得的那个细节是球队中一位黑人球手接受采访的发言，他说，上海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完全没有夜生活。“夜生活”？那时全然不懂，晚上除了“一片漆黑”，还能怎样？还要怎样？但是接下来这位球手的一句话深深刺伤了我：

“我再也不想来了。这是全世界我所见过的最乏味的城市！”

那么他去过“全世界”。至少，他知道不乏味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晚上一片光明？有“夜生活”？）。那时，对我来说，“全世界”最乏味的地方是我落户的赣南宁都穷山村——在山沟里的全体农民、全中国的上海知青心目中，“大上海”绝对是“全世界”最美好最灿烂的大都市！吹熄油灯，钻进蚊帐，眼睛一闭——八仙桥、十六铺、城隍庙、静安寺、淮海路、大世界、煤球炉、水龙头、抽水马桶、锦

江饭店、有轨电车、永安公司，全都走马灯似的旋转起来，还有呢？还有的是呢！的确凉衬衫、老克蜡皮鞋、美琪电影院、永久牌脚踏车、老大昌蝴蝶酥、红房子罗宋汤、葱油大饼糍饭团、牛肉清汤蟹壳黄、粗纹唱片七十八转、细纹唱片三十三转，蓝色多瑙河天鹅湖是窗帘拉起来偷听，杨乃武小白菜梁山伯祝英台是无线电电唱机电插头连接线电灯泡统统搬到弄堂大家一道听，三楼宁波阿爹二楼广东阿婆前厢房俏阿姨亭子间俊大嫂客堂间复员军人四百五十号张家阿六阿七一千一百零一号李家老二老三还有居委会副主任八十岁的老娘老虎灶“猪头肉”五十岁的姘头小业主“丝瓜精”二十岁的千金小菜场“四不清”刚满周岁的双胞胎加上小学校放了暑假的小赤佬小瘪三小流氓小众生窜过来奔过去是满弄堂竹榻板凳葵扇毛巾香瓜子茶叶茶冰激凌赤豆棒冰西式刨冰短裤背心花裙子花睡裤夹脚拖鞋木拖板脚趾膝盖大腿肚脐眼爽身粉风油精花露水香肥皂药水皂头发烫烫辫子扎扎一会儿散开来一会儿盘起来我操他娘什么叫做夜生活睁眼看看这活色生香的夜生活不是夜生活什么叫做夜生活忽然一声尖叫隔壁有人偷看洗澡忽然齐声大喊隔壁弄堂逃过来两个小偷当场众人捉牢忽然八点半家家户户无线电开开中央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一本正经男中音宣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至今还记得撵到赣南头一年八月骄阳水稻田日头暴晒口干舌燥我狂想上海一毛九分一块简装“方砖”冰激凌是越想越热越热越想，记得每年回乡下旅行袋里是带给乡亲的夹脚拖鞋带给自己的腊肉香肠奶油糖青菜干固体酱油加上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高尔基《我的大学》周树人的《呐喊》鲁迅的《彷徨》因为一辈子只能当乡下人再也回不了上海当不成上海人可恨上海的派出所已经划去我们的名字在户口簿上图章一敲一笔勾销了呀上海啊大上海！最最记得十七岁那年辗转出山长途跋涉爬进火车一路是鹰潭诸暨金华杭州嘉兴大清早火车终于开近上海开进沪西窗玻璃外灰秃秃水泥楼群越来越高天蒙蒙亮一群群黑压压上海

人骑在脚踏车上放下腿脚被扳道工挡在铁路边缘景象壮观眼睛一热好不委屈啊上海到了上海到了眼前这可不就是日想夜想的大上海！那一刻，风驰电闪开进上海的火车轮子那每一声轰鸣震荡震荡轰鸣都在上海游子心窝子里密集敲响同一声最强音：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呜呼。“全世界最乏味的城市”。这就是可恶的美国佬从上海参考到的消息？这就是我从《参考消息》中参考到的消息。我记得当时心里面只是黯然，黯然，黯然，“一片漆黑”。

Anna May Wong，1907年出生于洛杉矶，是第一代美籍的美籍华人女演员，1931年出演由史登堡导演的经典好莱坞影片《上海快车》。

《上海快车》

曾儿何时，我竟在纽约莫名其妙成了据说是全世界最最“Exciting”（“刺激”、“兴奋”）的城市居民——那位污蔑我大上海的美国佬在哪里？应该将他押到今天的上海听听沙逊大厦老爵士乐手懒洋洋的鼓点和萨克斯风，逼他喝一杯新兴上海酒吧的高级咖啡，看他还敢不敢说上海没有夜生活！对了，索性押他到浦东对岸那座“东方明珠”顶上去，一定要在晚上，让他睁眼看看光明灿烂的新上海，看他怎么说！

不过我也没上过“东方明珠”，隔着黄浦江远远望去，真难看啊！

纽约。纽约的晚上一片光明（无非电力充沛），处处“夜生活”（无非精力充沛）。我待在寓所里，记忆力很充沛，倒不在想念上海北京，而是想念我去过的敦煌、中原、西北、江南，也想念我插队时每分钟都妄想飞出去的穷山沟，那全世界最乏味的地方！

但有一次我无端想起了上海——不是我要想念，是一位美国人要我想念，想念我从未见过的那个旧上海，那时，我还没生出来。

是我的画廊的老板杰姆斯·考克斯，说一口委婉低沉的中音，在他带我们周游西部夜宿旅社时，聊开了，说起好莱坞电影，忽然就说起上海。他瞧着我，眼神迷茫：啊，去上海，那是我的梦，知道吗？要说好莱坞最好的电影，要我说，就是30年代的《上海快车》，那时的上海！明白吗？那才是大都市！

不明白。但我们很好奇了：说说看，怎么回事？但考克斯显然沉浸在他的遐想中：不是遐想“上海”，而是那部电影。他只是要我们到字典里查一个词：“Mood”，他神秘地说，那个词意，即《上海快车》使他难以忘怀的魅力。

考克斯，40年代出生，他那代人若是富了，风雅了，在曼哈顿中上城地段与上流社会混，或干脆就属于上流社会，都格外怀念3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上流”故事，而好些个上流故事就发生在北非、南亚、东亚的殖民地。他这代人错过了殖民时代，不可能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去到那里，穿着亚麻布的浅色西装，荡着锃亮的手杖，留一段浪漫往事，所以他们想念30年代，想念那些电影，以至想念“上海”。

是啊，中国还有一个可以让洋人想念向往的城市！我们但凡读过点翻译小说或常看外国电影的，也不免在自己心中存着一个天外的城市而永远不可能到那里去：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卡萨布兰卡？旧金山？还有纽约？——可别去啊，可别去，去了，也别留下来，留下来，就像我在纽约，弄得记忆力充沛有余，忽儿听人说起上海，便即浮想联翩：30年代的上海，萧伯纳去过，我知道；卓别林在那里举办他的第三次婚礼，我也知道。我还知道在那段年月里柔石给枪毙了，阮玲玉自杀了，胡蝶跟着梅兰芳访问莫斯科，杜月笙在浦东做大寿，鲁迅在山阴路写文章，而“赤匪祸首”瞿秋白陈赓偷偷去老先生家里玩，画苏区的地图，吃夜点心。

然而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事，现在，这位纽约画廊老板心中的上海是怎样的呢？但他只是恳切地要求：告诉我，多告诉我一点，上海怎样？

我没法告诉他上海怎样：我不认得《上海快车》中的那个上海，我也没看过《上海快车》。关于这部电影的记载，其实就歇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的末尾处：这部电影，当年被国人斥之为“辱华电影”

而成了“上海公案”，导演约瑟夫·冯·史登堡先生就此去了上海，鲁迅则就此写一篇杂文：“立此存照”之一，意思是“辱华电影”也要看，看了，才晓得反省自己——我既是不曾看过，自亦无从反省。今天的中国人，谁还记得这部电影，这位导演么？惟因这部老电影，又因为考克斯记得这部电影，我倒是记住了一句英文：“Mood”。

“Oh! mood, mood!”那夜考克斯先生反复在喉咙深处吟哦这个词。用文艺腔的翻译，那是“心绪”、“情怀”的意思：什么都可以形容，什么也没有形容，然而我自以为明白了，懂了：我又从一位美国人那里“参考”到一点点消息：

有那么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做《上海快车》，但和上海人心目中的老上海，毫无关系。

有那么一位纽约人因为“上海”而满怀“Mood”，但是同我生长的那个新上海留给我的“Mood”，也毫无关系。

息影赋闲的 Anna May Wong

表皮脂肪

少年时，比我大得几岁的青年我就望之俨然，只觉得自己处处不如。我要写的这位，低音，有喉结，冬天是蓝布对襟棉袄，羊毛围巾像“五四”青年那样往肩后一撩，额前的长发也那么一撩，是了，有点像当红明星王志文，比王志文标致多了。

假如记忆不很错，60年代的不少高中生，很有样子的。从老照片看，二三十年代的学生更有样子——我是因为要画周恩来年青时代在天津的连环画，特意在北京图书馆翻了好几天《良友》杂志，这才看见了“旧社会”高中生大学生的好样子——但那时还没有我，轮不到我来说。

他也学画。从不见他画，但他会说。那天我献上一幅描绘男女知青欢快劳动的油画草稿请他指教，他额发一撩，很标致地观审片刻，神秘，亲切，郑重地开始了，像是准备介绍我入党的老党员：

“你要记牢：画小姑娘，顶要紧是画出少女那种青春期的表皮脂肪，懂吗？要把表皮脂肪画出来！你到马路上去看去，十六岁，顶多十七岁，面孔，还有头颈，仔细看看！”

我很佩服了——我正学用苏联人的方笔触一块块“摆上去”，哪晓得什么“表皮脂肪”——同时就心跳加快。在那样的岁数，当年有人私下同我谈女人，心里就慌张，不知怎样接腔，更不知怎样回答。

那时他早已过了分配下乡的年龄，托病避过，无业，闲着。他还给我详细描述他的恋爱：怎样地瞄过去，怎样地约出来，怎样地

接吻，吻在“耳朵后面靠头颈”的部位：他似乎对“头颈”情有独钟。而他那位资产阶级女朋友家里被抄过之后，怎样地还是很有“资产”，让出一层楼，还住一层楼，家里“派头”很“高级”，请他喝过咖啡，一杯只倒“一眼眼”，上海话就是“一点点”的意思。此外，好像是因为在公园的树丛假石太深处留得太晚，给红卫兵捉去，可她不怕，还回人家吵。

恋爱、性、派头、咖啡，即便浩劫当头，仍在上海的角落悄然潜行。亏他启蒙，我从此看见了凝在青春少艾颈项耳际处那层腴润爽腻的“表皮脂肪”。

他死于心脏病，好好坐着，死了，年纪二十出头。

她后来嫁给谁？她的照片我也看过的，是照相馆那种花边黑白照，侧光柔和，“一眼眼”像王丹凤，便是“文革”期间，沪上资产阶级闺女们仍然晓得怎样模拟民国派头：额发很当心很自然地梳弄过，她们抬眼凝眸，抿嘴浅笑，毫不做作地做作着。现在，超级明星如巩俐，电影里学起民国女人的“派头”也是言不及义，远不如“文革”时期一位上海弄堂小姑娘。这小姑娘如今可别也像满街阿姨大嫂老来头发乱烫、衣服乱穿呀，君不见曾经很有“派头”——上海话即造型、风度、气质——的大明星如王丹凤、田华、张瑞芳、于蓝诸位，电视一亮相，头发都烫着，耸着，像是顶着一朵花菜，又像一蓬烟。

基本如此鬼见愁

是在上海图书馆西楼楼前——现在是造起上海歌剧院了——1966年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啸聚楼内。某日，一位黄军装、宽皮带的俊姑娘单独走出大楼，朝着铁栅栏外围观的层层叠叠上海人当面站好，猛地解开皮带，飕飕挥舞，京片子娇声喝道：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

以我的偏见，俏姑子着男装，最是好看，记得那双黑布鞋尤其好看，白袜，脚背高，满出鞋沿。

写这种细节，那位胡兰成有笔法，胡兰成，民国人，下面会再说起他。他在武汉爱上十七岁民国护士小周周训德，俩人去汉江滩头散步，他就一路看她的脚，写那穿布鞋的脚看过去"圆致致"，这"圆致致"，本是江南方言，有所指，也无所指，可解"圆圆的"意思吧，但普通话一念，即无趣，味道也不对，"致致"二字，不能卷舌，节奏必须快而轻——这就是方言的好。

方言，尤其是北方普通话"语系"以外的各地方言，解放后总是吃亏占下风。譬如"鬼见愁"的"愁"，则吴语不卷舌，比那红卫兵俏小姐读来的卷而又卷，字正腔圆一口娇气送到底，味道、效果，差远了。当年挤在人堆里听罢，只觉得满口唇齿音的上海人登时矮了一大截，沪语土话，是叫做当场"吃瘪"，记得众人眼瞧那姑娘叫嚣完毕，扬长而去，一时目瞪口呆。

青春的名实

在《日常中国》的短文堆里读到一篇《裙子》，在《裙子》里读到这样的句子：

> 在时下那些快乐的少年人眼里更为可惨的是，你不但没有“中年”，甚至没有名副其实的“青春时代”。

我就低头想：怎样地才算是“青春时代”？而且“名副其实”？送花、接吻、飙车？还是口红、指甲、染发？是电玩具、迪斯科、流行曲？是伦农版金斯堡版琼瑶版张学友版还是崔健版？是指梁山伯祝英台还是罗密欧朱丽叶，张生崔莺莺亦或保尔冬妮娅？少年维特自杀了，宝玉出家，娜塔莎被道洛号夫拐走，玛丝洛娃怀了聂赫留朵夫的野种；美国专给十三至十七岁少男少女出版的杂志《TEENAGE》经常介绍避孕法避孕药以及出售避孕套避孕环的店家与价钱，更有一百种以上的恋爱指南：如何勾引如何约会如何疏远如何甩掉对方如何才能不伤对方的心也不伤自己的心；还不够么？请根据您的或他（她）的星座属相参看每期专栏分析。

《裙子》的结尾是这样分析的：

> 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使今天的年轻者相信，那一代人也自有那一代的快乐；你总不能不承认，你的人生是更为残缺不全的。

“那一代人”，想必是指“文化大革命”一代：不是红卫兵，就是老知青吧？一连“中年”也“没有”的红卫兵大婶老知青伯伯

呀：你们“总不得不承认”，你们还能埋怨是那场革命毁了你们的“青春时代”，致使你们的人生“更为”残缺不全，但“今天的年轻者”真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使你们相信，真的：你们“那一代人也自有那一代人的快乐”！你们能不能告诉“今天的年轻者”：哪一代人的人生能够免于“残缺不全”？哪一种人生才叫做完满而齐全？

我是谁？我就是老知青，我已人到中年。人到中年的证据之一，是我戴上了老花眼镜，凑到灯下，还是看不清《日常中国》每篇短文——包括《裙子》——右下方印的像米粒大小的作者的姓名。

可惨！

动物凶猛

上初中之后，去农村之前，也就1966年到1969年那一段，男女生在课堂里不同座，不讲话，不玩耍。在小学时并座、熟腻、相借做功课的，倘若分在同一中学，窄路相逢了，神色凛然，不交一言，如此者三年——什么冷战呀，断交呀，互不往来呀，我们早就是过来人。

难办的是每天早晨进教室。

女生就座了，小辫子花领子蓝罩衫绿书包之类。男生在教室走廊拥挤吵闹，谁也不肯先进门。群孩里从来不缺个被众人差遣欺负的傻小子，还没看清，怎么地一下子已经给谁猛力推进去，砰然巨响，单个儿给关在教室里了。门边即是排窗，看进去，那男孩脸面紫涨羞恼万端，奋力踢捶门框：我操你的老娘呀！你看好！你看好！这句“你看好”，沪语就是要来寻仇相打的意思，其实是败者的犟嘴与无奈。

男生暴笑，女生哄笑。“操你娘呀——！”他终于乏力坐倒，哭吼转成哀鸣。

又一声砰然巨响，又是来不及看清，门豁然开开，滚出那孩子即与仇家扭打成一团。老师来了，揪开，散伙，在地上的爬将起来，手脸稀脏，表情犹在奇耻大辱与颜面丧尽之间。大家拥进教室，轰然就座。

也有在夺门之际拼死挣扎，头手夹伤的，众人逃散，惟见那可

怜的家伙血淋淋一路嚎啕走去医务室。

“文革”时期的种种花样，说不清那时的少男少女何以如冤如仇。但“文革”少年或许不免老来“自恋”，以为那是我们才有的经历，其实至今的各地“校风”恐怕也还有这道节目吧，且不止中国：女儿回家笑说纽约高中女厕所也常有类似的闹剧，那给强行推入的也总是极矮小而长相丑怪的男孩，哭嚎急喊，力竭倒地，出恭完毕的女生并不帮他开门，还蹲下来递过烟去——有时是大麻——给男孩抽一口。

英国校园的大孩子欺负初级生，则是不列颠文化的悠久传统，至今不衰，专有定期杂志详加记载的，其描述的渊源，或者就是我们熟悉的勃朗特和狄更斯——我们那时的粗暴，现在想来，倒可能出于剧烈的害羞，赤裸裸的无知，并非全然西方人所谓人类原始的攻击欲。在西方近代，少年即出往狎妓，至少熟知父兄的性交往，更不提窥探“成人文化”的自由。那时我们知道什么？在广义的两小无猜的童年过去后，除了“阶级姐妹”这句空话，那满座女生像是一片性别的丛林或深渊，非要有一位无辜的小子先被推将进去，才能壮大家的胆。

后来自然还有零碎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长大，以别的方式拓展了我们的无知。

乡村骑士

上山下乡。这一招，纽约伦敦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可就统统给比下去了。纳粹时期，还有早期苏维埃政权，倒也送年轻国民去乡下的：为什么送，怎样送，手边没有资料，情形究竟怎样呢？不管它。

但至今还是不明白在打发我们滚蛋之前，“组织上”将去每一村落的男生女生掺合搭配究竟什么意思。“阶级友爱”？“互相帮助”？“传种接代”？异性之间总算是开腔说话了，不久即传出有谁“肚皮搞大”，仓皇堕胎，或在野地里生下来，自己割断脐带的消息。自然，也有到后来果然结为夫妻的。

我将要去落户的村子，定为三男三女。名单公布，懊丧之极。其中两女，留级生，其时不过“二九年华”，可在年轻少艾的眼里，略长一岁半岁，就看得形同“老妇”。另一女虽是“年方二八”，与我们同龄，却见都还没见过。所以直到给塞进赣南山村一座木楼里楼上楼下住妥了，三对“童男玉女”还是目不斜视，不交一言。

翌日，两位“二九年华”爬上后山，对着上海方向哭。

楼板之隔，音问不通，如是者好几天。楼下灶间是分开的，隔壁柴火声中传过故意高声的问话：“水开了！先放酱油先放盐？”是在问这边。静默片刻，这边的回答是：“你去问你娘！”

那时的上海女孩的口头经，是“发痴！十三点！”往温柔里解释，这两句答等于是“你呀，干嘛呀”。

村童终日围观，很快就楼上楼下传递情报：几天后，这才知道楼下同龄女给“老妇”欺负，不得眠食，只能咬家里带来的饼干，夜里还常给关在门外。

几番看她单独揣着脸盆去河边洗衣，回转时明知道我们在吊楼上看她，却不肯掉转脸来，只顾朝泥路秧田斜睨着。这可如何是好：虽然她不是美女，可也终归是个有待拯救的“阶级姐妹”，我们早想同她建交的——现在想来，当年为了中美两国娇嗔多年死不理睬，可真难煞了周恩来基辛格诸位。可那会儿好歹还有个巴基斯坦的什么大臣半道儿给中美双方暗通款曲，终于千里“姻缘”一线牵，成了大事。我们呢，楼上楼下天天见，竟是束手无策干着急。

某日，那伶俐的男孩飞奔上楼交出一张纸条，三个男生打开看，只四个字：我怎么办？

建交的细节忘记了。结果是楼上的饭桌添了一副碗筷，她少不了将自家带来的霉干菜腊肉之类献出来，只是眼睛还是一个劲儿斜睨着，不看我们，但是轻声答话，甚至掩嘴浅笑，因为我们忽然很会说话，而且是三张嘴，而且提着油灯送她下楼时在漆黑的夜幕中斗胆吼道：看好！谁要是动她一根汗毛！

我记得我们一起出山赶集去。始终保持着大约半里路的距离，她不走丢，也不走近，二十多里山路，只是远远地，远远地跟在后面。

捉奸与鸡汤

中文实在是妙的。“年方二九”，不过乘法口诀，一算，却“等于”如花似玉的少女，撩人妄想。

我们同村落户的那两位“年方二九”，形容过了，或者说，无可形容——后来自然是“关系正常化”，合用一灶，不是亲眷不是夫妻地过起饮食“同居”的日子来，这“名份”，再妙的古文可也说不像。

“二九”之一勤快麻利，洗蚊帐，缝棉被，很少闲着。“二九”之二，懒，笨，人倒是忠厚的，一锅饭煮焦了，她说：那你们就骂我！

但她会写情书，人是火车上认识的，信，还是那伶俐的村童偷出来，记得三句：“咱们的爱情，就像那珠穆朗玛山的高峰，雅鲁藏布江的流水。”交还她，也只一句“发痴”了事，叹口气，撕了，问：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写呀？

是呀，我们也不知怎么写。

“二九”之一不写情书，她来真的。一说是本村的民兵，一说是临村的小学教师。于是捉奸。赣语“捉”念“扎”，“奸”念去声，尾音拖得重而且长，出口即狠巴巴的。记得是民兵排长亲自出马，“扎奸扎双”，借我们楼上过夜窥伺，早早熄了油灯。

怎样才叫“奸”？捉住了又将怎样？我不很明白，又不敢问，不是羞于问及，是怕笑我不懂。这样地各自躺在黑暗里，不敢说话，不敢笑出声，结果是我先睡着了。

什么也没发生。那临村教师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一年后在坡地

闲坐时自己说给我们听：胎早已打掉了，用的是祖传草药，那草药的名字可惜忘了，换在今天，可以申请专利，赚大钱。

败露的是“二九”之二，忽一日坐在大门口呜呜咽咽烫鸡剥毛，“之一”在灶间备汤水，面不改色，火光映在脸上，静静地流泪——本乡风俗，撞见通奸是不吉利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事主双方各煮一锅鸡汤给目击者冲冲晦气，于是天下太平。这种事，山里没有“司法部门”，“组织上”也从不出面，离婚，四乡里闻所未闻，更没有书报可以讨论“绝对隐私”，要说“舆论”，也就在谷场或井边由婆娘们口头宣布谁请了谁喝了鸡汤了。

那喝了鸡汤的主，早忘了，撞见通奸的，不是我们：反正没我们的份。

列维·斯特劳斯，大人类学家，据说从《生食与熟食》一路写到《裸体的人》，虽然我一行也没读过，却真想知道他那些原始部落的所谓“田野考察”不知可有类似风习的记载。在我落户的山乡，通奸有如四季运行。临家的妻嫂，外村的野汉，上至干部，下至傻子，连十二三岁的孩子：或就柴房，或躲进后山的茶油树丛，孩子犯事，鸡汤则由家长骂骂咧咧“承包”不误。记得在山芋田里曾有两条汉子争辩起来，一个说：苦啊，男人苦！我们这辈子出的精总有一钵子吧？另一个说，哪止！前一位不服：那你说是多少？我暗自心惊从旁听着，但这场露天的“学术争论”终于是溅起泥浆动手打，不是真打，是扭过臂膊，拧稳了，使对方躬身告饶，同时给田里停了锄的“女社员”看过笑过，这才撒手。

我们都到了遗精和手淫的年岁。不说，也不问。我们的性知识仅止于手淫和遗精：那不是知识，只是“二八年华”的身体事实。但从此在村舍山沟里游荡时，我们多么盼望“捉奸捉双”，不为道德，也不为性的好奇，只因饿与馋。可那些年我们从未如愿喝到那口香气四溢的草鸡汤——狗的交媾，却是真给我亲眼撞见了：村口路边，

两匹畜生咿咿呜呜，悸动哀鸣，看过去活像扯不开的死结。一时仿佛天启，我忽有所悟，面红耳赤，但居然还是联想不到人类的行为，还是没弄明白眼前发生的正是人类的所谓“通奸”。

这样惊心动魄地盯着，思考着，猛听得一声叫：“小陈啊！还不快走开！”那是一位在家门口洗衣的大嫂，我分神扭头，看见她一脸又怒又急的憨笑。

我与三位“插兄”——这是上海知青对共同落户农村的同学的通称——在宁都县城照相馆摄，时在1970年冬，我们的平均年龄17岁。

鹊（喜鹊） 杜（杜鹃）
鹃（杜鹃） 麻（麻雀）
雀（麻雀） 骆（骆驼）
虎（老虎） 狐（狐狸）
狸（狐狸） 蜜（蜜蜂）
蛛（蜘蛛） 蛛（蜘蛛）
壁（墙壁） 蛾（飞蛾）
蚊（蚊虫） 苍（苍蝇）
蝇（苍蝇） 兰（兰花）
菊（菊花） 梅（黄梅）
冠（皇冠） 牵（牵马）

910502·8625·86665

女儿九岁移民美国，除了普通话，中文读写随即遗忘净尽。现在，她就读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班，读写则尚未及于她自己十二年前小学三年级程度。这是她出国前语文簿作业之一，写满动物与虫类的名称——喜鹊、狐狸、蜘蛛、苍蝇……

恐怖与效果

闺女的房间传出一声尖叫。几秒钟过去。我们正在客厅看电视。

密集的惊呼再度响起，一声紧接一声：人吓破了胆才会进入这样高的音区，比花腔女高音的音高还要高。闺女夺门而出，肩膀耸缩，面无人色，左手是电视遥控器，右手是尚未挂断的行动电话。

我只好起身。几秒钟过去，那只蟑螂捻在我手里。美国蟑螂只有西瓜子或蚂蚁大小，给她看过——又是一声绝命呼叫——然后丢进马桶，放水冲掉。

鸟尽弓藏。几秒钟后，我像免职卸甲的老将自觉退开。藉此在闺女房间里聊会儿天或看看她的电视节目，是缺乏教养的，何况她与女同学男朋友的电话会议已经被蟑螂耽搁，我是人类，而且是她爹，不能和虫子一般见识。

恐龙、大白鲨、践踏曼哈顿高楼群的大猩猩“金刚”、电脑特技做成的各种狰狞怪兽（眼泡里流出岩浆或虫蛆）、案发现场浓血四溅、照准脸面（还戴着眼镜）轰然开枪、匕首戳进衣服皮肉的全过程、西贡街头的当场行刑、集中营尸骨成堆、原子弹一片白光——平时，我从女儿的门缝看进去，气氛安详宁静，她，还有她的女朋友男同学们，个个聚精会神，脸上映着电视节目的彩光，用英语轻声交谈。冰箱里的可乐冰块，转眼告罄。

（图片提供：邹方霖）

阶级与钢琴

在国中夜访朋友，楼道伸手不见五指，我盲人般趋探蹈步摸索前行，忽然，楼上，或楼上的楼上，传来叮咚琴声。

我就停住，偷听。瞳仁如猫眼，渐渐辨出昏暗中家家户户锅灶碗柜煤气罐自行车等等等等破旧庄严的轮廓。琴声断续，如牙牙学语。在北京、上海、南京，我几度有幸与巴赫或萧邦的钢琴幽灵在浓黑楼道中相遇。据说，萧邦弹奏，他的腻友喜欢聚在他窗下的花丛中偷听，托尔斯泰写聂赫留朵夫访典狱长不遇，狱长女儿在家弹琴，琴声被门关进关出；即便是书中读“偷听”，也仿佛琴声在耳，极之传神。奇怪，在纽约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正襟危坐聆听名家演奏，也不如在这陌生楼道的家常阵地中驻足偷听，魂灵出窍，感动莫名，哪怕偷听的只是小童的初习。

在上海陋巷听到过一回巴赫的帕蒂它，却是弹得好极，时在盛夏，帕蒂它一连串清亮的旋律直如风动水流，巴赫在中国有知音。茂名路康乐村，我的小学的后弄堂，还传出比我自藏的所有莫扎特朔拿大 CD 更精彩的弹奏，我一听，暗暗吃惊：是快板乐段，莫扎特的快板总像一个男孩的跳跃奔跑。是掌灯时分，弄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炒与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我躲在窗下快要一枝烟抽完，琴声止息，窗沿传出妇人的咒骂，夹着仿佛筷子敲在木器上的脆响，接着，一个七八岁男孩嗓音嫩嫩地像是女孩，娇声抗辩：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

今日的爹娘们只要凑得起钱数，似乎不顾家道的贵贱——不，现在的都市家庭只分贫富而无所谓贵贱了——都愿给孩子买架钢琴弹。三十多年前，沪上的穷街陋巷漆黑楼层听不到巴赫萧邦莫扎特，除非在卢湾区徐汇区原法租界阔人聚居一带，隔着篱笆，花园洋房，春日雨后有哪位“资产阶级”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弹琴。那是另一个上海，“阶级”虽已降伏，人还在，钢琴还在，那时，“钢琴”二字即代表出身与阶级。口琴、胡琴、手风琴算什么？“钢琴”可是“钢”做的呀！当年大炼钢铁要不是一败涂地，说不定就会同英美帝国主义争口闲气，拨一堆好钢材打造我们无产阶级大钢琴，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不就爱听钢琴么？

英文的“钢琴”叫做“Piano”，哪有“钢”的意思。

“文革”起，上海的市井奇谈是淮海路东西两头好弄堂里挨户抄家，单是钢琴，抄没一千架！那是我在巨鹿路小菜场听一位弄堂口的赤膊男子亲口宣布的，他拍着肋骨对横在面前排队买菜的人民群众朗声说道：“奈么好哉！我倒想看看伊拉资产阶级从此白相啥？！”翻译过来，即“这下子看看他们怎么玩”。

不久，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对过一家古董店里，我看见了壮观的景象：大大小小通体铮亮的钢琴堆满店堂，不是那么摆开平放，是上层的钢琴脚戳在下层的琴面上，一架摞一架，有三角大钢琴琴盖卸开，沿墙竖靠的，有琴囊里钢丝钢条给掀得翻翘支楞的，更有在琴壁琴盖上被红卫兵用油漆用刀划的标语口号，店铺职员洗刷收拾，只见黑压压层层叠叠挤挤挨挨的钢琴阵地，仅留得侧身走过的缝隙，像是堆满机床的大车间，店铺给堵得一片昏暗，白天开电灯。我在其间走过来，看过去，时年十三岁——我连口琴也不会吹。

国泰电影院那年关闭了，不是关闭，所有电影院都用来做大型批斗会场。临近“老大昌”、“哈尔滨”西式点心店倒是开着，革命

人也得吃点心，可这家古董店铺为什么开着，谁来买钢琴？不久传出消息：60年代钢琴才子顾圣婴与她母亲、兄弟开煤气自杀了。“文革”后一篇回忆文章的作者说是在她寻死前一天亲见她从国泰电影院门口人丛里走过——此刻，店堂里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深蓝上衣黑皮鞋，也在钢琴缝里走来走去，几次与我擦身而过。我一看，就知道她出身“资产阶级”。凭什么呢？难描难写。我只能说，那时，谁家是山东南下干部，谁家是江浙的民国移民，谁家世代当工人，谁家的父母是资产阶级，上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看打扮？资产阶级的子女那时根本不招摇，不打扮，可穿得再朴素也洗不掉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今日上海可瞧不见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姑娘了。“资产”不等于“阶级”。现而今，上海小姑娘越穿得“资产阶级”越不像资产阶级，连高级轿车里钻进钻出有资有产的款儿腕儿，也只见资产，不辨“阶级”。那些年，倒是抄没资产的人家走出个人来，瞧着更像“资产阶级”：他（她）们终于给整得只剩“阶级”，没有资产了。

忽然，蓝衣女孩的右手掀开临近门口一架钢琴的琴盖，探进左手，大姆指与小手指尖平行张开，熟练地朝那黑色的键盘摁下去：那是她家的，还是别家的钢琴？嗡——钢弦震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合弦”。我呆住，等她弹下去，但她随即转过青色的资产阶级眼白瞥一眼店堂，飞快合上琴盖——对了，那年月资产阶级的眼神眼色都这么张皇警惕——她闪身逃逸了。店里有大人迎出来，赶开闲人：又一辆大卡车满载钢琴轰然转弯，停在店门口。

有谁在公共场所目击自家珍爱的贵重物件给粗暴地扔在那儿么？人会不由自主寻过去的，只为看那么一眼。我记得蓝衣女孩在钢琴阵地中的眼神，是一种恨意（阶级仇恨？），又是孩童辨认出自己的玩具或宠物似的单纯的惊异（你在这里！）。那一大堆钢琴日后被陆续卖出，易了主了。谁呢？哪个阶级？最便宜的价，据说是人民币50元。

今日沪上的钢琴小天才，那一个个身家既不像无产阶级更不像资产阶级，阶级真的消灭了，除了钢琴。前几年，“东方时空”电视节目曾追踪拍摄孩子们玩儿命练琴聚考音乐学院的纪录片，多是女孩，考上了笑考不上哭，我听着都觉得好极了，想起那位蓝布上衣黑皮鞋的资产阶级女孩，她该早已是一位母亲。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好几位替孩子进京赶考租房驻扎的父母亲，有西北的农民，有中原城镇的职工，在京城的破烂旮旯里住着，架起炉子披头散发给孩子又做饭又炒菜，孩子呢，脚不及地，高坐琴椅铛铛地弹——如今判然划分不同“阶级”的，恐怕就是母子之间那架大钢琴。记得最后一个镜头是琴声停息，小天才扭头冲着妈急。又怎么啦，妈问，孩子娇声吆喝道：

“翻谱呀！”

（图片提供：邹方辉）

ECCE CONCIPIES IN VTERO ET PARIES FILIVM ET VOCABIS NOMEN EI IHESVM. DICE

油画《受胎告知》，作者不详。

牺牲与死亡

文艺复兴画家喜爱描绘“受胎告知”的画面，构图大抵相似：美丽的天使闪着金色毫光，朝向圣母，躬身作揖，圣母合掌回拜，神色端凝。引申哲学的说法，受胎，亦即死亡的预告——哪家可怜的父母亲若是前世修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厄运，忽一日得到子女的“死亡告知”，什么模样，什么表情？

圣玛利亚目睹儿子钉上十字架，不说那面部刻划，单是看她合掌的十指拧着绞着，即透露母亲心中的剧痛。委拉兹贵支早年画过某位父亲获知孩子死讯的那一瞬，出于什么典故，忘了，只见父亲惊愕地张开双臂，报告的青年则满面稚气，哭丧着脸，好不为难，地毯上，还画着一条小狗冲着来者急叫。

校园里半大不小的孩子举枪滥杀，早已是美国新闻不定期的定期节目。头版照片上，惊魂甫定的同学们总是相拥大哭，而悲恸的母亲竟是真如画中圣母般十指交缠：那是基督教文化的招牌动作，久已塑造为西方人的日常肢体语言了。不过新闻再快总归迟一步：肇祸的狂徒岂会事先通知记者到场？所以家长骤然获知噩耗的第一瞬间，就我所见，从未被摄影机抢入镜头，除非在力求现场跟踪的当代纪录片里恐怕有过的吧，现在满世界的纪录影片，看都看不过来。

战争年代，这类惨剧可就太多了。罗伯特·卡巴那幅著名的西班牙战士中弹毙命的照片，至今似乎也还是惟一的死亡快照，且为影史专家争论不休，说是并非当场拍摄。他的另一幅作品是一群母

亲举着阵亡的孩子的相片，暴哭怒喊，但毕竟不是“死亡告知”的第一瞬间。这时，艺术的虚构也还差强人意，只是电影导演们处理这类片段的笔墨十分简略，例如在《拯救大兵瑞恩》的镜头里，国防部高官亲自登门报丧，老娘开门出迎，只拍背影，远远看见长官下车，明白了，跌坐昏倒，于是镜头切换。好莱坞的剪辑师，下手硬是利落。

真的生活，一分一秒移过去熬过去，没法子剪辑切换，怎么办呢，在真的生活里，人其实不能怎么办。我那次当场目击一对父母得知孩子的死，没有十指交缠的恸哭，没有跌坐昏倒。他们怎样呢？我有当时的速写做凭证，可速写作为凭证的资格是大可怀疑的，此时，文字的描述也还差强人意，我来试着写写看。

自然，文字也不足为凭。莫泊桑有篇小说题作《如死一般强》，虽未读过，但我想，再雄辩的证据，终究辩不过实实在在的死亡，用巴特的句子形容，是“死尸作为尸体，乃是活生生的”。

扯远了。下面我要说的，正是“死亡告知”。

1979年，中越开战。3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演员表演，我们给军人画像。其时战事已近尾声，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军车给南国的春雨红土溅得满车泥浆，不见丝毫战争的惨状。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小兵引进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是在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触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然而涎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来，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

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喔哟！几时到的？怎么找到这里啊？辛苦啦辛苦啦，我看这样子吧，是不是先休息休息？啊呀一路上一定没休息好，没休息好。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面，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不知他真是位干部呢，还是职工，中国的职工的举止，常在模仿干部，很像干部的。

连长，就像南方干部日常闲居时那样，袖子裤腿高高卷起，又时不时用手顺下来，捋上去，架着的腿也在有节奏地抖动着。终于，我第一次当场听到——而不是电影里看到——有位真的军人真地说出我们从小听熟的词句。和电影里不同的是，连长并没有紧握对方的手，作出无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绷着脸，低眉瞥视手上的烟，缓缓地，掸一下烟灰，说一段句子：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听。

母亲埋下头去，哽噎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嚎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女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

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像一位干部在个别接见中倾

听内部机要传达时那样，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可我发现他其实没在听。一个人不是常会极专注地倾听，凝视对方，又完全不在听么：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烟卷凑到嘴上吸，甚至安详地吐出烟来。仅有一刹那，猛地，他的颜面颈脖涨得通红，顷刻泛紫，泪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阳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脸盘即刻就会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倾听的身姿居然完好保持着，只是腿又开始抖动，速度加快。

就像小说上写的那样，我的心“紧缩起来”：悲恸要发作了！我想——只见他使劲眨眼，同时，如内地的男人们在重要场合关键时刻将要表态的一瞬，用力咳呛，像是真的在清喉咙，喉节猛烈地吞咽，总之，他迅速恢复了革命镇定，紫涨、泪光、暴突的血管，渐次消退，腿的抖动转成徐缓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枝烟，又被换了一杯添上热水的茶。

我就开始画速写。

孩子十八岁，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为家里做了一百多只煤饼。这是后来旁的士兵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连长宣布死讯后团团围拢那对夫妇，有位清秀的小兵说他也是长沙人，他竟伸手抚摸母亲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念着我们从小在电影里听熟的话，郑重而诚恳，但也没有电影角色那套标准的悲痛相，倒很像喃喃地朗诵台词，不善作戏的群众演员：

别难过，妈妈，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嗓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入夜，操场上播放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边上的木栏杆撤除了，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他俩被另一群更高层、更稳重，而且

要不是为了这篇作文，我不会发表这两幅速写，画得很差。速写如果为了见证，一定会画得很差。左侧的连长倒是很像，不知他还记不记得那位牺牲的部下，以越战资历，他现在怕是升任军长了吧。

个个粗壮发胖的老首长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推挡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满天繁星。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头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就是这样子——说来也巧，写在这里简直像故意添加的小说情节：上一年底，我妻子得到医院的“受胎告知”，是年夏末秋初，我开始当父亲。

多年后，我在美国读到一篇皮兰德罗的短篇小说，想起那对夫妇——此刻写到这两位作爹妈的，我又想起那段故事。要不要多说几句呢？这书既是题做“多余的素材”，索性“多余”这一小段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火车车厢里一群去兵站送别儿子的意大利爹妈争先恐后诉说各自将要出征的儿子，抱怨战争。座中，独有一位暴眼睛的胖子对着众人正色训斥，高声提醒献出儿子为国捐躯乃是无上的光荣。所有人默然惭愧，因为胖子自豪地宣布，他的儿子已经牺牲了。

小说结尾，有一位老是悲悲切切的妇女真不该朝胖子问了一句“愚蠢的话”，不料竟将那位爱国胖子惹得当众大哭起来。那位妇道人家怯生生地问他：

“那么，您的儿子**真的死了**？”

油画（聖母の十字架上降下）
（部分）　作者不明。

《红色娘子军》

谢晋当年要算得时髦的，他早就懂得英雄美人的好莱坞美学：40年代下半段谢先生从影立志的上海滩正是好莱坞电影的天下，长辈回忆，“大光明”、“美琪”几家首轮电影院甚至在上海解放后照常放映美国电影，朝鲜战争打响，美国片这才落市绝迹。三十多年后，好莱坞重又风靡全中国，那时的电影人，电影观众，早已换代，直看得张口结舌。

后来我在美国算是看饱了好莱坞片子，终至看厌，轮到对着中国大陆的新影视张口结舌地看，连带着回头观赏我们自己的老电影，也另是一番新鲜。

最近在香港买得《红色娘子军》影碟，回家放看，那王心刚活脱90年代好莱坞青春偶像勃莱德·派特，临刑慷慨，也一脸性感让人疼，不因他是“连长”，而是他好看。我至少听过三位当年的革命少女自称迷他迷得要死掉，日想夜想想豁边。那祝希娟，以目下“新时期”中国影视的美女标准，若非当年谢晋好眼光，祝小姐怕是没戏。其实单看她丰唇一撇，横眉怒视目光灼灼那股子野性，就直追性格女星朱迪·福斯特之流，造型犹有过之，如今别说影视圈脸谱不见这等好样子，连类似的长相似乎也不来投胎了。这部戏成全了祝小姐，祝小姐也成全了这部戏。看到娘子军成立当天开步走，俩村姑直楞楞跟在队伍后面，又见女连长当头只问得一句：“什么阶级？”虽是如今听来可笑可叹，还是感动了：那串镜头不用到什么

祝希娟

王心刚

手法，一笔笔下去实在质朴饱满。琼花的泼辣暴烈，演来也鲜活如有其人，且是重彩的、南国的那么一种民风。到她生擒仇家用链子牵着游行，当街自诉冤苦，忽然哭起来，也真是女儿家的柔弱动人。可贵谢晋会选角儿会用角儿，导引祝小姐的脾性发作成一节节活泼剧情，而《红色娘子军》全片拍得是郁勃矫健，一路贯气，日后任他怎样使劲，毕竟难追这等风采了。

所谓革命文艺也自有它的生理周期，那时，新中国的“革命文艺”精力旺，年纪轻。

吴琼花自己被批斗的时候也很年轻。我是说，看《红色娘子军》，忽儿就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小学刚毕业，忽一日撞见了批斗祝希娟。

上海安福路，路右路左分别是“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现在不晓得挪了地方没有。“文革”初起，课业停顿，小孩子四处游荡，因我家舅舅是人艺演员，我就梦游似的逛到安福路——欧洲“安那琪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之流其实从未亲见无政府世道，我们见到了：

上图：中共琼崖根据地女兵。
下图 《红色娘子军》剧照。

那一阵，所有院校机关大门洞开，路人任意闯入。大人是为了“革命串联”，小孩子就是玩。门房在哪儿呢？我记得“人艺”门房口竟是有位俞丽拿站在那里：我知道她是俞丽拿，因为家里被抄走的“梁祝”唱片而在哪里留心过她的照片，只见她撇开腿站着操把琴，飞快地拉着练习曲，同时飞快地同别人说话。祝英台会说上海话？我忽儿惊讶欢喜。她为什么要在门房口练琴？为什么这种时候练琴？小提琴多好听。要不是“安那琪”从天而降——这译名也好听，差一字就是“天使”译名“安琪尔”——小孩子哪能站在俞丽拿跟前不被赶开，听她拉琴？

洋人管小孩子都叫“安琪尔”。我猜，全世界的安琪尔最喜欢世上天天“安那琪”！

记得是在初冬，下午，阴天。但不记得是在俞小姐拉琴的同一天还是另一回我又在安福路游荡（为了谛听小提琴？），忽然，从路右的“人艺”拥出一大群人向路左的“青话”狂奔过去，同时听得路人的传唤叫喊：斗祝希娟！斗祝希娟！

中国人爱看杀头，周氏兄弟早就感叹过了，尤其爱看女犯的“赤膊”赴刑，“人山人海”，但那到底是旧社会。新社会，人犯伏法拍成照片印出来，我见过，近二十年换成彩色照片了。但在“无政府”时期，上海政府不许“人山人海”跟去刑场，算是文明的，替代的节目，是让革命群众看人挨批斗。祝希娟虽非女犯，但是女人，而且是60年代的名女人。刘晓庆同志不是痛陈“女人难，当名女人更难”么，不知她可曾有幸挨过斗。

涌进“青话”礼堂，台上或站或跪一排人，好像先有场批斗会很开了一会儿了，并不见祝希娟。在场的与涌进的两拨人对峙吼叫，迹近动武，接着又轰然涌进几十人，又是烟尘陡乱。那时，这种热闹叫做“冲会场”，不同派别抢场子、抢话筒、抢那被斗的人，以我们那一阵到处游荡的观看资历，见多不怪，但我一眼看见了“吴琼花”。

人丛里起一种响动，许多如我似的混进来的路人认出是她。她穿件北京人称“皮猴”上海人叫“派克”的带帽兜的灰大衣，脸色青白，疑惑而亢奋，活像“洪常青”给她松绑时不明就里的神情。她身边没人押解，不像是来被批斗，而且紧接着她同大家昂然喊起口号来。细节是不记得了，待到全体坐定，那伙人就占了我前面一排，而琼花本人正坐在我紧跟前，用琼花式的革命神态与身边同志急切交谈。座位是阶梯式的，她的身背在我膝前略低处，近得可以数见她头发上未及清除的发屑：在我那时的年纪，一位年轻女子贴近坐着，浑身紧张，而她竟是祝希娟？！但我糊里糊涂跟进来不就为了看她么？我害着心跳：原来她是个真人，不是“红色娘子军”。

会场静下来，台上弯腰垂首的重又站好跪好继续挨斗，新进场的一伙大喊口号，当然，全是字正腔圆职业演员的普通话，听着真叫漂亮。祝希娟，四顾会场要喊未喊，趁一拨口号刚过，冷不防她在我耳朵一尺之隔响鞭似的添一声：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现在的影视模拟“文革”喊口号，太整齐，太空洞，响亮得不出效果，激昂得没有根据；那时，喊口号有太多种心理密码与临场功能：对形势来一番表态、试探，喊！场面主控了，失控了，喊！张狂镇压、仓皇就范、愤然抗议、颓然屈从，总之，一时情急，当事人都会破口呐喊。我的一位中学班主任在被推出游街，纸糊高帽子扣得脸面不清时，竟百忙中挣出胳膊，鸭叫似的喊一声“誓死捍卫毛主席！”随即给孩子们扭得虾一般跌下身去。诸位可记得电视上江青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将脑袋往横里那么使劲一晃，当庭高喊“革命无罪！”么——那天祝希娟一声急叫，是为何来？

我至今不明就里……忽然，台上主持批斗的哪个声音厉声喝道：祝希娟，站出来！

全场安静。吴琼花应声起立。刚才那位喊口号的祝希娟忽儿乖顺地，惟恐耽误似的跨过几排座位和让开的人身，径直走上台去，加

人那排被批斗的男人，转身面对全场，还主动对齐与其他挨斗者的身体位置，并腿站站好，然后自觉地，几乎是熟练地缩肩低头，额发随即垂落，遮没颜面。在台上的反动男人中，她触目地美丽而年轻，然而分明是一位资深的挨斗者了。

照例是连番的口号，喝斥，叫骂。她保持同一姿势，在举臂响应“打倒”她本人的口号时低头如仪，间或回答此起彼落的厉声质问，每在她回答的当口，全场鸦雀无声。

那天的结局是她被下一拨显然更有势力的人冲进来劫往别处继续批斗，会场大乱。混乱中，她被喝令下台，推出场外，旋即有位英俊的青年男演员用自行车将她带走。宛如琼花逃出水牢旋即就捕，她跳上后座的动作也是乖顺敏捷，斜坐着，埋头藏脸，双手把住骑车人的后腰背，远看活像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车行的前后左右，呼啸浩荡尾随奔跑着一大群预备聚看这位电影明星继续挨斗的上海人。

人群远去，街道空了。安福路有许多旧时法租界的洋楼与松柏，一派美丽的冬日的萧条，凝成银灰色。不知为什么，那银灰色在记忆里非常上海，也非常“文革”。我没跟去，因为心里是一个男孩眼看一个被众人轮番欺负的女子的生涩同情。我对人的动作的记忆有时多于表情，真有三十多年过去了么？我清楚记得她应声上台，站好，低头，还有被劫去继续挨斗时斜倚车座的背影。我没跟去看，还因为我从她的动作无端传染了一种情绪，可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情绪，那是人在广庭大众间顾不得羞辱时的那份仓促纷乱的羞辱。

《丑闻》杂志，每周一期，售价2美元25分。

看　煞

英国王妃戴安娜给追踪名人的记者群追得夺路而逃，终于撞死的旧闻，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了。这典型的西方当代文明，究竟文明不文明？

中国人，民国初年喜欢看杀头，“文革”初年忙着看批斗，太不文明，总算这二十多年来不再上演了。西方人，反对死刑，更没有“批斗”这一说，文明！但洋人也长着眼睛，一样地喜欢“看”：看名人。“人山人海”地远远看一眼，喊句“I love you！”或凑上去抢个亲笔签名，是一种“看”；在报上看看名人的新婚大礼、离婚诉讼、风流偷欢，还常附有名人在私人度假地的半裸（有时是全裸）照片，是另一种“看”。怎能看到呢，那是靠摄影记者的跟踪术、偷窥术，以及高明的摄影术，然后论千论万、十万百万地将偷窥照片卖给报馆杂志；美国每周定期出版专门刊登名人婚变、名人丑闻的小报与杂志，既是付得出十万百万给记者，就说明广有销路，广有财路。怎么会“广有”呢，这就是号称民主、自由、人权——要么再加上一个“博爱”——的西方、当代、文明。

所以瞧见报上白金汉宫门口“花山花海”悼念王妃的大照片，我就想，平日里长期追踪热心窥探戴安娜十数年来情变婚变的，莫非同是这一个个送花的人？

青少年对影星歌星的狂热崇拜，同“广大人民”的爱戴名人，不是一回事。狂热崇拜，是青春“发烧”，长大了，自会退烧的；爱戴

名人，那可是忠贞不渝纠缠到死的集体情热，什么原因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大概有答案——我只会得“看”，不是看名人，是看大众的“看”。

譬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我是到了美国，这才知道美国人民对肯尼迪那份爱戴，真是代代相传深入人心。黑白纪录片里肯尼迪的出殡，千万路人泪洒街头，同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周恩来简直异曲同工。肯家兄弟接连遇刺的影视报道，不知放映过多少回。“第一夫人”走马灯似的换，约翰·肯尼迪的遗孀却是永远万人迷，风姿魅力独步美国当代史，我虽是不怎么看得出那魅力所在，但眼看美国人民的爱戴却是叹为观止；再说她的儿子小肯尼迪吧，及长成七尺男儿，简直是美国人民的公众侄甥公众女婿：他上了什么大学，交了哪位女友，进了哪家公司，换什么发型，穿什么球鞋，全是传闻、新闻、要闻。我妻子公司的女同事除了自家小狗小猫，最频繁的话题主角就有小肯尼迪：“哦，哪怕只见他一秒钟！”她们娇喘着，闭上双眼：说出非分之想在这儿不是罪过，她们干脆在办公桌的小板壁贴上这位偶像的照片，写着：“JJ！我爱你！”——那两个字母是小肯尼迪姓名的缩写和昵称——然后用涂了口红的香唇戳到照片上，晾干了，天天看。

JJ今夏空难跌死的旧闻，中国人民想必也早知道了。在他死前那一年，去年，真不好意思，我竟看见了他——假如“看见”可以出让，我一定无条件免费让给哪位“哪怕见他一秒钟”的美国少女，可是我竟不甚记得他那天的模样打扮，因我忙着看那些看他的人。

其实追看JJ的情形，我早在杂志上看过不止一回了。最详细的是一组现场抢拍的新闻照片，用的一定是拍摄战争照片的超速快门照相机：起先是他穿着短裤正在走，手里拎桶水，一位“全副武装”的记者迎面跑向他，接着两人平行，身姿重叠，再接着，JJ举起水桶，记者闪身逃避，终于是水桶倾倒，记者淋湿。

然而JJ手里那桶水哪里浇得过来：这一幕，还是给另一个长镜头逮个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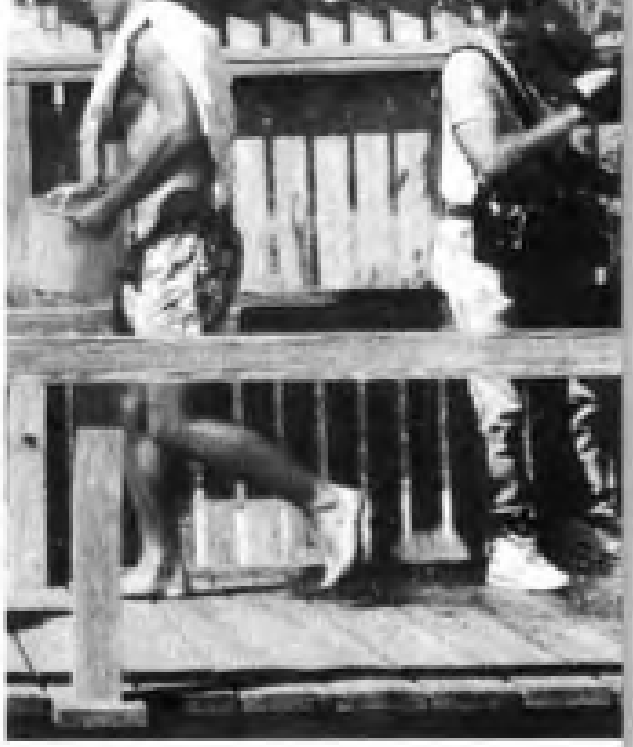
是在曼哈顿下城西南端新派艺术家和电影人聚居叫作“却贝卡”地段那一带（有些街面还保留着老城区的鹅卵石）。我去看朋友，走着，身后忽然传来一群人急促沉重的脚步声。要出事？！走在纽约可得时刻留神（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我还是霍然回头（出于打架追逃的童年记忆）：一群男女蜂拥而来，以争分夺秒的战斗状态疾速逼近，个个浑身披挂照相机，一望而知是老牌职业摄影记者，神色既忘乎所以，又是临阵干练的老辣无情，我赶紧顺着他们枪口般对准目标的目光看过去——JJ、他的新婚太太，牵着一条狗。

我喜欢看新闻摄影，不消说，最刺激是战争摄影。伟大的战争摄影家罗伯特·卡巴那句伟大的名言是：“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离火线不够近！”所有西方职业新闻摄影家都是卡巴“火线理论”身体力行的无畏晚辈。那一瞬我好比亲临火线：瞧这群人！迅猛，凶狠，高度专业，举机瞄准，他们赶上目标，速度放慢，几十条腿脚底生风龙行虎步横着走，相互妨碍着阻绊着，但每个人的上身顽强地扭向目标，迅速执行——执行什么呢？像是执行密集的射击。

他俩住在附近？出来遛狗？所幸那一带平日行人稀少。夫妻俩走着，不看记者，也不看别处，但总得看着什么呀，所以这对金童玉女只好凝视着鹅卵石地面，低眉顺眼，在此起彼落的快门嘈杂中，保持散步的速度，迁就着狗的步子。

那狗，不烦躁，不顾盼，审行独步，深明大义。

据说纽约是西方名流最喜欢随意走动的城市，因为纽约人不会对他（她）们的出没大惊小怪。多年来我也确曾在曼哈顿与至少一打以上的社会名人、文艺名流、影视巨星擦身而过，惟见他（她）们在万人丛中默然行走，“相忘于江湖”，不起涟漪。但那天的“围追堵截”却是另一说。光天化日下的示众、游街、群殴，还有突发的



《丑闻》杂志连环图像：
骚扰与反骚扰。

事变，我都见过，都可描述，但无法描述这一招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景观。我不愿说我不愿对名人追随围观，因那一刻我已撞见，目击，虽然无辜，但已涉嫌。眼前的一幕不是悲剧、喜剧、闹剧，那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了人民的仰慕，为了钱。说是公然侮辱？目光的强奸？肆意的攻击？言重了，抑或言轻？我们在室中安然赏阅照片中酷烈的战场，那“战场”其实只是一页光洁的印刷品，早经洗净了现场的危险。现场是要付代价的：卡巴离火线太近，终于在越南战区水稻田里触动地雷，粉身碎骨，以性命报答了他的伟大箴言。从最后洗出的照片“绝笔”看，他与前方士兵的远近尚且远远不及那天记者们向JJ扇形包围亦步亦趋的距离。

“看煞我也！”东坡先生晚年结束流亡乘舟北返时，两岸人民沿途迎看，遂有此一叹。北宋时代工艺技术竞相出现大发明，要是已有摄影业，老百姓想必人手一枚“傻瓜机”对准苏东坡。不久他就真的死了，虽然并非被当场看死——JJ座机坠落大海时幸亏没人围观，没人拍照。阿弥陀佛。要是记者们及时获知，一定会从天而降，绝不会在他命丧黄泉的急路上放他一马的。

瓦西里、沙夏、艾莲娜

忽然苏联就倒闭了。先是戈尔巴乔夫蒙难脱险飞返莫斯科，一下舷梯就对着记者长篇大论，我听不懂，疑心是在念诗：俄语起伏抑扬，音节多，滑音多，照中国人的说法，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接着他就下野，再接着，纽约街头一夜间出现许多新到的俄国移民。

其时我正在大都会美术馆临摹古画，是1990年秋。出馆，沿街摊贩有罗宋人摆一地苏联的过时宣传画和金属徽章卖：伏洛希罗夫、米丘林、普希金、托尔斯泰、加加林，当然，还有列宁。我走向一位麦色卷发的青年，买了小小的列宁像章，3美元，镀银，圆形，同毛像章一样大小。我问他名字，他笑出多么憨厚的笑容啊！接着羞怯地一个音一个音地回答：“我叫瓦西——里”，由“西”到“里”，柔韧的滑音。

苏联倒霉，美国人得意坏了。我瞧着地摊边的瓦西里，心里好不委屈。在电影里，准确地说，在我们无可救药的苏维埃情结里，瓦西里天生是列宁的警卫员，是勇敢与警觉的符号。历史上列宁身边并没有一位形影不离的保镖，现在真的瓦西里站在我面前，穿着真的俄罗斯圆领大衬衫，高我一头，体格魁伟，活像《战争与和平》里罗斯托夫的马弁或包尔康斯基的家丁，又健康，又快乐，又恭顺。

不久我回大陆，在广州火车站遍地难民似的破烂人群里发呆，一位相貌腔调都很讨厌的老人悄悄凑近我说：“你是记者吗？我注意到你的像章了，我们也看不惯哪！你看看你看看，过去哪里是这个

样子！”

我忘了左胸还别着列宁像章，我不愿说这是从哪里买的，赶紧掉头走开。

彼得鲁齐，《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曾说他初访中国最感动的是满大街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他用了一个词，说是这些脸带着“前消费时代”的质朴。我大约明白他的意思：我看熟了准消费时代高消费时代的西方人，但彼得鲁齐是指眼前火车站胡乱倒卧的流民么？“前消费时代的质朴”！我倒是在同俄罗斯新移民初打照面时，就被那质朴的自尊感动了。英雄落难，英雄气短，俄国佬站在商业帝都纽约街头，昂然而茫然，那天瓦西里生意清淡，用困难的英语托我照看一会儿摊子，过街去买热狗吃。

入冬，妻子回家宣布她所供职的公司新来了一位极美丽的俄罗斯女子，名叫艾莲娜。怎样地美丽呢，老婆想了好久，灵机来了，说是活像柯罗画中的女子，古典的，兼有圣母和农妇的美。我们拿这柯罗的女子该怎么办呢？一星期后，艾莲娜，连同他的丈夫沙夏，就给领来坐在我家饭桌上，原来他们就住在隔壁两条街。啤酒杯碰过，我们用英语开始交谈。

艾莲娜是西伯利亚人，就学彼得格勒工艺美术学院，与当地人沙夏是同学。沙夏，活像旧俄军团喜欢胡闹的中尉，胡子两端翘起来，英语还差就忙不叠说笑话。艾莲娜果然美人，不是她像古典油画，是古典油画像她：栗色头发，棕色眉毛，眸子在青白与浅灰之间，定睛看人，仿佛盲人般无焦距无对象地透明着，良善着；她的肤色是老象牙那种苍白，所以眼窝鼻翼的阴影浅淡朦胧，画这种阴影，柯罗拿手好戏。她慢慢地用大白手从色拉菜盘里捡绿叶子吃，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的美貌，这才真是美的，对了，“前消费时代”的美——精于“消费”的西方美女一律高度自知其美，自顾其美，艾莲娜只是一抹口红，粉黛不施。饭后，沙夏仔细问我妻子立足纽约

的经历，怎样觅职，怎样面试，怎样跳槽而长薪水，两口子才到此地三个月，西伯利亚人已经进了美国人的设计公司，彼得格勒“中尉”暂且赋闲。

谈话间歇，我喜欢听他俩用俄语柔声交换意见，一时又疑心是在念诗。

早春，沙夏邀我们回访，一桌罗宋菜，家徒四壁，典型的新移民家庭，尚在节俭阶段。取出他们在苏联的黑白照片，竟与我们在“文革”期间自己冲洗的廉价照片一模一样。那天，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夫妇在一间资本主义国家公寓里胡乱比较修正主义的长短，还来了他们的一位好友，女钢琴家，好像叫什么“波娃”，已到了可以开独奏会的程度，可爱的斯拉夫式的狂妄，她说一句话喷一口烟，坚持真正的音乐家只听唱片，拒绝CD，说“那是对音色的屠杀”，又说美国钢琴家“只有技术，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差不多是俄国人批评西方艺术的口头禅，我问那么霍洛维兹和阿齐格那其如何？她挥挥手，转向美人：艾莲娜呀艾莲娜，我宁可弹给你听！

话题开了，说起电影，我提到一部讲苏联演奏家和克格勃怎样叛逃美国的好莱坞片子，他们很感兴趣了，静下来听我讲。这时，我们不该问起他们家可有录像机（沙夏眼神一暗，说还没买），而艾莲娜和钢琴家的意思又很想能够看到——我们更不该即刻邀请他们一起来我家看录像：几位俄国人彼此看一眼，脸上的兴奋期盼还不及收回去，迟疑错落地答道：好啊，好啊。

谈话噎住了。我于是继续向“波娃”讨教CD与灵魂的关系。

他们没来。他们当然不会来。日后路遇，我们开心地招呼但谁也不提看录像的事。欧洲人，俄国人，相遇的礼节是触碰左右脸颊，撮起嘴唇发两次接吻的声响，美国人相遇则是虚抱抱，碰一边，响那么一声。

1910年，人们欣赏在法国市场上托尔斯泰遗出少年，年轻二度华托的肖像。左侧青年是著名儿童性家爱利夫斯基的女儿，为他画的肖像奇，十分感动的，另高兴了好之。斯大林请爱利夫斯基成员到莫斯科，为列宁作画。此后，老人从国外带出的所有东西一律被政府充公通过，不列宁没收的用“处理物”日记，把爱在纸张上成为“列宁指数”解决——1960年，由俄国命名。

徐赛近影，昕东摄于1993年。

他人的胡须

徐累，南京画家，仪表堂堂，长得活像胡适博士，也确看书不少，思路甚开，对欧美观念艺术颇有心得。聊熟了，我就问起你可曾想过放弃绘画，试试装置之类。他于是说：十年前，他醉心前卫艺术，兴冲冲要去北京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大展”。那时他二十啷当岁，行前蓄满长发，留足胡须，昂然上路了：

“到了美术馆一看，全是长头发，大胡子，个像我一样！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全是”，形容、夸张之辞。汉人而有大胡子，到底稀罕的，可巧当今画家或导演确乎颇有长头发而满脸络腮，望之飘然，真自愧弗如。即便偶有作品不如胡子好看，证明胡须一时还不等于艺术，然而胡须毕竟等于胡须，而我没有，“徒乎奈何”。

徐累有他留胡子的本钱，现在却理得平头，胡须刮净。他说，哪天给我瞧瞧十年前的照片。

弗　哭

胡博综，潘小庆，无锡市人，连环画好手，“文革”中期任职南京高云岭江苏人美出版社。1975年，我流落江北插队，时来南京借寓出版社，两位无锡画家长我十余岁，多有照拂，平日里与我厮混笑闹，甚为相得。某日走在去食堂的路中，三个人说起“文革”初年，我问博综你当时可有吃苦头，他笑说：怎么没有！什么苦头呢？他又笑说：就是给人批斗呀。

随便说什么事情，博综都嬉笑着，眼角眯眯弯下来，那么我说他们可有打过你？怎么不打！他笑得更其开心似的。痛吗？怎么不痛！他的眼睛仍在笑着，嘴角扯开弯下去，做出人在叙述暴行时那种作孽的表情：呶，摁倒了，一群人拥上来，全是从前的同事朋友啊！轮番打！

笑是传染的，可我随即想象他被轮番痛打的情形，追问道：那你哭不哭？

他站定了，脸色一正。终日嬉笑的人脸色一正，格外耿介。他直视我，恨恨地说：弗哭！

吴语的“不”念作“弗”。我们安静了，走着，忽然他又眼角弯下来，笑眯眯扯一下我的袖口：“后来呢，冷角落里碰着好心的，偷偷劝两句，小胡啊，想开点，身体要当心！”他这么说时，声音就压低了，模仿那偷偷劝慰的语气，然后笑得脸都泛红了：

奈么好哉——即吴语“那可好”的意思——我哗一下子眼泪憋不住，哭起来了呀！

胡　说

小庆善体人意。那时我常睡在出版社办公桌上，隔夜醒来，他已买好了烧饼之类放在那里，初起我去谢他，他会抵赖："喔，有这事么？我都还没吃早饭！"有一天，也是在去往食堂的路上，还加上另一位当年的连环画好手王孟奇。孟奇与小庆同在苏北某县下放劳动好几年，那天忽然两人争起来，小庆又是抵赖。

那年头，画画的哥们儿散在乡下熬着，最巴望、最开心就是给调到公社或县城弄什么"阶级教育展览会"，短则数日，长则旬月，地里的农活得以逃过，还能吃食堂，住招待所，画画儿，聊天。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展览弄完，自然是乖乖收拾铺盖回村去，啊呀！回去时心里那滋味！缸里没水，灶里没柴，糟贱日子哪年是个头呢？我们说得来劲了，因为虽然各自的户口依旧在乡下，人已身在南京"借用"着，画点宣传品，过着城里的好日子。好日子里回忆糟贱时，没比那更快意的事情了。

你记得么？孟奇扭头问小庆：那条路？还有那座桥？我得过桥回我的村子，你得顺着大路再走下去，那回我俩在桥边分手时，你怎么了——记得么？

小庆是调戏家，尤擅反唇相讥，此刻他显然看出孟奇别有意思，机警地笑道：怎么不记得！你说说看，怎么不记得！

患难的旧友总会在各自的患难"典故"中彼此揶揄的，孟奇意味深长地笑了，朝我看过来：丹青！你让他自己讲，让他自己讲！

讲呀，你讲呀！小庆迅速地看我，又看孟奇，脸面开始涨红，于

是孟奇朝他鄙薄地那么一指：

你哭了，对不对？你哭了！

他俩开始推推搡搡，一边走一边推搡，手里捏着饭盒。终于小庆咧嘴笑开，他的嘴长得极英俊，笑着，同时用眉目作出极端愤慨而严肃的表情，冲我叫道：

胡说！不要听他胡说！

形式与形式感

现在国中的“文艺界”流行什么话题，我不知道，也知道不过来。二十年前，画圈子争论一时的是“形式”问题。记得在北海公园开过一个研讨会，延续几天，包中饭，我也在。

我们的吴冠中先生，还有刚画完机场壁画的袁运生先生，昂然主张“形式”至上，座中于是有异议，说是任何形式还是被内容决定的，形式，总得服从内容吧？

其时，批判的年代已经结束，艺术家稍有争论，“问题”不大，会于是开下去，“气氛热烈”。不知怎么一来，话题的“内容”混杂了，有位自始至终力主“内容决定论”的老前辈、老干部、老画家，忽然详详细细说起“文革”初年怎样被批斗，众人于是静下来，兴致勃勃听他讲：先是他坐在台下看人被批斗，冷不防有人大声喝叫他的姓名，接着有人一拥而上将他扭到台前，扳过双臂，摁下，跪倒，又被拽住头发，掀起颜面。同时，他的学生同事有呼有应一阵接一阵喊口号，每喊一轮，停下来，由主持人数说他的罪，话音一落，口号即起——“你们是不知道哇！同志们，”他睁大眼睛，模仿动作，模拟声调，带着老人回顾往事的炫耀神色：“我给他们那么一喊，一揪，再一喊，再一揪，我真觉得我有罪啊，我不能对抗，我要向党交代。喝！那种场面，那种效果，真有作用哩，同志们，你们是不知道哇！”

这时，袁运生，容光焕发，猛地站起来，用手直指会场所在画

舫斋的青砖地面，高声说道：

“请注意，这就是形式！这就是形式感！”

众人一怔，随即哄堂大笑，连那位老画家，接着大家纷纷站起来：开午饭的时间到了。

形式、样式、模式

我不懂文艺理论，也不愿查字典里关于形式、样式、模式的词语定义，据我的视觉记忆，大致如下：

“文革”初年，上海万人规模的公审大会都在“文化广场”，每在下午。到时候，我就读的六十一中学几百名初中生拥挤在大礼堂盯住那部黑白电视机——没有连续剧，没有“国际新闻”，没有“东方时空”，没有“综艺大观”，惟一的节目就是现场直播万人公审大会，视觉效果、听觉效果，大致如下：

形式：人犯一律双臂反扣，胸前挂牌，姓名划叉。

样式：人犯第一排，站着，押解警员第二排，也站着，审判人员第三排，坐在垫高的主席台。

模式：一律高音喇叭，一律北方话，一律标准辞令，“罪大恶极”之类。

各种刑期宣判过后，大会进入死刑宣判的最高潮——多年后，在美国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直播“最佳影片”、“最佳主角”的宣布时，也是大会的最高潮——除了死囚名姓，宣判词一律是：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每个字都用重音，每个重音用足气力。最长的一次性死刑宣判超过三十人。三十多次用足力气宣读宣判的重音展示的不再是死刑的威力，而是重复的威力，模式的威力——这时，满礼堂少女少男

半发育未发育的嗓音应声唱和，同电视播音混成一片，每个字都用重音，每个重音用足气力：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口号、欢呼、音乐。接着是几百只脚从几十条长凳上跳下来，拥出礼堂，奔出校园，穿过威海卫路右门一路，汇聚在延安路街沿，在那里，邻校的孩子也正纷纷狂奔而来，挤进密密层层翘首引颈的市民间：从文化广场那边，囚车车队蜿蜒而来，钢铁车壁是密封的，看不见人犯和警员，街头高音喇叭音乐回旋，一派节庆气象。

（陆洪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死刑犯中我惟一记得的名字，并记得我在人丛中因侥幸与恐惧的颤栗：我知道我不会被枪毙，同时我知道一个艺术家会被枪毙。那时，我已经暗暗决心当一名艺术家）

人群散开，黄昏降临，街头景象“绚烂趋于平淡”。不过在开堂暮色里随时可见一对童子反扣着另一个的幼臂嘶喊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死囚”扭头叫骂：轻点呀！轻点呀！那娘操逼！

“那娘”，沪语发音，就是“你妈”的意思。

如今的电视节目总算多了，而且彩色。几年前读报，说是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后，街市里巷的孩子们放学后便都相互追逐，口出曹孟德台词：我必杀汝！我必杀汝！——民族文化回来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从来最懂得形式、样式、模式。

延安路，今起建高架车道，不复旧观，陆洪恩魂归赴死之路，将会迷失的。文化广场还在，早已辟为巨大的花市。只见门口一排花篮精心穿插各色鲜花，很讲究形式；千百只花篮布列成阵，倒是颇具样式；转圈子看完，插花的把戏似乎全是一个模式。偌大的广场到处散发着阴凉的花香，浇花的水渗漏而出，润湿街沿，好像下过雨。

位临刑的左翼分子，时在上海解放前夕。细节之一：民国男子的发式一律分头路，往后梳、涂发油。细节之二：捆绑的绳子非常之细。细节之三：主角是不是有点像葛优（对不起，葛优同志）！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他所扮演的阔少爷在解放后也被五花大绑，绑得专业而精致，像是勒紧祭祖的肉粽，送去枪毙。

邱岳峰

我早想写一点关于邱岳峰的文字。可是写他的什么呢？照现在的说法，他是“媒体名流”。可是一位六七十年代的配音演员，再有名也是隐身人。他没有了，活在我们的“听觉”中，死后好一阵还能听到他在电台电影中滔滔不绝：配音演员即便活着，亦如幽灵。邱岳峰！嗓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简直性感透顶。他随便说什么都充满戏剧性，这戏剧性忽儿神性忽儿魔性忽儿十足人性，他声调夸张，有谁平时过日子像他那样讲话？他只配“配音”。他只是角色，而他的角色只是声音，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所以我忘了他。是的，直到去国多年回到北京意外买到他的录音带：一盘全本《简爱》，一盘配音集锦带回纽约听——神了！我的耳朵从未忘记。

是他，还能是谁！我一遍一遍听，大笑，出神，蓦然返回儿童时代，返回我的“听觉史”的“史前纪元”——有一部德国电影《神童》是他早期的配音，妙不可言，谁还记得吗？可惜没有收入——集锦中的《白夜》、《凡尔杜先生》、《大独裁者》、《警察与小偷》、《简爱》，哈，我居然还记得大段台词，还有他的干笑、狞笑、狂笑、啜嚅、哼哼，兼以中气十足的哀鸣……罗兰·巴特说：“每回我看到明知过世的演员的电影，总会感到忧郁，此即摄影的忧郁。”他又在括弧里补一句：“当我听到死去的歌者的嗓音，也感受到同一的心情。”

亡者的声音。其实，活人说话，一旦“话音刚落”，声音即告永

逝，古人的“绕梁三日”、“余音袅袅”，是“回想”声音，模拟“倾听”，不是“真声音”，不是真在“听”。是录音技术留存声音，重播声音，此刻——任何被你亲耳聆听的声音都代表“此刻”——“邱岳峰”就在我曼哈顿的画室里口若悬河神气活现，以每一声瓮声瓮气证实他还在。巴特忧郁，因为他要在老照片中找回母亲的形影——照片全是哑巴，而邱岳峰仍在说话，他正在说话，他的声音比他在不在雄辩百倍！

他是外国人。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李梓、刘广宁、童自荣、毕克、尚华）感动我们，但我们不会错当他（她）们是外国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条件反射般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中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电影译制片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但我还是忘了他。在真的“西方”，英语淹没了我：外国没有“外国电影”。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二者都是文学；配音再好，却仍是语音的代替品。配音，为传播计，是属上策，论艺术，毕竟下策。久而久之，譬如，当一位美国太太在译制片里用北京话嗲声嗲气——哦！查利，亲爱的，您难道这样对我说话——我已不能习惯，以至听之悚然。好在懂得外语“原版片”的观者究竟极少，我未出国前不就兼看兼听，津津有味而不知有异么？但我出国了。出国后，我开口说话先得给自己“配”上英语，而输入美国的“外国电影”一律配上字幕，不“配音”。

邱岳峰是伟大的例外。他是一位嗓音的诗人，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他的配音像是电影原版另一个独具价值的“副本”，时过境迁，是那些角色有幸“配”上他，原版反而成了“邱

岳峰语调”的副本：那盘录音集锦即名曰《邱岳峰绝版》。在他活着的年代，他的配音也可谓“绝版”，在中国，官方话语不可能经由他的嘴，畅怀一说：能想象么，邱岳峰念社论、报告新闻、讲“革命故事”？电台里的播音员也是一流嗓音，义正词严，但闽腔调，绝不流露性情——邱岳峰是个奇怪的异数，国家电台的异类，他只配在全中国官方语音的天罗地网之外，给洋人配配音。我们，官方电台的亿万听众，惟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温柔、尊贵、慵懒、谐谑、缠绵、狡黠、玩世不恭、出言不逊！他超越了剧情和角色，是啊，现在想来，我们在邱岳峰语调中贪婪倾听而沛然神往者，其实是语言语音的活的气质：那才是人情与人性。

他去过西方么？是什么使他语音的气质与“中国”毫不相干？奇怪！我们又凭什么觉得那就是“西方”的语音？我们都与西方无缘，绝缘，独有他，天然地“西方”，不但在革命年代，便是今日，他也比媒体电台中的中国播音话语更摩登，更有教养，更神奇。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

颓废，“邱岳峰语调”的神髓。英国贵族，罗马偷儿，纽约杀手，彼得堡单恋者，还有那位大独裁者，岂不都是极度颓废的角色，邱岳峰表现反派和“另类”角色简直天纵其才——听众也是“角色”，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窃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以为是被外国电影所感动，其实是在享受颓废的快感。是的，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种种快感需求长年压抑，而颓废也正是邱岳峰语音的快感源泉：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

（好一位夸张的天才），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贱、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人非非。

什么是颓废？那是电台朗诵全然没有的激情，人性，愤世嫉俗，泼辣健康，因颓废有如药剂，挽救语言的生命与权力：在幼儿园我们就聆听同一种腔调，我们生来最先获赐的无形封锁即不能以自己的性情痛痛快快开口说话——配音，与聆听配音，是惟一的例外，不是么？请诸位再听听。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而嗓音岂非天赋人权！是颓废激发了邱岳峰的才情，而这才情点燃的正是颓废，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

邱岳峰自己知道么？他是党员还是旧时代的“留用人员”？受到重用的文艺干部还是监控使用？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他的才华即是颓废，一如颓废乃稀有的才华，我们的文艺此后再没遇到过秉赋了颓废的天才，邱岳峰的气质因之寥若晨星。不是么，试听今日的播音、配音，我们充耳所闻的是轻佻、空洞、矫情与滥情。

记得吗，他曾被电台请来就他的配音艺术夫子自道，老家伙洋洋得意再一模拟一句旧台词，我不记得那句台词出于哪部电影，但记得他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曼声念道：

奶油——草莓，奶油——草莓。

谁还能复述如他：轻快、冷漠、沉郁、厌倦，而他仅以这副嗓音即活得有如一位士绅。但我们从不想到他活得怎样，是啊，他活

得怎样？有过“自己”么？“文革”后他的声名更形卓著但忽然了断了自己的性命——当我闻知他的死，才想起他一直活着，并不只是空中的声音，而“声音”似乎是不死的——沪上市井传说过他赴死的原因，是原因，也不是原因。我猜，我愿确定，他死于高贵的颓废。

看他的仪容——等我看到时那已是遗容——竟十足外国人模样，像是俄裔的混血后代（命运的伏笔：一个终生说中文并以中文播音的“外国人”）？除了为他身后出版录音集锦，没有文字说起他的点滴身世（到底有没有？），也似乎没有文字单独评价他的配音艺术（他是幽灵，怎样评论一个幽灵？）。他的笑容也颓废，真的颓废者就像那样和暖地微笑，如他的语调，和悦、亲昵、仁慈。

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凡尔杜先生”对那位他不想谋杀的女子惨然说道。邱岳峰有情，他谋杀了自己。当我在异域生活中几几乎忘了他，空中传来他瓮声瓮气的嘲笑与叹息。

于是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朋友送票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早听说国中话剧已难维持，观众流失，那天却是满座，瞧着像是京城文艺圈一件盛事，还据说剧评甚好，想来大约是班子一流，剧场一流，而阮玲玉的名，那阵子因为是死了六十周年，又再亮了一亮，成了卖点的缘故吧。

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

进场出场，看夜色中上下台阶的人，想了想，有十七年没来过这儿了：是出国后头一次看国中的话剧。原来国中的话剧就剩那股子"腔"了。大概是没看到别的好剧？这一出，那主要演员"腕儿"再大，顶多三十出头，演一甲子前的民国人、民国事，没谱。

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那组演员当年的平均岁数也就四五十岁吧，可他们都在民国世界长大，有"生活"，有感觉，更别提他们是中国话剧界屈指可数的老姜。

想起看《茶馆》的那几天，现在也还神往：第一，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第二，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第三，不但等着，还替别的几位哥们儿等着，瞧他们进场，再等我的票；第四，神了！那等来的两场退票，全是第一排靠中间的座位，想必是哪位官儿忙不开身；这第五呢，别提了，那时一张话剧票才

人民币一块钱，搁现在，杭州南京的真茶馆，半片茶叶都甭想买。

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窜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啦。那时，五十来岁的演员在我眼里可不就是老人，而《茶馆》给“文革”撂倒整十年，居然人马齐整，岂不格外稀罕。其时所谓改革开放还没当真开始，中国还没当真大变，一切百废待兴从头来过，但《茶馆》复出火爆一时的文化生意，不知怎地就给我不祥预感：这套绝活儿不是正在开张，而是行将消失。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论行为，明星崇拜，可比今日大学生的崇拜葛优姜文濮存昕，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怎么称呼呢？），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啦！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

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起眼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一台《阮玲玉》，使足气力，就是瞧不见这样的形体动作小细节。

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的，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呢？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像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时在冬天。开春，于是之竟给年画连环画系的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我向来不爱听讲座，只有三回早早地就去等着，听到散场：一回是连环画宿将贺友直，一回是咱民间歌手郭兰英，再一回就是于先生。那天他面如重枣，说是刚喝了几盅。讲堂挤满了，好不容易静下来，于先生笑眯眯才开口，一声巨响，墙边上哪块板子给挤落倒地，哄堂大笑，只见于先生也陪着笑，静待归置停当，接着讲。其时，我妻子是杨先让系上的生员，不该事先将我写崇拜信给于是之而于是之回了信的事笑说给杨先生听，这可好，杨先生一散场就过来拉我说是赶紧见见吧，握个手——那算个什么事儿呢？我死活不肯，同时就拿鞋底蹭着地面往后蹿：不是害羞，也不是紧张，我能看看他就好。蹿开了，我远远瞧着于先生没事儿人似的点起烟站着，听人摆布，一会儿来了车就上车走了。

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地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见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那音乐家马思聪还说他的“西藏组曲”要是真去了西藏，怕就写不出来——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换了《阮玲玉》那组年轻演员

就演不像样，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现在又能亲眼看见他，我目不转睛。北京胡同口多见这样稳重厚实的长辈，有点老相，有点胖。并不像演员，举止却是地道“北京人艺”味儿：通达祥和，历练深藏，是那么一股子譬如为官久长而官气褪尽的“官气”，老资格京城文艺人似乎多少都透着这非官的“官相”，在南边是见不到的。他模样凡俗，镇定，和蔼，到这般名分，他再是谦抑，也自有默然宁静的气象，因他的人是真的质朴，真的深沉。只是当面看见名演员，总归形容不像，因那真身与角色间的异同总让我们目眩而错看。倒是大演员在人堆里一站，这才发现人堆的平凡，便是生动也是生动的平凡。那天于是之袖手站着，即他一身的凡俗也是好景观。

翌年我出国去。是在纽约，不知怎的读到一篇于是之给戏剧刊物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的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我想明白了，其实他不说——或如给我的信及讲座上说些“体验生活”呀，“还要努力”呀——也没关系，也一样：不是他敷衍，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临别南京，亚明老师送我这张照片，并在背后题字，称我"同志"。

亚　明

因为这书是南京要来出，我怎样也得写写亚明老师。自然，我是指我人在江浦落户三年期间与亚明老师的往来。说哪回呢？慢慢来，我得留着篇幅，这里且先说一回半。

这半回，大约是1977年吧，亚公——许多围在他身边的老少男女都称他“亚公”——还未官复原职，那一阵，连他官职所在的“画院”、“美协”也因“文革”才结束，“妄身未明”，且待开张，但他已常不在自家，移到宾馆去，给好多地方或军界的头儿画应酬画。那些头儿，也将要官复原职吧，亚公的案头于是堆起纸条儿，尽写着某副司令某军政委某后勤部长之类。记忆中，反正是不知怎地我已和亚公坐在一个什么宾馆的餐厅里，快要吃完的光景，外面是夕阳庭院，草木扶疏，我鞋一双破鞋，吃一头汗。亚公早已搁了筷子，看着我吃，任烟灰掉在前襟或裤带上。

“吃！”他训斥似的哼一声，指指那盘鸭块：“你在乡下苦，油水少——吃光！”

所以我说这是“半回”，因为我要说的只是那盘鸭：烧法，滋味，全忘了，我于菜式的记忆十分愚钝的，但那鸭块，全都浸在半寸厚的“油水”里，不，纯油，鹅黄晶亮，清澈见底，像极了调弄油画颜料的亚麻仁油，这在那时的乡下确乎见不到的。鸭子，我记得一块块吃下去，那油也要喝光么？

他老拉我去他的饭局，我好不自在坐他身边低头吃，饭桌上常

是江苏书画界的老前辈：林散之、萧娴、宋文治、魏紫熙、钱松喦，只我一个是“乡下”人，而且画油画。亚公他最不高兴我死心眼儿画油画，却惦记我在乡下苦，油水少，所以另一回的记忆，还是吃一时间要推前一年，“文革”并未结束，有一回我从乡下携画到南京，进得弄堂，他正乘一辆军用吉普车出来，我给不由分说拉进去，开开到哪家高干花园洋房的花园里。上得二楼，只见上海话叫做“原桌头酒席”当庭摆好，迎出来一位熊腰虎背的老首长，面相是许世友的另一副版本，紧紧握手，苏北鲁西南一带口音，随即大步走到墙头边手指一幅亚公新送的画，大声地，简直咆哮似的叫好。其时周恩来过世未久，画上画的是一株大松树折了主干，题词里还不敢点明周恩来的名。

入席了，照例是问亚公喝什么酒，那军官太太的口音像是苏南人，她举着筷子指点菜盘，高声道：“亚公啊亚公你看看，今天专门为你做了牛肉、羊肉、狗肉、白切鸡、盐水鸭，还有驴肉呐！”

日后我在江湖上跑得远了，多少也给拽到种种饭局上，有时有趣，有时无趣，时或就会想起亚先生：他既是画家，也当过军人，亦官亦民，能雅能俗，忽庄忽谐，知道同半生不熟的各路客人怎样酬答怎样谈笑。那天的种种菜肉，我也照例忘了，就记得太太报完肉类，亚公将脑袋在自己肩上作弧形状地那么晃了晃，应声说道：

“好！大嫂，有一样菜你今天定归拿不出：你阿有老虎肉给我尝尝啊？”

吴语“阿有”，就是“有没有”的意思。话音一落，哄桌大笑，老首长笑起来也如咆哮：下次有！下次一定有！那太太则一迭声道：喔哟亚老，你看你！你看你！

赵　丹

我撞上亚老的饭局，只一回他没挽留，我却心里不想走。

是1978年春，我才上楼，就见亚老在楼梯口朝楼下厨房大声关照菜式，关照不清，自己下去说，留我独自在画室。少顷，听得哪位客人脚步叫声一路从楼道里响进来：

“哎呀亚老！今天我非要痛痛快快看你画幅画！咱俩一起画！”

我回头看，抬脚进门的竟是赵丹。他一愣，随即像是对个熟朋友似的双手握过来，然后兴冲冲在屋里走动，听说亚公在厨下，就顺手抄起桌面上一本素描册，那是我上回留在亚老师这儿的。才看几页，主人进来了。亚老师平日见人多是应酬调笑，惟今天郑重欢喜，一声一声说话用重音，那冲着赵丹的笑容眼神像在发狠，凶巴巴地，赵丹呢，上下打量亚老师，如一位名流对着隔行的另一位名流那样，强行亲昵，还竟有几分难为情似的，瘪嘴使劲笑，我注意到他缺几颗上牙，原先好看的瘪嘴更显得瘪进去了。

论辈份、声名，赵丹是在民国即曾响亮，也就那一回，我见亚老的目光油然动衷，兼以邀得贵人进家门，如临大事，那神色，倒像是往日别人拜见他。

按说我就该退走了，但却赖着。那会儿，我猜自己一定斗鸡眼似的锁住了眼珠子对准赵丹看，不听他俩说什么。条件反射般，我迅速回想他在电影里的模样（那年《马路天使》尚未公映，我还没看过他二十出头时的小生样），时在日暮，室中还没开灯，赵丹穿件

半旧的蓝布中山装很老实地站在临窗的微光里，而所有他扮演的角色此刻都在拒绝他，远离他：不是聂耳、武训，林则徐，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们”呀，但“他们”不是他……他说，亚公你还画素描？听说是我的画，就来问我乡下插队的事，说他儿子也插队；这时亚公子回来了，他赶紧立起双手握过去，问是下班啦？哪里做事？对青年敷衍漠视，以至视而不见的名流，我在各种场合见过，见惯，他却全然不是：他用不着对小辈这么热情客气，但他一起一坐的表情手势都是真的，却又简直是没话也在找话讲，他像是好久不曾到人间，见人都是一番欢喜惊动，其时，他才出狱不很久——那一阵，国中各地多有如他似的名流复出，结束“不许乱说乱动”的糟贱日子，眉飞色舞，开始在“社会上”串门走动了。

他的真率让我暗暗吃惊，怎么一来地，亚老师同他谈起电影，他就高声开骂，才没说几句，亚老师又给厨子叫下去。赵丹一时煞不住，扭头冲着我：“小伙子你说说，不像话嘛！爱情不能写，夫妻也不能写。”他那样地睁圆双眼，银幕上从未见过：“这怎么可能呢——李铁梅不谈恋爱，李玉和没有老婆！你说说，不像话嘛！”他扬眉摊手，瘪嘴张开着，像是真在等我回答他。

开灯了，楼下有响动，我于是起身告辞。赵丹又是起立握手，连说好好干，没关系，以后一定调上来，又说他从前在上海美专学过画，还数说谁曾教他画素描。

我那时真是年轻的，出弄堂就连奔带跑，像是赵丹的“聂耳”在贫寒时凑钱买得小提琴一跨一蹦地跳，我真想拉着街上哪个家伙说：我刚才见了赵丹同志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他。十多年前，上海少年宫青草地上坐满大人小孩，漏夜批斗赵丹郑君里。他俩的头发剃得精光，自始至终弯腰垂首，想来是斗得烦了，光头可以免于连头发带脑袋给抓揪摇撼，而那天果然没有揪发拧面的老把戏，除了两人的颅顶，不见谁是谁。

草坪边上是临时支起的电影幕布，人给押下去，就当场放映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反动电影”《聂耳》。这谱写国歌的小青年在电影里激昂亢奋，额发甩动，批斗台上两个剃光的脑袋，哪一个是他？

所以在我印象中，聂耳也给剃了头，被狠狠斗一回。

赵丹老了——两年后他在美院对过的协和医院死去时，照计岁的年龄推算，那年他还不到六十岁——不是老，是他著名的相貌颓败了。捡得一条性命，他还是魁梧，挺拔，更兼重获自由，过度兴奋，但每在言笑停顿的一瞬，归复沉吟，眉目严峻，忧患一如心情的底色，不自知，抹不去，是十年间所有落难英雄的共相，忍辱积郁，一律为命运所降伏。我们见惯历劫过后回到家来的长辈，是的，就是那样子。

索性他后来再上银幕，或享高寿，又会怎样？出传记、上专栏、门庭若市？在老一代文艺“国宝”凋零尽净的近十来年，不是“宝”的角色也煞有介事算个人物，给社会如烧香似的供着。而演员却是易为时人所忘却，即便是赵丹。阮玲玉倘若活下去，谁还闲话到今天？至多是如晚年隐居温哥华的胡蝶，要到近年上海热怀旧热，这才如箱子底的旧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左翼的电影人大半是被遗忘：金山、崔嵬、郑君里、魏鹤龄，我今忽儿想到与赵丹的邂逅一时，算来也竟二十多年了。

此后中国的影剧另有热闹。我几回听得批评赵丹的过度表演、太过做戏——那是极容易的批评。赵丹晚岁在“上戏”讲演时坦然说过同样的意思，劝后生引以为戒，那讲稿还收进他的专书《地狱之门》。比之那代人的迂阔恳切，今以“包装”行世的一代新演员，作风人格，全是另一路了。而赵丹30年代出道时的美学，正是简单质直，幼稚热烈，左翼文艺正当青春，水银灯下是七情上脸装腔作势，现在看，倒是难得的好：便是30年代欧美大演员的伎俩不也同流？细看，其实多有流转细腻入骨三分处，而到了《乌鸦与麻雀》、

《武训传》的表演，若要批评，除非是与他相当，而如此角色国中委实不作第二人想。我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电影部重看这些作品，惊异佩服，因那已不尽是所谓演技，而是一时代的色彩与呼吸，哪里可以事后斟酌，隔代批改，回过去看，那时的演剧若是蕴藉练达，反倒是做作，而当年若没有赵丹的鲜蹦活跳，中国新戏剧便是缺了一大席。

圈中多有以石挥作比，石挥固然了不起，可惜投入海水，没得后来可以比。赵丹后来的传记片诸角色（如早被忘记的《李时珍》）也到底不作第二人想。他的作派戏路，乃是时代的风流，不论所谓体验派表现派如何说法，在他，则出乎本性的真，赶上风云际会，拦他不住，不是个可以商量议论的演艺枝节。但凡闯开新局的头几路人，大抵草莽英雄，出道即是。他上过什么电影学院呢？而人的性情往往比才气还要近艺术。彼时的时髦是做逆党，赵丹少年时不过在党外闹闹，国民政府一度通缉他，他竟得意，四处语告说可见得他是真的革命家。后来新疆监狱一关五年，真的落难，做作不来的。因他太过锋利必是招忌，又因是与旧上海那群革命才子渊源太深伏下祸根：这也是那代弄潮儿的命运的真实，日后被祸，也可谓轰轰烈烈。《聂耳》戏中，他与张瑞芳饰演的“郑雷电”在龙华塔目睹同志被捕，由悲而奋，咬牙切齿念出一段准30年代浪漫台词——如今听来是梦呓一般——他念道：我们还有长长的未来（他国语不准，“长”字发音尽在唇齿）。结果，他等到的“未来”是第二次牢狱之灾，“文革”间一关又是五年。

这在赵丹，岂不都是命运的真实。

又譬如于是之，诚哉大演员。取西方史家的“春秋笔法”，则赵丹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的“传奇人物”（Legendary）。同西方明星比，他纵横影坛三十多年，划去十年囹圄，演艺生涯其实短得很。他说及“文革”前17年才演五六部戏，仅得民国出镜的几分之一，临终，

遂斗胆说出“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一时传为铮铮之言，其实是英雄末路无可奈何的哀鸣。

我班上同学汤沐黎，导演汤晓丹之子，替父辈去协和医院看望病榻上的赵丹，他已不能说话了。演员于洋也在，说及正在拍电影，赵丹就从盖被下翘起大拇指以示羡慕勉励之意。“文革”前即曾传出他总想还愿扮鲁迅，还说是水浒三国红楼梦若不搬上银幕，“誓不为人”，然而豪情空寄，他没再演成半部电影。其时，圈内尚广有他同辈的宿敌，无非是官与小人。中国人何愁让你做不成事的软办法呢？情形究竟怎样，外人不知，以他不知韬光养晦的真性情，又兼来历太大，复出后，自不免为犬所欺。说来亦敬亦讽：中国美术馆倒是在他过世那年为他举办了盛大个人画展——换成好莱坞，这等后事，迹近国事，至少也要开电影回顾展——他的遗作多至数百，一律山水，竟全是出狱后几年所作，落墨用笔风狂雨骤般，其中哪几幅是同亚老一起画的呢？

听沪上去过他家的人说，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夸好，他忽然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同时就眼泪流下来。

上图，新康花园，曰称「仿康花园」。
下图，颜文梭夫妇与他的同事们。

颜文樑

淮海西路“新康花园”，现在是上海市官定“文物保护”级的西洋式“古董”弄堂了。昔日弄口那排好好的法国梧桐不知何事开罪地面下的地铁工程，全部砍光，风致荡然——走进弄堂，倒是老样子大致没变，欧式的白墙，公寓，间以郁郁森森老柏树，既在欧美，这等建筑与景观也是一流的怀旧之地。几年前，我特意兜进弄内颜先生故居外小立片刻，四周空寂。隔壁哪家娘姨搬出棉被床单晒太阳，老式藤条朝浴满阳光的棉被上一记一记使劲拍打，昼午日长，打打停停，一弄堂给拍打得愈加安宁了。

近年上海割皮剜肉大整容，比那手术刀大千百倍的推土机总算没有开进来，新康花园幸得留存三十年前同样的安宁。三十年前，外面世道是武斗抢权闹革命，忽儿林彪要谋反，忽儿美国来讲和，可我此后每想起1971年前后几度拜访颜先生，倒不是当真想念他，而是格外记得新康花园的隔绝乱世，岁月悠悠，每次一进弄堂口，“文革”喧嚣消了音，时代正在睡午觉，民国初年苏州艺专老院长颜文樑午觉睡醒，春日迟迟，门外等着几个乱世学画的小瘪三。

门铃按过，脚步声拖拖沓沓由远及近至少两分钟：是老先生亲自开门。那段走廊几步即可走完，颜先生老了，快有八十了吧，一步几寸一步几寸，他是小脚太婆似的蹭着走来的。

不知该说是动乱年代学画不相宜，还是学画与动乱不相宜。70年代，家国不宁，少年很知愁滋味。挨斗关押虽没份，但学业停顿

户籍勾销撵去农村，论理一切免谈。然而青春总归是青春，吃得下睡得着，年节回沪，除了夜里裤子叠叠好存在枕头底下压条线，平日转的念头就是怎样寻访名师学画画——“文革”再怎样轰轰烈烈，学画少年的心病却是色彩素描怎么办。本市的油画名家固然仰慕已久，中年辈如孟光俞云阶虽是靠边赋闲，也如半在云端，高不可见，林风眠张充仁颜文樑则简直是古人，活是活着的，庙门在哪里？所以我辈无非是背个破画夹骑上脚踏车，市西沪南乱撞车铃乱穿弄堂，在各种客厅厢房亭子间会见各路素描“土匪”油画“草莽”，非常看得起暗暗看不起地摊开图画互相看，少年老成，言不及义，嘴里居半是见不到佛面的名家姓名，看不到真迹的大师名画。记得隔壁弄堂一位腻友的阿哥的老同学的阿弟曾得颜先生真传，曲线结交曲意奉承终于等到去拜见，有颜先生写生欧洲风景的小画册加上这位真传弟子的布上真迹，但见玫瑰红小翠绿点点戳戳居然又灰又亮，当下万念俱灰，旋即跃跃欲试。

少年很知愁滋味。不是吗，革命愁煞人是画画也愁煞，所以那年好友林旭东说是颜先生他认得，去就是了，岂不大喜过望：噫，这样地一愁一喜，愁喜交加，便是我们青春的“基础”与“色彩”，真正金不换，如今要是还能够那样地愁闷那样地狂喜，该多好啊。

颜先生相貌活像缩小的董必武，身高仅及我胸，颅顶灰发稀少如婴儿乳毛初出，布满浅褐的老人斑。我总忍不住要想触摸他苍老松软的头皮，仿佛摸过之后，再弹不回原来的位置了。他笑吟吟古风盎然微微欠身做鞠躬状，然后一步一寸导引进屋，垂着的脑袋努力上仰，因颈椎老化支不起脸面，反倒成了探头探脑的模样。一位娇小的老太婆笑蔼蔼泡水沏茶，想必是颜太师母。二老对了几句苏州话——这样地轻声缓语，客气而斯文，今之苏州，怕也极稀罕了——她随即退到厨下挪只板凳坐下拣拣鸡毛菜，活像在颜老著名的油画《厨房》里，宁静、下午、永恒。

这永恒的图景也快绝迹了吧：菜、厨房、老太婆。今日摩登小姐21世纪升任老太婆，可还小板凳坐坐好慢悠悠用手拣菜蔬？

“非常好”，苏州话的发音是“交关赫”，“赫”念去声。颜老看画是一边延出下唇兜口水，一边喃喃“交关赫”，声音老弱如轻微的咳嗽，指点那么简单：这儿比例不太准，那儿稍许长了点，像是裁缝量衣裳。他显然弄不清我们只是一群无业的青年，且也不管不问。同去有位女生因说了一句我们彼此当模特，老先生就随口说：“交关赫！是画面孔呢还是画身体？”我们吃一惊，相视发笑——“文革”当道“画身体”？他的人就像他的家居和弄堂，不识今夕是何夕。

“裸体么总归要画的，”他自言自语：“我就是画不来，只好画画小风景。”听说旭东与我插队江西，他抬眼一笑，忙问：“栗朵风景漂亮不漂亮？”

“栗朵”，苏州话即“那里”的意思。

那时的拜见前辈，一类是休想瞻仰画，单是教而训之，一类是郑重出示，如承恩宠，颜老却是开心巴结取画来，还非要连着镜框搁在光线恰当处，后来出国，知道这是西人示画的好习惯。他一幅一幅取出时总会嘟囔道：“呶，这幅还有点意思。好看么？还有一幅还要好！”我们聚拢脑袋，他也气嘘嘘挤过来凑着看，好像存了三五十年的老画还没看够似的。一幅细密的花果静物，他颤巍巍指点葡萄上的晶莹水珠，一幅上海人民广场的俯瞰式风景，他惟恐我们看漏了，端出来，即手指下角屋顶上的一只猫，同时笑悠悠说起有人要来买，“出四百块钱，”但是呢，“画不就给人家拎了去么？我不过拿到一叠子钞票。”

他于是欠起身子，对着阳光，手指虚虚捏一捏，做薄薄一叠钞票状，瘦软的手掌在阳光里像蜡烛般苍白而透明。

他最得意的一幅描绘月光的油画——可惜我忘了画面——大约给别的哪位拜客藉口借去，没有归还的意思，老人急了，据说是找

颜文梁早期作品《厨房》

来引领拜访的主连夜拉着陪到借画人家里苦口婆心讨回来，我想象他怎样由人搀扶着登门谈判，用他绵软客气的苏州话。那回，他还似乎因此生了一场病。

不久李宗津过沪去看他，给他画了一幅油画像。颜老得意洋洋举在手里，以那外光的冷色指教我们。他似乎从不以自己的画作例见教。不久李宗津死，及后听中央美院年长的学生说起，才知道李先生1957年后郁郁不得志。不得志，而“文革”年间探看颜老即兴作画，画得很得志，今想见当年两位老人的乱世交谊对坐画画，这暮年处境的零星快乐，我竟懵然不察，懵然不知。

老人家送客也总亲自。为他的脚步，我们尾随缓行，出门放开步子回头看，他必定立在门口频频扬手，频频欠身，直到我们转弯看不见。

去年，我访苏州园林沧浪亭，出亭侧，即是全部石质的苏州美专故址，外观竟不见毁损，廊柱、破风、拱顶，如我在意大利所见罗马建筑，望之令人惊：中国有过如此堂皇的美术学院？！便是今之欧美，苏州美院故址也堪属高等，一派风流。国中目下的美术学院纷纷效颦时尚，翻造一新，看去伧俗艳陋，毫无艺术的品性：民国初年的西化，一板一眼，实在是诚实、认真、像样的，如颜老的家居陈设，真的欧化的老家具，真的将画框嵌在雕花镀金的镜框里，如这代人少壮年岁，西服领结，有样学样，左手执挎调色板，果然认认真真学西画，认认真真过了一世西化的生活，惟厨房的老妇与鸡毛菜是纯粹中国的，有如苏州艺专毗邻沧浪亭，一水环绕，两看不厌。美专故址现辟作美术馆，内部面目全非，偏巧二楼有颜先生回顾展，空无一人，我在他寓所见到的画却一幅也没有。在临水的广场倒是又见颜老，是一尊他的铜制头像，偏又打造革命先烈光辉形象般，将他弄得浑头大脸气宇轩昂，远看，我还以为那是彭德怀。

他的教学，以院校那套所谓教学大纲课堂八股看，也是匪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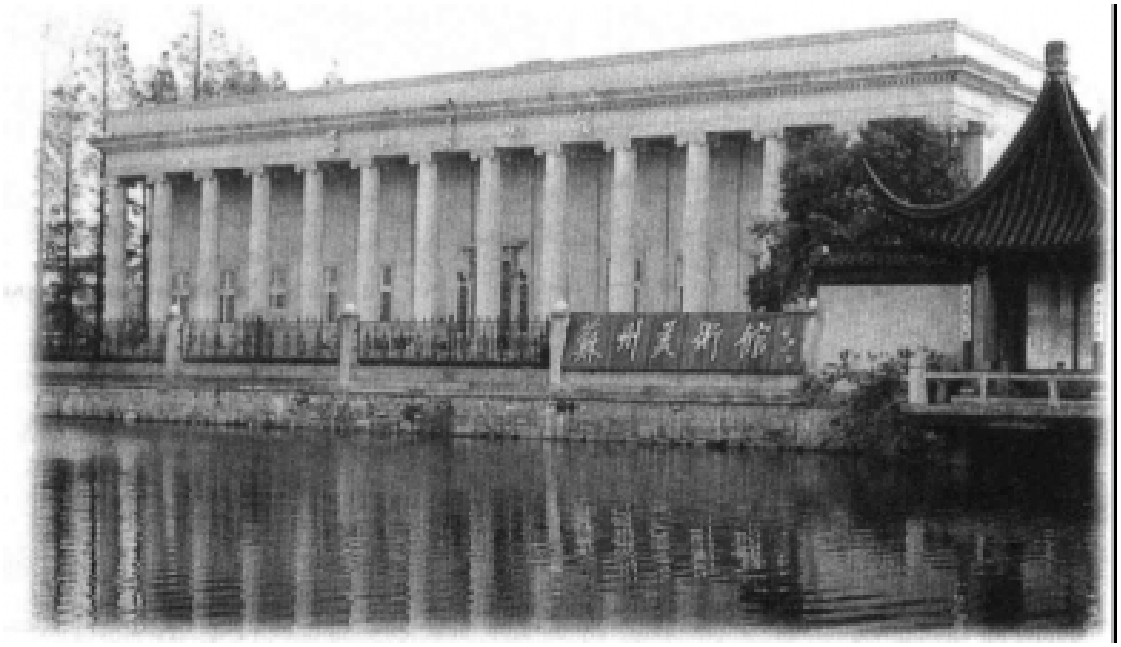
思。他比喻凡事总要恰到好处："猪脸就是猪脸，长出象鼻子，像什么样子呢？"他论色彩，又说是漂亮的颜色要不怕调得它"龌龊"，学生问什么叫龌龊，他说，呶，大便在茅坑里不叫龌龊，放到卧室眠床上，那才叫做龌龊呀——现在想来，我们拜访颜老那一阵，他靠边赋闲，晚生来访倒还给他一时的活趣。及后局势稍宽，据说他就摸出去画写生，据说他央人扶送到郊野田埂支起画架画，半当中田间放水，周围水淹，颜老也竟无事人般孤零零画到画完，又再央人以板车将他迎接出田，车回上海。这事是否确然，不可考，但我相信，因水淹或"文革"都可与他仿佛无事。他是长寿的，活到近九十岁吧？如他一辈的留欧先驱，寿者大抵是身居高官徒负盛名，而画艺萎谢了，长长的晚岁，均不免为时代的祸患所毁伤，又复被时代捞起，扶出应景，为权势所利用。我想不出颜先生官居院长如何作派，他的老太婆般的性格倒是难以给人在官场上拿捏捉弄，或亦因此不致被祸被毁被利用。颜先生到头来只是一介画家，西方与中国的古时候多有如他似的傻瓜，画到老死。要是他看见如彭德怀似的自己的铜像，我猜他会难为情。

我不是颜老的学生，他育人无数，不会记得。我不擅油画风景，也未从他学得什么伎俩，谨记得他的人。他的人，他的弄堂，他的美院的故址，是民初一代宁静的证据与纪念，他们开风气之先，清贞自为，颜先生，则初衷习性，从一而终，不晓得应变，也就不自欺。这样一位民国的憨人，我总算见过他。

上海政府将新康花园作"文物古迹"圈起来，想来不为那里有颜老的故居，他门前不见任何标志，也倒好，有人会记得。一位浙江美院毕业的部队画家，人极斯文，那年讲起一度出掌浙美的颜先生"文革"初年揪到杭州来批斗，他也在场的，后来要我们陪去拜访老院长，临到进弄堂，他踟躅不前了，说要是颜老认出呢？但老人完全不认得，不记得，欠身如仪，然后拿画出来看。我从旁等着，

果然，他又是颤巍巍笑眯眯指点画中的小猫，又是那么欠身对着光亮，举起蜡烛般的手指虚虚捏一捏，轻微地咳嗽似的说：

“那么，画不就给人拿了去吗？我不过拿到一叠子钞票。”



苏州美专故址

老家伙与小家伙

弗莱德·阿斯代尔，几代美国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老牌舞蹈绅士，纵横影坛五十多年，永远一顶礼帽，一袭礼服，白手套银手杖，扬眉微笑，与多少好莱坞美人在银幕上轻歌曼舞，倜傥风流。80年代他早已息影养老，卒岁之年，在电视里看麦克·杰克逊穿着浑身亮片紧身衣跳那种骨节折断似的闪电式舞蹈，第二天早晨七点，阿斯代尔就拨电话过去：

“听着，麦克，我佩服，你跳得太好了！”其时杰克逊二十多岁，才出道。

法国摄影大师卡蒂耶·布列松在他获得西方最高赞誉荣登泰斗地位时，致信年逾古稀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安德烈·柯特兹，他在信中说：您才是我真正的老师。

他俩从未谋面。柯特兹摄影生涯的盛期是在法国，辈分在布列松之上，二战爆发移居美国，不得志，被遗忘长达三十多年，工作不止。他一生的作品开西方摄影日后几乎每一项大风格的端绪：从“决定性”影响了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到今日的“观念摄影”、“装置摄影”。老头子接到布列松向他致敬的信，将信封信纸贴在门板上，老爸爸站在边上，给自己拍了一张照。

帕瓦罗蒂，从他家乡一路演唱出去，每跳一级，都会问他父亲的意见——不知是他父亲跟去现场呢，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听——父亲总是说，还差那么一点，孩子，还差那么一点。不记得是到他

唱进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呢，还是纽约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他爹终于说：现在可以了。

我猜，这位老人说“可以了”，并不看在米兰和纽约的面子，也并不完全因为帕瓦罗蒂是他的儿子。

保平

人 犹 如 此

人挪活，树挪死。但要看怎么挪法：加州阔人区或迪斯尼乐园笔挺的棕榈，并不原先就长在那里，那是专门从高级植树场空运而来，工本繁耗，每株移植费上万美金。

神州处处工地。一年回来一次，不见街树消失的过程，只见昔时林荫路林荫去尽，日头暴晒，坦荡而无情。去年早春，我撞见伟大的景观：为拓宽京城东西向“平安大街”，沿街大树枝杈劈断，连根拔起，既不横倒，也不再直立，有计划地停靠在坑沿的掘开的土堆上，依次向同一方向、以同一倾斜度搁置着，等待处置。

交通堵塞，牛步缓行的车缓缓通过一段接一段街区的瓦砾，一株接一株老树，斜着，排列着，周身点缀着删削未尽的嫩芽，它们一动不动，如在刑场，准备就刑，已经就刑。

树何以堪

据说，自从人类（或猿类？）从树上爬下地面，文明开始了。文明到得今天，人，又爬到树上去——昨日看报：加州一位姑娘上树居住两年总共737天，挑动舆论，救得大树一命。

她叫裘丽亚·希尔，25岁，旧金山远郊伐木镇斯塔福居民。当地“太平洋木材公司”要砍伐一株古老的红木大树，经环保人士抗议十数年无功，面临刀斧。希尔情急，于1997年冬擅自爬上树端，搭起平台，离地面180英尺，赖着不走，直到伐木公司终于同她达成协议：这棵老树，包括周围250英尺内任何树木，永不砍伐。

双方的交涉相持不待细说。昨天，1999年12月18日，希尔爬下树来，喜极而泣。初踏地面，她双腿颤抖，赤脚步往记者招待会会场落座，说她“两年没坐过椅子了”。她在树上熬过寒冬酷暑，看书写诗煮素食，一枚手机终日与各界联络，高高在上举办无数次新闻访谈会。运动器材公司提供她帐篷衣著，支持者免费提供生活补给。美国盛产如她似的好事之徒，盛产赞助好事之徒的好事团体，他们认真地好事，认真地浪漫，假如希尔是位艺术家，那就是行为艺术，观念作品，能卖钱，能出名，当然，树顶上的希尔已经在她的祖国声名远播。

都是人间事。树浑然不知，活下来；树若有灵，人要它死，人救它活，树做何感想？国中大有伐树的人，想必也有人护树植树。师尊木心先生闻知国中群树蒙难，顺口将魏晋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句子改作“人犹如此，树何以堪”，今借来做这两篇短文的题目。

陈丹心摄于2008年3月。

听觉与味觉

立秋才几天，京郊寓所的四外就传来秋虫的鸣唱，波澜壮阔，辽远而清晰。前些日还能“听取蛙声一片”，沸沸扬扬，破窗而入，现在蛙儿们哪里去了？真的，倾耳细听，没有一句蛙的语言。它们哑了。它们全哑了么？

美国东岸，即便郊野孟夏，树上没有蝉叫田里没有蛙鸣；美东几乎没有农田。秋虫声倒是听过，卿卿我我，与中华草莽间亿万虫类的风韵情致，无有两样，一出声即超越地域民族，直趋国际化、世界性，据说，国际化、世界性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达不到，不如虫了。

听秋虫鸣唱聊解乡愁么？不，因周围不见鸡犬猪羊村廓良田，反而更怀乡，怀乡是挑剔的。不过在中国地面听得蝉的聒噪蛙的轰鸣却会想起美国：美利坚的厕所不臭，美利坚的花朵大抵不香，凑近细闻，也不香。

单身囚禁

皖南，泾县，查济村，民宅多建于明清两朝。村民说，那位金庸先生——听说王朔同志向金庸开骂：骂得好——本名查良镛，祖籍即在此地，民国年间每岁举家从浙江来这里祭祖的。

又听村民说，从太平天国到文化大革命，乡里人口锐减，村道败落，然而同我在赣南落户的穷乡比，查济村富裕多了。起造于16世纪的祠堂据说曾逾百数，今仅存其三，村老携我们一一开门看过，虽是条石铺地，雕梁画栋，却早已为岁月与人祸所毁弃，最大的一座尤为凋败，后庭水池池水朽绿，杂草繁盛，随处栖息着蜘蛛和蝙蝠。另有几株宽叶的牛蒡，高达两丈，鲜绿，茁壮，挺立在前堂正殿。迟午大静，惟听得蚊蚋飞舞，祠外夕阳蝉鸣。

有位孤老头独居后庭楼阁，正待起火做饭。西墙角一副门板作床，棉絮烂旧呈灰褐色，光亮处晾晒着七八双捡来的破皮鞋，无缘无故排得整整齐齐。东墙角用树枝胡乱遮拦着，一只高大肮脏的山羊给圈在那里，狭长的脸却是雪白干净，同村里成群的草羊比，貌若贵族。见到生人，它惊走几步，为绳索绊住，颤巍巍立定了，楔形的瞳仁怔怔地瞪着我们。

它是被养来相伴孤独，还是年底宰杀的肉食？苦命老汉沉默寡言目光清癯，像是借宿的贫僧，祠堂的幽灵，他是被岁月扣留的人质——这匹单身囚禁的苦命山羊则被老汉扣留：人质的“人质”。

戴晴写到晚年的储安平，也是深院独居，自做时代的人质直到

“文革”初寻死。“文革”前夜，有位老朋友探望他（好像是梁漱溟？），叩门良久，始得进入。据梁老回忆，他的院子里也拴着一匹单身囚禁的羊。

大右派章伯钧在批斗现场，1957年。

胡兰成

张爱玲先生的小说，读了，又都忘了。除了某短篇描写一只煤球炉停在弄堂口儿白冒烟，活灵活现，还有《倾城之恋》里旅馆床上的那枚电话，主角不挂，也不听……。但究竟怎么回事，也忘了。

不是她写得不好，是我记性不好。

《色·戒》读了好几遍，全记得。同二战前最好的英美短篇比，照样精品。多少描写革命的文字都不曾提供革命的细节，或者说，动作的细节。譬如暗杀，是枪抵在胸口，很近地扣扳机。张爱玲哪里干过这种事呢。干过的，要么不读小说，要么不懂文学（辛弃疾杀自动手，真杀过人）。

后来回上海每经过平安电影院，就会想到曾有位民国女子在此地失风被捕，随即处决。小说里写她胸部很丰满，党内（国民党）派她扮作汉奸的情妇，伺机下手（真浪漫），临阵动了不该动的情（真的浪漫），为情夫所杀。平安电影院1949年后不曾易名，还在，幼时去那一带奔跑玩耍总有千次吧，上海人谁晓得她？“我党”是不会追认她为烈士的——我看小说，好的小说，一律当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1995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挪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我就捡起来读，周围是吵闹的街头音乐与摊档叫卖声。此后，海峡三岸连篇累牍议论这位“民国女子”，说长道短，自有那痛惜哀悼的，也有指她中年后的避不见人是因贫寒而要面子，总之，都动了一番感情，而就我零星读到的，都乏味，或起厌烦——英国有位诗人形容出版一本诗集是“向没有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我读追写张爱玲的绝大部分文字（包括传记），只觉得众人是“在有才能的人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才能”。

而且没有品性。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惟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胡兰成，浙江人，曾任职汪伪政府高层，日本战败后隐匿浙西南一带，50年代初流亡东瀛，著长篇散文体回忆录《今生今世》。1981年客死日本，不知可有人通知张爱玲，其时，距他们分手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全本《今生今世》，目下在大陆还难觅得，其中写张爱玲的专章“民国女子”在国内发表过，当然，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当今作家。偶遇知道他，读过他专章的，略表兴趣，读过全书的，多不以为然：或不见其才，或骂他风流自赏。说这话的，自然是“共和国女子”或大陆“作家”——80年代，我们忽然知道中国有过沈

从文、张爱玲，弄得这二位早已封笔而当时尚且健在的人物譬如文学上的“出土文物”。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在海峡两岸，他是至今尚未出土，或出了土也不宜谈论的人。

革命与相貌

因为张爱玲，顺便说几句苏青。

一位长辈，解放初期在上海第二看守所坐了半年冤狱，曾任狱中为囚犯送书一职（他说，书装在一只藤制的篮子里），于是知道苏青在监。她每次都借阅马列经典，事后上交读书笔记，获表扬。50年代，狱囚可看各类世界文学名著，政治学习、学习心得也未强行规定，是故苏青的表现，的确可嘉。

苏青何以下狱？一个离了婚，并以文学描写离婚的民国女子。推算起来，她当时才四十岁上下。

顺便也想起我家一位故交罗阿姨，幽默，善说话，右派分子，50年代末在提篮桥监狱关押过，竟曾与汪精卫遗孀陈璧君短期同监。我记得她惊讶而佩服似的同我母亲说，晚年的陈璧君老是喃喃重复一句话：我丈夫是个美男子。

汪的黑白照片我见过。胡兰成记汪精卫，说他北伐前在广州演讲，粤地女学生“掷花如雨”，想来是“美”的——马列而成其为主义者，无非催人革命，那时的汪，革命元老，他代国父撰写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今天也还刻在中山陵，所以就起这么一个题目，不知可以不可以。

自左至右：汪精卫、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坐者为张静江。摄于1930年。两位孩子是谁的儿女，不详。

北伐与战争

人老了，自言自语，随时说起老早老早的事，忽然又说别的去，或恬然入睡了——写作要能这样随意该多好呢，我等着老下去。

母亲将届八十高龄，给她看现在的电影录像，不懂，从前的，则要是《早春二月》之类，她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我问，你们年轻时真是穿这样的衣裳，梳这样的头么？母亲喃喃地说：好像是的……忘记了。忽儿又手指镜头里哪位穿长衫的男人笑起来：呶，你在杭州的三外公，从前就是这样子。

那天是看崔嵬主演的《红旗谱》，主角朱老忠手里捏一张儿子寄来的黑白照片，一身戎装，英气勃勃，成了光荣的北伐军官了。那饰演者是赵联，长春厂老明星，浓眉大眼，嘴唇宽厚，今之说法，好性感。

忽然母亲笑了——我也是儿子，我知道：她不在笑电影，准是又给她想起什么好笑的往事了：

“我见过的！我看见过北伐军。”

我身子坐直，朝向她：“好像是两个还是三个，北伐军……妈妈那时还小，二七年？”母亲转眼看我，终于咯咯大笑：

“北伐军在我家洗脚！”

洗脚的“洗”，上海话念“汰”——此下母亲对我的追问只说“别的忘记了”，是的，1927年母亲才五岁：“北伐军洗脚！”我也大笑了，那么，妈妈你怎样呢：

“我呀，我就立在旁边看。”

此外的细节问下来，只是我的太外公与北伐军人在“讲话”，讲的“北方话”，“侉得很”，因我母亲的原籍是旗人。

舅舅的记忆，细节略微多一点，那是他老早告诉我的，我才十来岁，而他在故事中也在十来岁吧，他说，日本人来过浙江的家，母亲流亡去，家里只剩舅舅与外婆——我记得舅舅说到这里也像母亲似的一机灵：

“你说滑稽不滑稽？他们走过家门口，一个小兵指指我：‘你长得跟我像！’然后闯进来。”

我愣住，不明白：“后来吗，后来那小兵临走绕到八仙桌，军刀拔出来，嚓！一刀劈掉一只角，然后走掉了。”

“喔哟！”母亲在侧，叫一声。舅舅还是笑，笑什么呢：“外婆吓煞！”其实母亲早听舅舅说起过，再听说起，还是“喔哟”，带一声舅舅的小名：“阿祥啊！”

我舅舅，上海人艺老演员，相貌英俊。那小鬼子什么模样呢？“嚓”，不难解：及至我插队落户到山沟，一人分得一把新柴刀，左挥右舞，见了什么都要砍！

就是这样子：“洗脚”、“像我”、“嚓”——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的母亲

1927年的蒋介石与马玉祥。

1927 年，在路边吃饭的北伐军人。

1938年　日本海軍陸戦隊上海

民国的下午

民国的老电影也被制成VCD出售了，可惜很少。1948、1949年间拍摄的《武训传》和《小城之春》就不见出版。两部片子虽风格不同，但实在拍得很好，要看，只能去电影资料馆找，很麻烦。

1987年在香港一位影评人家里看了《小城之春》录像，不清晰。1998年纽约哥根汉现代美术馆举办中国电影周，至少十部以上民国经典，这才看清了。李纬那时才二十出头，脸上一根皱纹没有，民国演员的国语念白还不讲究音调语气的变化，一路说来像是背书："那——么，你——还——恨——我——吗？"

且演员多是南人，咬字吐音都还吃力。那时，北方话还未在中国形成语音的霸权，如今听来都是一种好：伴同黑白电影民国影像发出音响，俨然声画"文物"，弥足珍贵。

看到其中的一个长镜头，大约三四十秒吧，心忽然软下来——

是女主角与旧情人在城郊闲步，俩人携手由中景慢慢走入远景（没什么，爱情片的老套），对白、配乐止息了，除了老电影放映时沙沙声响（伴着这里那里爆裂闪烁的胶片斑痕），电影院一片大静，就像镜头中的下午时分那么静：乡间的土路，枝叶摇摆，树影拂动，云翳投射而下，在情人的身上和土路上移动明暗。

因为是电影，因此可以确定曾有一位导演在那里架设机器，命令男女演员在指定方位走动（也没什么，这就是拍电影）。除了李纬，这部电影的其他摄制人员可能已经死了？那个下午确凿死了（这说

法有点做作），所以此刻在曼哈顿上东城哥根汉馆地下室电影院放映的是一段胶片：我在银幕上邂逅了一段五十年前的下午，中华民国的下午，树影拂动，风和日丽。

在银幕上看见已故演员其实就是“活见鬼”——看见老电影里的景色呢？

安德烈·巴赞认为银幕是一“遮盖物”，所有影像从这遮盖物前移过。巴特引用巴赞这段话，意思是他不愿谈电影而只谈摄影，因惟在老照片中他才能探寻他所谓的“摄影的所思”，他说，老照片触动他的不是那固定不变的影像内容（他称之为“知面”），而是不同读者偶或留心到的不同细节（他称之为“刺点”）。为了证明摄影的“所思”（“此曾在！”），他专写了一本书。

此刻也在下午。我用文字书写电影里的另一个下午，那是1948年，“共军”已经齐集长江北岸，来年春天，上海解放了。

民国的教授

以下都是听来的轶闻，主角只限于教授艺术的艺术教授。

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前辈秦宣夫，老来曾经这样地谈及30年代他在法国留学的往事：

“我剪下一撮头发，拌上油画颜料，朝巴黎的墙上一把扔过去——我就回国了！”

这样的念头、行为，而且这样地老来说给学生听，我总觉得非常地“民国”。凭什么我以为民国人是“这样”的呢？

我也不知道。

每个学院大约都会有那么一位被几代师生传作笑料的老教授吧，譬如中央美院国画系的黄老先生，早已过世，我没见过的，据说极好的为人，专有滑稽事情发生。如他在学校对过的协和医院就医，随手提起走廊里的痰盂木盖吐口痰，便攥着那盂盖上写有“协和医院”红漆大字的木头把柄，闲步逛到医院对过的美院展览馆，馆内的痰盂没有木盖，老先生又是一口吐过，将手里那副斯文地罩上，出声惊问：咦！协和的盖子怎会在此？又如他骑车回家，见前面一位妇女在自行车上的背影极似他的妻，于是曲折尾随着，直到那妇女转弯进了胡同里他家的院子。回家进门，老先生急向妻子郑重报告竟有位与她一模一样的妇女进了本院，啧啧称奇，老伴儿说，那不就是我么！

此外还多，不赘述。某人的笑料奇谭，哪个单位没有呢，我却

总以为如此公一类，不太一样：心不在焉，当场糊涂，身为人师而每每举措失当，说明什么呢？那是一种在民国生成，未经毁伤扭曲的人格天然，不曾在日后长期的“会议”与“运动”中弄得警辣提防，慎之又慎，随时自我管束、自我监督、自我改造——早先的这类“糊涂”，谈不上道德品质，不过性情天然，难以劝戒，更不可效仿的。1949年后，类似的憨傻滑稽之人渐成稀有动物，悄悄灭绝，或畸变为别种行为模式了。

美院老院长徐悲鸿身后，他的遗孀，以及海峡三岸的美术弟子美术评家美术史论家不知写过多少专论专书，我读过一二，只难得窥见他的“人”，倒是从美院老师的闲谈中听得栩栩如生，虽是徐先生在建国后的点滴小事。建国后，他也才又活了不过四年：

开学典礼，徐院长穿件长衫做报告，说着说着，一时兴起，说是昨天刚从古董市上觅得一块上好的鸡血石，还就当场从怀里掏出来，亮给大家看。这是听林冈先生说的。

又听侯一民先生说，徐悲鸿去琉璃厂，跨进大门，远远瞧见内厅中堂一幅画，当即叫好：这幅画我要了——都说他的眼光极好，填写表格里的“专长”一栏不写自己会画画，而是精于“赏鉴”——老板赶紧拉他转弯进边厢，说您先看看还有好东西呐！一面，就暗差伙计将内厅的画价牌子给换过了，添上价目，随即徐大师就买了去。

那时虽没有现在似的所谓“市场”，画尚可买卖，解放初期，钱还值钱，接管中央美院的艾青先生就买了不少齐白石的好画，八元十元一幅。他们那时多年轻，得了稿费，也竟有闲钱去买名家的原作。

徐院长的私人司机，哪天冷不丁说：徐院长，您可画得真是好啊！老院长接口道：“怎么样，家里没钱花了？”于是就画了画送给司机去换钱。也巧，这是今年才从美院一位老职工那儿听来的。

自然，以上无妨作“演义”论，真确的程度是可商量的，但说者都亲自与前辈相处过，即便有所渲染、夸大，以至讹传，我也信，

因其中有“人”。

黄宾虹画稿成堆，也据说是不分来客身份贵贱，若是开口，他只是请人随便挑取——我所听过的民国一代的“演义”也多到可以随便挑取，可惜此刻坐下要来写，却忘了大半，这就可见得书写往往不如口传。在我印象中，“演义”虽内容各异，但不外是民国前辈的“真”。而前辈的性格、性情绝非仅止那一面。前述零星“段子”虽或了无深意，却可透露些许人格的消息吧。

近时读到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其中的细节可就多了，放在今天看，简直匪夷所思：譬如攻哲学的熊十力，管他政要淑女来访见，坦然赤膊；治旧学的刘叔雅在西南联大跑警报，喝止别人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没人讲‘庄子’！”教德文的杨丙辰，领到薪水先在学校据案分几份，说是总要给穷朋友留点钱呀，又得瞒夫人……北大的孙以悌初写书法史竟有“六朝格调”，而年纪轻轻索性蹈海去寻死。为什么呢，我想是为活得干净吧，但他还在当学生，并不是教授。便是当教授，如杨绛有篇散文写到那位清华大学教物理的老教授，50年代初也为干干净净做个人，没挨整，没事由，也就自杀了。

时代递变，先是人在变。“余生也晚”，认识前辈，或知道类似演义的人今已不多，谅也不少，也来说说如何？

[illegible]校长梅贻琦和他的部分同事，
[illegible]年4月13日为梅贡之组织七十寿宴，
与美国客来宾合影，请下次[illegible]

图中的孩子若非高寿，今日想必多已亡故了。罗伯特·卡巴1938年摄于汉口。

民国的教师

以下的情形，倒是从书中看来的，即胡兰成先生的《今生今世》。

胡兰成“附逆”之前，不过好比那时的“盲流”与“知青”。1930年前后，他妻死母亡，愁困茫然，从浙江乡下出来，随绍兴几位读书人远赴广西教书，到得南宁，他人先后就职，就剩他没着落：

> 我初来水土不服，就病倒了。却不知是什么病名，亦不延医服药，时时发热谵语，醒来只仰面看天花板，此时惟有一个念头，等病好了我去江西加入红军，但此念是从平静的心底升起，对人世一点仇恨亦没有。

30年代的“知青”会有这样的念头，更有当时的“江西”、日后的“延安”这样现成的去处可投奔。要是真去了呢？不久，他被南宁一中录用了：

> 一中教员广东人多，他们没有江浙人的文气，却吵吵闹闹，大说大笑，呼朋引类吃东西，这我倒是喜爱。……在教员宿舍里常常追逐为戏，学生见了也不以为意，有时已打上课钟，教员房里还在角力，一个被揿倒在地，背上搁一枚板凳，凳上把面盆茶壶茶杯墨水瓶等什么都搁上，面盆里又满是水，好让他起不来，那一个就管自去上课了，这一个却一撑起身，豁啷啷把面盆茶里都打翻，也神色泰然去上课了。我当即与他们相习，往往看过一回书，便到同事的房里去撩：“我们来打一架好么？”他也放下事情

道，“好呀，不打架还是人么？”如此就又角力。

身为中学老师，成天打架，什么意思呢？借胡兰成常用的词，叫做有“阳气”——在我辈上中学的年代，老师们成天价训人，或者被训，或则斗人，自亦被斗，总之一股子躁气、戾气加晦气——自然，民国有民国的险恶，但也似乎险恶得有“阳气”：

> 同事中惟国民党与桂林籍的风雅之士，于我性情不宜，公民教员黄钧达是省党部委员，大家与他少有来往，训育主任姓潘，他每每讲述白副总司令（按即白崇禧）的饮食起居，我亦不喜听。一中与女中的教员一晚在省党部联欢聚宴，这潘主任坐在我旁边，听他又讲说，我时已醉，因道“你们广西人真小气，我家乡近地出了个蒋介石，我都平然。”他一怔，却笑道，“那么你不佩服白副总司令？”我怒他这句话问得阴毒，乘醉大声道：“他也不过是白崇禧罢了，而我自是胡兰成。”他再拿话引我，我大怒道：“你是想引我说出反对白崇禧，你听着，我就叫一声打倒白崇禧！”当下我只见席上凌乱，女中的体育教员，我今已忘了她的姓名，大约是个共产党员，常时倒待我很好，今见我闯祸，她就领头叫众人都唱歌来掩盖，我被用汽车送回来。

之后胡兰成也并无事。他接着就写到30年代的政治局势与教员的“成份”：

> 当时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就中白崇禧尤其是名将，志在浑定中原，招聘留俄学生为用，因此就有不少在上海失了风的共产党员避到广西来了，一中教员即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皆有，而我是敬服托派。起先听他们谈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形势，真叫我望尘莫及……
>
> 但我自己什么热闹都不参加，我亦不与桂林籍同事联

前往参加抗日运动的爱国学生，摄影者为大
学生于30年代，在这期间参与此活动，拍
摄后不久阵亡，时年二十五岁。

吟古诗，我亦不留意党政军要人的佳话，我亦不与左派同事合唱瓦尔珈船夫曲或国际歌。书生我原不喜，与要人我更无缘，而且许多所谓革命者我亦与之相远。首先我就怕听慷慨激昂的话，那其实只是激昂，却并不慷慨，他是假意的这样说说，已经不好，而他若认真这样的做起来，更其不好。这样人又往往会现实得出奇，非胆怯涕泣，即冷静得残酷……

然而看他的描述，这些“革命分子”除了教书，平日似乎也并不真在闹革命：

但是我这个人也实可恶又可笑。一中有个女同事李文源，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妹，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一向在上海做共产党员，几番被捕，得李扬敬保释，这回才避到广西来的。她教初中国文，遇疑难常来问我。晚饭后天色尚早，时或几个人出去郊原散步，到军校附近，听她唱国际歌。另有个男教员贺希明，也是共产党员，在对她转念头，不得到手，却猜疑她是心上有了我之故。我原也觉得李文源生得活泼倜傥，但是不甚喜她的党员气派，两人说不上存有意思。那贺希明，后来事隔多年，共产军南下后做起苏北军管会主任，但早先原是托派，惟我总看不起他的粗犷而用权谋。那天几个人在贺希明房里，他拿话试探我，我不喜道：“那李文源也不过和千万人一样，是个女人罢了，有什么神秘复杂。”他又拿话激我，哄我打赌敢与李文源亲嘴不敢。我明知他是想要坑陷我，偏接受他的挑战，也给他看看人害人害不死人，除非是天要灭除人。

我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那边，一直走进级主任先生李文源房里。是时已快要打钟吃夜饭，南国的傍晚，繁星未起，夜来香未放，亦已先有一种浓郁，李文源房里恰像刚

洒过水似的，阴润薄明，她正洗过浴，一人独坐，见我进来起身招呼，我却连不答话，抱她亲了一个嘴，撒手就走了。

其时胡兰成二十七八岁。那年头，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相与共事，说笑，恋爱，吃醋，打赌，是一群年纪轻轻的人。

十年后，抗战胜利，伪政权覆没，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逃亡浙江境内。经温州一位老士绅刘景晨介绍，他先后在温州与雁荡山中学教书——刘景晨纯然是传统文化的末一代人，这样的长者，今遍中国已绝了迹了，胡兰成于他着墨甚多，摘引太长，只得略去——这回，我们有机会读到民国时期江南文人的群像了。

先是夏瞿禅、吴天五。夏时在浙大任教授，"填词当今第一"，"其词古语皆成新语，写今事亦好像诗经里的"。吴"曾从黄宾虹学画"，"字崇王献之，又曾学古琴，诗文皆根底甚深"，因富有不作事，"又因已有瞿禅，他可以不作诗文，连字画亦像他的琴，等闲不作不弹"。

瞿禅的相貌有点像罗汉，天五则长身白皙，皆是可亲的人，说话行事，愈是久后，愈叫人敬重。是时尚在暑假期中，一晚温中请瞿禅讲长恨歌，我亦去听。瞿禅讲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对于刚才的讲演我也不赞，而只是看着他的人不胜爱惜。我道："你无有不足，但愿你保摄身体。"古诗里常有"努力加餐饭"，原来对着好人，当真只可以这样的。……

同事中我与徐步奎顶要好……他才毕业浙大，是瞿禅的学生，却学的西洋文学。……他心思干净，聪明清新，有点像张爱玲，但是我很心平，因为他不及爱玲……

还有徐玄长……他是乐清旧家子弟，年已五十，在家里仍称少爷，书画金石，丝竹吹弹，无一不会，且是个心平气和人……

从步奎我又相识了马骅。马骅又名莫洛，夫妇战时在

大后方办左翼文学刊物，归来家徒四壁……

一年后，胡兰成转往雁荡山区淮南中学：

校长仇约三，是吴天五的亲家翁，仇家在大荆（当地地名）有名望。他师事马一浮，而近于黄老，现年五十八岁，像三国演义里写的诸葛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五绺长须，无一茎白。淮中是私立，又在山中，设备差，学生少，教员也乡里气，倒是合我的脾胃。那仇校长办学，不甚依照教育厅规定，凡事自出心裁，简静于色……

像这样的山区私立学校，1949年后自然是不会有了。如今雁荡山乡农家孩子怎样读书呢？又过一年，胡兰成再回到温州中学，与他钦佩的夏、吴二位及“顶要好”的徐步奎一起，那年，全国将近解放：

亦常去杨雨农家。杨家有钱我不羡，我喜他有钱能豪华，且豪华得本色。淮中仇校长与我算得投机，但他对村人有一种世家的傲慢，杨雨农却是米店倌出身，不论穿长衫的穿短衣的他都平人看待。

胡兰成隐名埋姓，自有憋屈，在好友面前熬不住拿话试探：

向步奎我亦几次欲说又止。我问他：“白蛇娘娘就是说出自己的真身，亦有何不好，她却终究不对许仙说出，是怕不谅解？”步奎道：“当然谅解，但因两人的情好是这样的贵重，连万一亦不可以有。”我遂默然。

他所写的步奎确是可爱的：

还有是上回我与他去近郊散步，走到尼姑庵前大路边，步奎看着田里的萝卜，说道：“这青青的萝卜菜，底下却长着个萝卜！”他说时真心诧异发笑，我果觉那萝卜菜好像有一桩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步奎好像梁祝姻缘里吕瑞英演的

银心，总使我怀念起另外一个人。

步奎已与肖梅结婚，他却于夫妻生活多有未惯，这真是好。他对他教的那班学生亦不溺情。一次他来我房里，惊骇而且发怒，说道："学生拔河时，他们的脸叫人不忍看，学校里这种竞赛的教育真是不应该！"我当时想起爱玲在松台山看见训练新兵。

为什么见萝卜菜而"真心诧异发笑"、婚后"多有不惯"、对学生"不溺情"、又"骇怒"于孩子的拼命竞赛，在胡兰成看来是一种"好"？今天我们的"五讲四美"，我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的所谓"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云云，对一位青年教员的"发笑"、"骇怒"、"不溺情"作何评语？怎样处置？

说到"训练新兵"一节，也写得好。而这样率真地看待操练的士兵，现今又会被怎样地看待呢？索性抄来，是张爱玲去温州探望胡兰成时：

有一小队新兵正在操练，我们一走走到了近前。关于兵，爱玲本来亦没有意见。前此在上海时，她还讲给我听，一次有三五个日本兵在公寓面前人行道的列树下放步哨，穿的草绿色服装，她的姑姑从楼窗口望下去，说他们像树里的青虫，她觉姑姑形容得非常好。还有我问炎樱，你们印度的独立领袖鲍斯若要招募女兵，你也去么？炎樱道：去可以，但是先要照我的心意剪裁出好看的兵装。爱玲亦以为然。又若爱玲遇见中国兵与百姓问答，必定看出两边都有幼稚可爱的惶惑来。可是现在她见了这些在操练的新兵，当下惊骇得扯住我的衣袖回步，说道："他们都是大人呀，怎么在做这样可怕的儿戏！"

回头说步奎：

步奎近来读莎士比亚，读浮士德，读苏东坡诗集与宋

六十家词。我不大看得起人家在用功，我只喜爱步奎的读书与上课，以至做日常杂事，都这样志气清坚。他的光阴没有一寸是雾数糟蹋的（雾数，浙江土话，混浊、琐碎、没出息的意思）。他一点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他亦不愤世嫉俗，而只是与别的同事少作无益的往来。

“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不愤世嫉俗”、“与同事不作无益的往来”——现今，这会被看作青年与教师的“品德”么？

且看胡兰成怎样写到中年一辈的教员：

他们四平八稳，毫无精彩与毛病。他们在本地教育界的职业地位已根深蒂固，若不经抗战的播迁荡析，怕已成为学阀了。……他们多已年纪五十要出头，倒还是经过五四运动时代来的，如今只落得为官为商皆不如人。其中却有一位董先生，致力学术，长年累月在寻材料，要依照汉书的体制著民国史……看样子他是渐渐要成为宿儒了。但是写历史要有一代人的笑语，董先生缺少这个，我与他们，见面惟客客气气，从来亦不玩。

尚有比他们年轻些，四十几岁的教员当中，颇有几个有才情的，可是又才情太多。一个是郑先生，家里是乐清地主，北伐时他活动过，但他的家业与他的人已多年来停滞破落了，变得沉缅于冗谈，渐渐连他的嘴亦像是梦寐的呓语不清。他却又博极群书，前朝的掌故亦很熟，现代知识的水准亦很高。我听他说科举，考秀才的文章要清通，考举人的文章要才气如江海，而中状元的文章则要如丝竹之音，我觉得非常好。可是那回金校长限制教职员领用信封纸，别人犹还可，忽听见郑先生在走廊里粗声大骂，我着实吃惊，就把他的人打了折扣。这郑先生，每隔一两礼拜必回家去，带来一盒私菜，饭厅里与同事一桌吃饭，他拿

出私菜，连表面人情亦不做，只顾他自己吃罢了，偏又他的吃相有似狗马占住自己的槽一心在吃，对周围甚为严重。

这“对周围甚为严重”一句，写得好。再看下去：

郑先生与曾先生最要好。这曾先生，单名一个猛字，教初中公民与国文。……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虽已脱离多年了，仍说来说去说托派，因为此外他已一无所有。托派的人往年我也见过，却没有像他这样粗暴的。三日两头只听见他在酗酒大骂，听得惯了，亦无人查问他是骂的哪个，所为何事。……此外有个教数学的陈先生，惟他年已五十，应列入前面说过的老教员中，但他要找闲谈的对手还是只能找郑先生与曾先生。他以前曾拿数学研究过易经，现在……必要人听他撰的对联，诉说他的处世做人，要你做他的知音。

这三人，本来思想不同，尤其曾猛是个草包，靠思想为活的，但是他们合得来，因其没落是一……他们常在郑先生房里，不然就是在曾猛房里，买来烧酒，拿花生米或腌肉过过，沉缅于闲谈，形势像是作长夜之饮，但便是那饮酒亦没有一点慷慨相。

胡兰成心里看他们不起，自然得罪，这里抄一回：

……我、步奎、郑先生、陈先生与曾猛五个人，步奎是来寻我的，我已要走，却因说了一句吴天五的古文有工夫，想不到曾猛就装醉大骂吴天五，我来不及拿话给天五收拾，已经夹头夹脑骂我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了。我与步奎回到我房里，曾猛还在大骂，也是骂到廊下，声音就像破锣破鼓，使我想起古诗里有一句是“战败鼓声死”。

十五年前我在广西教书，同事也有是从时代的前线退下来的，都没有像这样子。时光真是不饶人，今又曾郑的

奇拔，乃至董先生的渐渐要学成通儒，乃至金校长的励精图治，都是“斜阳余一寸，禁得几消魂”。

可是其余许多教员，年纪多在四十以下，三十以上，单是教书养家，亦有很要朋友的。他们既少野心，亦无卑屈，看来庸庸碌碌，却热络现实，有市井之徒的正直大气，这就健康。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护持，他们与英雄美人倒是性情最相近的。……尚有少数新教员是步奎的一辈，刚从大学出来，最是他们身上钟有抗战时期的朝气。他们多思想左倾，但他们的好处有在是非之外。

胡兰成鄙薄没落文人，以他的意思是怎样才好呢？早在广西教书时他就为文化人的“貌小破落”而“忧伤发怒”，他说：

第一，中华民国现在这样贫弱总不是事，孟子赞大禹亦因他的功利在天下，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第二，那些不诚实的豪放与优雅，实在应当一扫，还有辛苦学得来的西洋东西，到底连对自己亦不能倾心相知，这时却有个马克思说要扫清一切雾数的感情，而且敢于平视西洋的权威东西，这就可喜。马克思主义虽是他人的声音在叫，但也激发了中华民国一代人的大志，且要来从新来格物致知。可是亦因如此，所以我到底没有加入共产党。

小小温州城，当年是这么一支“教师队伍”：有收集资料，要来“依照汉书的体制著民国史”的，有“拿数学研究过易经”的，更有当过“陈独秀的秘书”及五四运动过来的一代人。这些人的学问，今日或可在名牌大学当个“正高”级教授以至“博导”吧，当年也不过在乡下中小学教教书。

胡兰成混迹其间，还曾以化名与梁漱溟通信，梁引为知己，解放后甚至请他北上共事，老士绅刘景晨，则向胡兰成说起过陈寅恪，深表钦佩。梁、陈二位先生的名节际遇，不消说了，总之，胡兰成

当年要想扫荡的，总算给扫荡干净了，连同他自己。

今天，这一个个“知识”的“分子”都在哪里？若已死去，怎样死的？是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扫荡干净了，此后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从四万万五千万到十三亿，自也密密麻麻生养出文化知识嗷嗷待哺的穷孩子。到如今，据说还有在板桌板凳都没有的土屋里上学的，或者根本没处去上学，干脆不上学……那情形，是我从张艺谋同志的力作《一个都不能少》及更早的一部得奖电影《凤凰琴》里看来的，其中的情节，是连乡村教员的薪水也经年累月地积欠着。

怎么会呢——但愿历来富庶而有文脉的江浙一带，不至于此吧。

1900年 清末的学堂。

这群国家干部与这个用家庭所形成的那个阶级，使千千万万刚刚孩子读不起书、上不了学，同时我们也被告知那个厚厚的阶级平台墙应该消失了。今天，新一代国家干部、新一代时装设计师都应该开始有着这幅灵动的海拍。（图片提供：新华社）

解放军攻占南京，市民围观。
卡蒂耶·布列松摄于1949年。

凄凉的喜悦

《今生今世》上下两册约三十多万字，其中的历史细节俯拾皆是，以上摘录只是极零碎的一小部分。既是抄得兴起，索性再抄一小段，片刻可以读毕，因写到解放军，是胡兰成在山区中学教书时亲历的人事。我辈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读“革命教材”长大，而这一段却是我读到最生动的关于解放军的描述：

> 浙江省境内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万余人，其中在雁荡山出没的一百几十人，名称只叫三五支队，国军却开来了一旅还征剿他们不了。淮中附近一带村落都向三五支队输粮，政府的税吏不敢下乡来。三五支队行军，有田夫樵子先在岭路上为他们放哨瞭望。一日，他们在萧延寺昼憩，遭遇国军掩袭，就只这回颇有死伤。他们且战且退，据岩险相持，到夜色已深，始得逃脱。伤者匿在路边山上柴草丛里，自有村人连夜送水浆乳粉去调护。
>
> 这些村落里却是既不开会、又不斗争，人们的口里，将来共产党的天下要分田这句话是有的，但亦不见得是为了这个在刻心刻意的期待，事实上减租运动都不曾听闻发生。这些村落与别处的村落一样，只见得男人在畈，妇女在家，畈里家里皆风日妍静。
>
> 中国民间是向来不谈政治，却有渔樵闲话与弹词。……我听不进左翼文化人的理论，但我仍喜爱他们的

人。他们说："农民为土地怒吼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事实是连上海等大都市里亦竟无政治性的工潮，闹得起劲的，只是文化人与大学生。胜利后我看过一部电影片演的抗战故事，完全是假的，但我仍爱看，因为那剧中人亦分明觉得自己是在做戏，所以好。

可是三五支队竟这样清静。他们都是年轻小伙子，规矩听话。他们心无杂念，去尽夸张。因为民国世界真的在清早晨。天下大乱，而眼前这些游击队却是可亲的子弟，反为只见国民党在狂躁不安，不得其所，顺逆之势如此倒转，就是旧朝将没，新朝将起了。

还是上次暑假将尽时，有几个教职员先已到校。忽一日，三五支队经过。我们出去看，只见队伍散入村中人家造饭，几个指战员与政委立在小桥头。其中一个政治指导员，抗战时期他曾任美国在华派遣军的联络工作，胜利后回故乡，到淮中教过书，今番看见，当然要请他到学校里坐坐。请了几次，他推却不过情面，才与我们同行，好比是请女朋友。

到学校只有几十步路，我就在大门里走廊上移过一只长凳请他坐下。他安静的坐下，不东张西望，不问这问那。惟我是初识面，马君萧君陈君与他同事过，提起别后想念之意，他只答说："此地有一个中学能存在是好的，我们路过不进来，是为不要引起国民党的军队对学校误会。"三五支队的确对淮中名里暗里都不做工作。而眼前这个人，却使我想起史记里说张良如妇人女子。女子有一种贵气，不可非礼相干，而又委婉顺从。

他坐了约有二十分钟，马君要叫厨房烧面，他辞谢说不必费心，十分却不过，他只接了一杯开水。我惟见过日

本的茶道，有这样的虚静清纯。他竟不说政治的话，连寒暄亦少，真真是浮花浪蕊都尽，别有淹然风流。他好比是麒麟不忍践踏生草，而人亦不忍伤害麒麟。

全国解放，胡兰成还在温州留了一阵子，并去看望那位“麒麟”：

在雁荡山见过的三五支队政治指导员，今是温州市委，兼温州人民日报社长，我到报馆去看过他两次。一次去，他留我吃午饭。有乡下来的代表，都是穿短褐的耕田夫，饭开出三桌，椅凳不全，就立着吃，饭是糙米饭，一碟吹虾，一大碗腌菜，上面铺着薄薄的几片猪肉，都是毛，大家就这样的吃。这里好比喜事人家，主人与动用人在商讨有哪些事已做了，等会再做哪几樁，现在且开出饭来胡乱吃一些。又一次是我去时，那社长刚午睡醒来，报馆里他住在前厅一个厢房。只见昼长人静，他房里的简单，好比弘一法师当年在延庆寺。他是要人，共产党又开会特别多，我看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四五小时，却难得仍是这样的清纯，身上没有权力感。我问他今后或想要结婚么？他道：“今后大约还有十年十五年，不能去想自己的生活改善，我这个人已给了党了。”我听了有一种凄凉的喜悦。

“十年十五年”后，不知这位“麒麟”是何级别，生活可有“改善”，娶妻生了没有。1957年愿他平安，“文革”委屈自是不免，只要不丧命，迟早复出，有车坐，有会开。倘若高寿，今已八十岁上下。他姓金，书中未写出他的名字。

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
The China Studio
amoy
中國照相館
廈門

鲁迅的墓园

上海的虹口让我想起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地面广，居民多，世纪初即有自己的历史，因被河流隔在都市主体之外，好像是另一座城，容易被忽略。自幼及长，我仅到过那里三两次。今年因故造访，越过苏州河，想起末一回来，竟隔了二十多年了。

凡建国后出生的当地孩子，对当地历史一概无知。虹口，只因有虹口公园可以玩，如在鲁迅墓前戴好红领巾集体致敬之类，然后散开来奔跑玩耍，倦极而归。虹口的街头巷里多见造型厚重的闹介式欧风民宅，虽然早已破败，那层层叠叠的拱门廊柱，还是殊异于卢湾区徐汇区一带法租界建筑景观，自有虹口自己的情调在。幼年蒙昧，哪里晓得什么是租界，现在也才知道，这虹口街市的残存旧貌，乃是沦陷期间东洋人犹太人聚居生活所留下的浓淡遗风。据说日本战败投降，大批侨民撤走前当街设摊，贱卖家当，我的一位老师即从中觅得塞尚的画册与贝多芬的唱片。鲁迅先生的骨殖被移回虹口是因他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岁月，而当年他特意迁来安家，其实为了此地是日租界的关系，这关系，自然更要追溯到他早年留学东瀛的渊源。至于后来日本人的攻陷上海、荼毒中原，直到败落、投降、撤家当、摆地摊，鲁迅已在地下，都不知道了。

他生前，只是虹口弄堂里一介居民，入住短短十年，与千万老虹口住民相比，资历很浅。现在，全虹口占尽了鲁迅声名的无限余荫，这声名早已是虹口地图中的头块招牌，犹如他生前嘲笑的“匾”。

那天下午日色淡薄。江南的、上海的三月夕阳，总是淡薄的，尤当春暖与春寒之间，用文艺腔说法，颇有先然惆怅的况味。游人不多，草坪上仍见群孩跑跳戏耍，叫喊声清亮空远，热恋的男女自然是勾留在灌木丛里，或依偎在树下湖边。那回鲁迅写到“一二八”淞沪战争市告平息，就近公园又见“携手同行的爱人”，不知可就指的是这里。他是极少逛公园的，哪里想到自己的墓地会在虹口公园，还加上巨大的近年斥资翻造的他的纪念馆，而这座老公园也换成他的名姓了。他在病中说，死后使将他“埋掉，拉倒”，这样地说话，立遗嘱，中国也就是鲁迅，为了他会得这样说话，我总在想念他。

他的葬所先是在西郊万国公墓，照片上看，小而朴素。童年时我随父亲去过那里，在周璇的气派堂堂的大石墓旁立了一会儿，碑面上她的名字前刻着“电影明星”的字样，此外记得父亲还指点靳以先生的碑，我只是管自在树丛里捉虫，撒尿。不久“文革”，整座公墓荡然无存，我骑车经过，看见大片被翻掘的新土，夹着树根、碎碑，还有石雕天使的残片——那里现在早已成了“虹桥开发区”，谁晓得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底下，原是一片宁静的西式公墓——后来，我在纽约几座公墓看见数不清的石雕天使与耶稣像，想起上海，从前的高等上海人是连死后的墓园也要全盘西式的，虽然这西式墓园是“人十”也难“为安”，终于连葬人的公墓也统统给黄土埋葬了。

要是1966年鲁迅先生的墓还在那里，红卫兵砸不砸？或许又得向忙不过来的周恩来告急请示吧。看来中央政府真是有远见，1956年给鲁迅隆重迁葬，倒好像早就料到再过十年会有大祸。鲁迅这块“匾”，真是够大。他生前，亲近者就都叫他“大先生”。

我记得“大先生”纪念馆的规模原先很小，新馆扩建，高大豪华，白墙还新得耀眼。大堂阶梯铺满仿大理石石面，上百名中学生的喧哗在厅堂里回响，我只得先逛礼品店。有鲁迅收藏的木版画出售，宣纸誊印，效果尚属纯正，买了一幅，是漆黑的风景，看去非

常30年代，非常鲁迅。内馆的布置动足脑筋，不细说，最好看还是那些陈旧的手迹，简朴憔悴，与崭新考究的展室材质相间杂，尤显得珍贵。驻足读完的一页讲的是“言论自由”，内容虽早已读过，我还是笑起来。他写焦大的开骂其实是为贾府好，而新月社的骂政府，也不过是“老爷，您的长衫该去洗洗了”之类善意，结果都给主子“塞了一嘴马粪”。我每想起鲁迅，总会笑，譬如他写过别人的骂他，就接着写自己怎样躲在西晒的房间里，“浑身痱了，一声不响”。前些年买到新出的《鲁迅与他的论敌》，两厚册，总算收齐了当年众人围攻的文字，竞相吐口水一般，且多有建国后身居高官或落魄倒霉的30年代革命青年与文学新秀，用辩证唯物阶级斗争之类“前卫”辞令，严厉地教训，严正地批判，“文革”腔调“文革”凶相，那时即已滥觞了，至于众人叫骂的篇幅，则数倍于鲁迅所“还击”的文字，我于是想到老先生的一声不响，“浑身痱了”，倒是实话。后来见到叶公超晚年的文章，说是读过鲁迅与众人的笔战，发现众人“远不是他的对手”的。

如今撩拨鲁迅的对手是永远失去对手了。有位长辈说起另一位为人淳厚的长辈，自称年轻时也曾发文撩过鲁迅一次，忆及“论敌”的简短回应，还意气扬扬地夸耀道：到底鲁迅，几句话，我就给他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这倒是民国与民国人的可爱。所谓笔战，双方有快感的，而社会也有快感，有笔战的社会，总还算健康。

后来呢，后来是“笔”也没有，“战”也没有。

展厅末尾的装置颇见效果，今之上海人还是会做事的：一间录像放映室，四壁是鲁迅图像的拼贴，及顶及地，影像，当然影影绰绰，非常地民国，内容有灵柩、灵堂、葬仪，还有1946年在万国公墓的纪念会，为首即站着曾经教训鲁迅的郭沫若，另有叶圣陶先生慷慨发言，还年轻，顶着贝雷帽，西装领带配一件鸡心领毛衣的打

扮，两手背在后面，活像当今“文艺界人士”，原来民国即曾有了这套“造型”模式的，难怪鲁迅总是一袭长衫，要被青年人骂作“封建余孽”。这影像室不停播放的旁白朗诵，太过装腔了，刻意压扁语音拖长声调，哽咽欲哭似的，给鲁迅听见，又要取笑的。出口走廊，也是及顶及地挂满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鲁迅著作的不同译本、版本，诚然文学泰斗相，而泰斗本人的画像照片呆在封面上，对后世的光荣铺张，一脸漠然。这书墙，这影像馆，是从西方美术馆后现代展览的装置美学中学来的，用在这里，倒是好看。此外的布置，煞有介事，我觉得鲁迅先生总会不以为然：死后由人摆布的无奈何，他早就写过的。

出馆走动，夕照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在近处公园餐厅买了一只热菜包子吃，信步转弯，就远远看见墓园前方的鲁迅塑像。幼时仰望这座塑像，高在云端，现在看，显得小多了。

我就停下来看他。他在灯光弄暗的展室里太气闷的，坐到室外，裹着类似青铜或泥灰的材质，在夕阳的背阴里可以透透风。现在看来，这件作品比后来种种夸大其词的同类雕像，好得太多了，虽然不免将他瘦小的身量竭力增扩，但作法妥帖平实，面相很逼真，很像他惯常的神态：不作表情，没有表情。他的二弟当年厌恶这样子竖起雕像作弄自己亲哥哥，二弟后来埋在哪里，墓园是怎样的呢？其实他哥哥还是幸运的：若给留在万国公墓等着给掘开，或更为不堪，挪到八宝山，岂不是连商量也没得商量。鲁迅长眠在此，绿树环侍，无人搅扰，虽在墓园的隔壁耸着巨大的体育馆，大煞风景，但这一角总算是翳然静穆。50年代的筑造设计也甚坚固、正派、大气，据毛泽东手书凿刻的金字横联墓碑，几乎给两棵茂盛的玉兰树遮没，左右回廊满缠越冬的紫藤，幽僻肃条，我就坐下来。

时已垂暮，游人不至。身旁的石柱上端不知哪位痴汉写一行墨

字："某某发誓此生就爱梦娣一人"，下端还涂着英文"我爱你"。吴地风俗，多有为女孩取名"招娣"、"来娣"的，意谓召唤男孩，一胎化政策后，女孩芳名中这"娣"字遂绝了迹了。少顷，有位白发老人走来鲁迅墓穴前的石铺平台上，左手提一铁桶，右手握管大毛笔，往桶子里蘸蘸，毅然决然就地写起字来。这里可以涂写么？"文革"时红卫兵即曾随地刷写大标语，弄得满地红漆黑墨的。走近看，原来老人家蘸一桶清水，自练书法，比王羲之的沙地划字潇洒而威风得多了。只见他写的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千字文，每字两尺见方，俨然有碑气，转眼写满十数米宽阔的石铺地面，随写随干，通篇像是水煮活了，冒着迅速被石面吸收的细小水沫。一队日本游客走来，啧啧称奇，老人身板一挺，竟同他们讲起熟练的日本话。待我退开时，不知从哪里走出一群神情踊跃的老头老太，大声唤那书法家，像要商量什么快要发生的事情，我想起先曾听在沪的朋友说，鲁迅墓前的大平台近年是老人集体唱戏跳舞的好地方，人多势众时，就围着塑像周围的冬青树丛咚咚锵锵团团转。

这倒不坏，有点像"社戏"？我猜，"大先生"不会介意的。

好了。出园时本已没什么念头，可是路经一段湖岸，眼看垂柳涟漪，似曾相识——啊，今天不来这里根本想不起了，我眼前竟闪出老早老早的一瞬：我还小，随父母在虹口公园走，忽儿往来游人脚步放缓，纷纷看向那段湖岸，只见紧临湖水的假石上，一对恋人危然对坐着，鞋面几乎要被水波浸湿，我记得他俩欠身执手的侧影，姿势诚恳而蹊跷，母亲悄声要我走开，别看，她说你看见吗，他们是瞎了。

众所周知

首先！首先必须指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毫无疑问，不难看出，不可否认，不但如此，恰恰相反，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们一贯认为——事实证明，如事实已经证明的，如事实一再证明的——必须指出，必须指出的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某种现象，代表着某种意义——基本上、表面上、事实上，也就是说，进一步说，更进一步说，再进一步说——从这方面说，从另一方面说，请允许我说——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我本人，我发现，我相信，我指出，我必须指出，我有必要指出——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如我早就已经指出的，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的——问题在于，关键的问题在于，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正因为如此——从根本上说，从本质上说，从问题的实质性说，从问题的复杂性说，从问题的严重性说——在这种普遍的情况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想说的是，我的看法是，我的观点是——请允许我打断一下，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请允许我在这里补充一点——众所周知！

《丝　瓜》

我家每年都种几棵丝瓜，它长得很茂盛，一次次开花，一次次结果，直到深秋还是果实累累。

丝瓜的生命力很强。它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能生长，在石缝里，墙角下，或在贫瘠的土地上，随便撒下几粒种子，浇上点水，就会长出嫩绿的芽。丝瓜耐高温，耐潮湿，耐旱耐涝。只要给搭个架子，它就会攀缘而上，茁壮地生长起来。

丝瓜朴实谦虚。它在晚上七点多钟开花，花儿黄淡淡地不鲜艳，不奔（夯）目，也不芬芳，是极平常的花。丝瓜的果实是绿色的，始终和叶子的颜色一样，它不像辣椒、西红柿那样，一但（旦）成熟，就向人们露出红红的笑脸。

丝瓜浑身是宝。它不仅可以吃，还可以药用。嫩丝瓜用来炒菜、做汤，那味道特别鲜美，如果吃老了的丝瓜，还可以镇咳祛痰。丝瓜的叶子可以消炎止痛，瓤可以消热解毒，如果谁长了痱子，用丝瓜叶子一擦，那就清凉舒服了。

丝瓜，多么可爱的植物啊！求人的极少，给人的极多。

这是谁写的短文？不知道。还是在皖南，泾县，查济村。昼午日长，我走进与客栈毗邻的小学校院，在桌椅翻倒的空旷教室里，黑板上贴着上学期的学生作文，其中就有这篇《丝瓜》，笔迹歪斜，没

有署名，只用彩色蜡笔在短文后画了丝瓜和棚架。我读了两遍，一字不易抄下来，此刻又一字不易打到电脑上，连同两个别字："作者"像是位女生，是在查济村溪流临水捣衣的小姑娘中的一个。门首的红漆牌子标明是五年级教室，那么，"她"十二岁。

十三岁我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此后没再上过语文课。我自以为热爱文学，一厢情愿，总在试着拜读"文革"后的新文学，据文学专家说，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众人推举，我拜读的是当代文学名家的名篇。除了个别例外，我发现自己总是读不完，读不下去，有时连一页也读不下去，这可怎么办？现在，在一间乡村小学教室的泥墙脚（廊下搁着粪桶、柴草，母鸡咯咯叫，一匹牛甩动尾巴驱赶苍蝇），我一字字抄读完毕，黯然默认自己的阅读水准还是一名小学生。

请原谅！请诸位文学阿姨小说叔叔散文教授们原谅！

彼　哉

自有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说中国话的洋人越来越多了，他（她）们的身边，常见伴着一位中国的异性爱人，不久双双出国，不几年，又双双回到中国来，带着“爱情的结晶”住在宾馆或外国人居住区，叫上一堆中外朋友喝酒谈笑。我少年时的画友韩辛同志1981年娶美国人裘蒂为妻，我与内人有幸为他俩在“全聚德”张罗婚宴，多年后，裘蒂来京收集中国美术史资料下榻北京饭店，某日夫君携了逛街回转，孩子卷发，通行无阻冲进大堂，韩辛给门卫高声喝止，气得他直跺脚，遥指小孩急叫道：我是他爹！

老同学巫鸿的妻子芳名也叫裘蒂，双双在普林斯顿喜结连理时，我算是男方的伴郎。在这里，伴郎不必是“处子”。只见在草坪上一座彩花华盖下新郎新娘并排站站好，巫鸿按女方家犹太风俗将事先放好的一块瓦片一脚踩裂，掌声四起，又一对跨国鸳鸯正式结合了。中国人有“弄璋弄瓦”之说，难道犹太民族也将闺女看作一片“瓦”么？那晚婚宴上新娘的妹妹致辞时动容流泪，说是姐姐从小预言将来会嫁给一位来自东方的男子，现在这一天真的来到了。裘蒂那年二十多岁，已经是研究“聊斋”的博士，我们聚餐时纷纷朝店门口张望迟来的巫鸿，她说——当然是标准的国语——“不要观，不要观”，座中炎黄子孙多半不懂，问她，她笑而不答，接着讲起书籍，她又偏偏将“读者”说成“看官”。你道她不懂当今革命白话吗？有一年阳春时分她开车从北面的波士顿捎我回南端的纽约，

进得市郊，纽约万树春枝已经绽开鲜亮的绿芽，“啊呀”，她很认真地叫道：“我们波士顿落后了。”

我的交游要算是少的，可这样地研究中国文化的洋兄妹，也识得一打以上，每见到他（她）们，常不知自己是太“落后”了还是太“超前”：除了“文革”“切口”和标准“国骂”是信手拈来朗朗上口，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我是读过了也不敢说读过，因一知半解，且要命的是过目即忘。如今瞧我同辈的作家教授学者名流动不动来回念叨“我们读书人”怎样，“作为文化人”又怎样，我实在是钦佩而害臊：打死我，我岂敢自称读书人——我是老知青，知识青年，就是无知无识的意思呀。

今夏在金陵朋友席宴上得识意大利国驻宁商务代表罗马市人孟斐璇同志，中文“特棒”，娶位中国太太，都不消说得。因饭桌上初次见面没话要来找话讲，我拿布兰姆西帕索里尼皮兰德罗费里尼诸位的名字现批现卖，半滴醋瞎晃荡，弄得孟同志以为我了解意国文化，当真同我谈起“知识”来。我的“知识”，本是转瞬见底，到他不知怎地说起先秦诸子，我就舌头打了结了，情急之下，想起前天正好在湖南路书店买得一本孔夫子的《论语》，虽还半页没有读过，也赶紧拿来虚晃一招，不料老孟——他其实至少要小我十岁以上的——扶正了眼镜，问这《论语》是哪个版本，我哪里知道呢，于是他一连说出四五个建国后不同校注者的名姓，极诚恳地劝我怎么也得有一本朱熹的《论语》注本，这才再读别的本子比较地好。我招架不住，只得说上哪儿去觅呢，连这本《论语》也是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书店看见。他将又浓又长的眉毛这样那样地拧着说，没问题，我来给你找！这才总算“论语”话题告一段落，放我低头吃菜去。

都说世上“最讲认真二字”的要数共产党员，我怎么老是遇见无党无派的白人兄弟这么喜欢叫板呢？下一回请去他寓所聚，他真的已经买到某人校注的《论语》本送给我，还再三解释说是朱熹本

一时难觅，很对不住的意思，倒好像是我命他办事他没办好似的。我谢了又谢，心里巴望他别去找了。那一夜，他特意领我到楼上书房给我亲眼瞧瞧朱熹的本子，我看他满满当当足有上千册中文书的书架，眼就晕了，又见那书页上密密麻麻他手写的中文笔记，我脑门子渗出汗来。他不是学者，本职是商业。他属兔子，据说，当年的北大清华单是文科就有五六位名教授都属兔子，而此间的朋友干脆戏称老孟为孟夫子，我算是撞上一位意大利籍的“亚圣”了。

我与孟夫子仅得三回见面，末一次是出去玩。车开出玄武门，忽然他就从前座回头冲我笑，递过来朱熹同志的《论语》本，连另几本先秦某子的书（真糟糕，此刻我又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之后他就眉目平顺，遂了夙愿似的。我无话可说，捧在手里，沉甸甸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知日后不会当真读，读了，也难洗心革面，摇身变成“我们读书人”。读书好比进食，早餐午饭一路饿下来，晚上一块儿吃？

知识青年长在知识的荒年，我辈的本事，即自幼练就一套空腹活命的好习惯，忽然遭遇当今的出版盛世，每到三联之类书店，放眼看去那满坑满谷的书，我却饱也不是饿也不是：原来胃口、食欲、消化、健康，不是一回事。想看，想买，买得过来，看得过来么？先秦诸子的书总算出齐了，那是中国文化“早餐”的“早餐”，呜呼，“人无百岁”，我辈积欠的书债却是何止千年。我虽知道自己不会怎样去读书，时或也就不由自主掏钱买：杰克·伦敦曾在《热爱生命》里写那海难幸存的家伙饿得惨，人送片面包他就藏到被褥子底下煞有介事存起来，积久了，铺成床垫似的，全发霉。我瞧见家里如今满进满出的小书柜，就想起那饿鬼的床下，此刻拿来形容，却是也像也不像。怎么办呢，人总得骗骗自己吧，只要不骗人。

倒是这回在南京买到了“古诗源”，大喜过望，翻开来，读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即神往。胡兰成书中引用的那首汉乐府也在：

来日大难，

口燥舌干，

今日相乐，

皆当喜欢。

一口气读完全篇，真好真好。何以见得好呢，我却没有言辞，只是“皆当喜欢”。

至于老孟送我的两本《论语》，实话实说，到今我也没坐下来专心读，翻开几页，总觉是假装，仿佛看在意大利孟夫子的面子上。此刻我仅记得其中两句话：其实是一句，孔夫子连说两次，四个字，即学生问起他对某人的看法，他就说：“彼哉，彼哉。”我赶紧看白话注释怎么解，原来是：“他呀，他呀”，不屑一提，不值一谈的意思——这说得有多好呢！我记住了，虽然我也说不出好在哪里，所以格外觉得好。

哪天有人问起老孟专意送书的那小子如何，他应该说：**彼哉，彼哉。**

继《纽约琐记》之后，本书是陈丹青归国前夕写成的另一部纪实文集，其主题首次越出"艺术"之外，触探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书中，时代的质感体现为日常细节，历史的分量，举重若轻，那就是我们亲历的生活，而作者严肃地戏称为"多余的素材"。

ISBN 7-80603-674-1

9 787806 036747 >

ISBN 7-80603-674-1

定价：28.00元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